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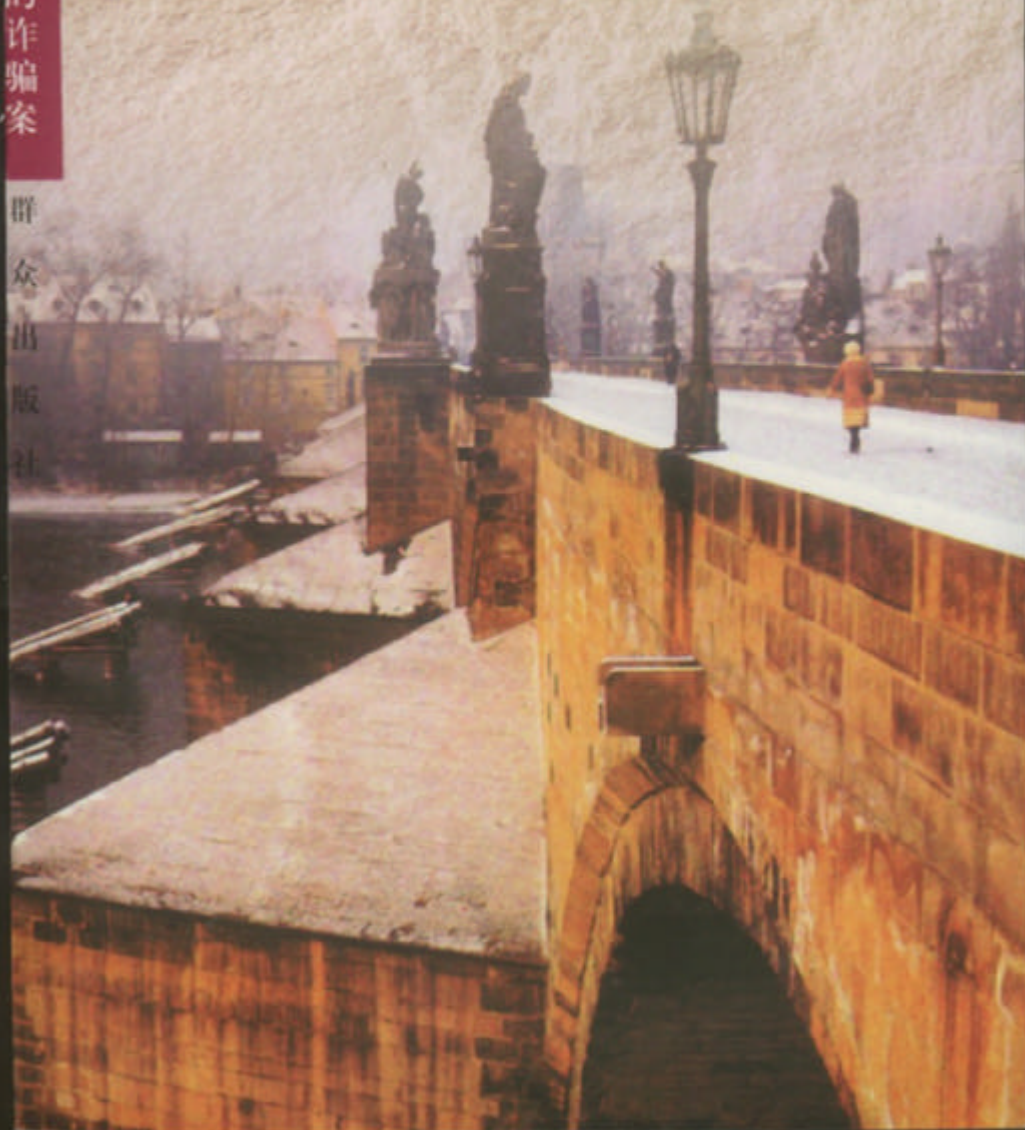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案中案

【苏】阿·阿达莫夫◎著 刘引梅◎译

发生在长途汽车上的诈骗案

群众出版社



序

凌继尧

侦探小说是通俗文学中的一种体裁。《苏联百科词典》把侦探小说定义为“描述破案过程的小说”。它起源于19世纪中期。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警察体制已经建立，出现了以破案为职业的侦探。于是，描写侦探活动的小说也就应运而生。

侦探小说在国外拥有广大的读者，在美国差不多占每年图书销售量的四分之一。侦探小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不仅仅由于它情节曲折、气氛紧张、具有消遣娱乐作用，也不仅仅由于它扶正压邪、惩恶扬善、具有道德教育作用，而且由于侦探小说的阅读行为是读者积极参与的一种共同创作行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不能像从一个水罐倒进另一个水罐的水一样，从作品转移到读者的头脑中。它得由读者本人再现和再造，这种再现和再造根据作品本身所给予的方向进行，但是最终结果取决于读者智力的、心灵的、精神的活动。侦探小说为读者和侦探提供了同样的案情线索和破案机会，所以，阅读侦探小说可以成为读者和侦探之间的一场智力竞赛。一位俄罗斯美学家指出：“面对同一部作品的两位读者，就像把各自的测深锤抛入海中的两位水手一样。每个人所能达到的深度，不超过测深锤的长度。”祝愿我们的读者像高明的水手那样，把自己长长的测深锤抛入侦探文学的海洋中。

俄罗斯侦探小说既有侦探文学的特性，又有俄罗斯文学的共性。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在俄罗斯这个世界上幅员最大的国度里，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孕育出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不仅反映某些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而且揭示它们的审美意义，表现作家对它们的审美关系，通过对它们的评价确立审美理想。透过俄罗斯侦探小说，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俄罗斯的社会风貌和审美理想。

俄罗斯侦探小说既在世界侦探小说中、又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康熙皇帝于1708年下令创办俄罗斯文馆，培养俄语的口笔译人才。自1900年起，俄罗斯文学作品开始被译成中文，传入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部分侦探小说。但是，像群众出版社这样，制定周密的计划，遴选精品佳作，出版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这种可贵的尝试还很少见到。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外国侦探小说发展的新趋向。传统侦探小说具有自己固定的模式，其结构一般包括四部分：神秘的环境、严密的情节、人物之间的关系、特定的故事背景。现代侦探小说在结构上仍然恪守这种模式，然而在内容上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犯罪手段日益科技化、智能化，作案方式更加隐蔽，案犯流动性大，这些都增加了破案的难度。然而另一方面，这也为侦探提供了施展自己的大智大勇的更加广阔的舞台。

第一章 博尔斯克的三张身份证

摩肩接踵的人群渐次登上电梯，宛如一条长长的彩带缓缓向上爬去。迎面乘电梯而下的人流中呈现出形形色色的面孔：有年轻的，冻得发红的，笑吟吟的，也有中年的，若有所思的，睡眠不足的，神色忧虑和焦急不安的。谢尔盖喜欢仔细观察从身旁徐徐而过的人们的脸，极力从他们脸上捕捉到某种主要的、不同于其他人的东西，有时由于自己意外的小小发现而淡淡一笑。

一分钟之后，他机械地离开脚下移动的梯级，步入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大厅，随着人流踏上宽阔的台阶，向热气笼罩的地铁出口走去。

他终于来到广场上，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冷空气，习惯地看了看挂在广场中央高柱上的银白色圆形钟表。“是啊，”他暗自说，“尽管天气寒冷，有暴风雪和维季卡的地理课，但我们还得按工作计划照常行动。”

今年冬天好极了，已经两个来月了，严寒仍然没有退去，雪下得非常多。昨天是星期日，他带维季卡在伊兹迈洛夫滑雪，滑了大约四个小时。小淘气一趟一趟地从山上飞一样地滑下来，一点不叫累，像个没头没脑的愣小子。谢尔盖爬到山顶上以后还要盘算一下怎样下山和从什么地方下山，还要鼓起勇气，而维季卡却像个蓝色的小圆球，转眼间已经滑到了山下边。谢尔盖甚感羞愧，急忙跟在他后边滑下山去。而最后几米维季卡却是一边连翻带滚地滑下来，一边兴奋不已地大喊大叫的。

星期天，他们向来在父母家里吃午饭。列娜早场演出结束后便到这里来了。

今天一早起来，维季卡就有点儿咳嗽，谢尔盖和列娜彼此望着，露出忧虑不安的神情。“瞧，都怪你们滑雪，”列娜生气地说，“我再也不让你们滑雪了，一次都不让。”但是谢尔盖知道，每年冬天她最害怕的是流感，完全和滑雪无关。

谢尔盖和维季卡从来都是一块儿从家里出来。“地理课”在路上就开始了。不久前，爷爷送给维季卡一本地图集。他整天整天地研究地图，令父母对他的发现感到惊讶。就在今天早上，在上学的路上，还发生了这样的事。

“爸爸，”维季卡开始说，“你知道美洲有几个华盛顿吗？”他立刻又不假思索地说：“三个！”

“怎么会有三个？”谢尔盖不胜惊讶。

“就是嘛。一个是首都，还有一个在得克萨斯州，另一个在俄克拉荷马州。”

“是吗？”

“嗯。你知道吗，那里还有莫斯科和彼得堡呢。”

“是啊，”谢尔盖不知所措地同意道，暗自对这个发现感到诧异。

“爸爸，”维季卡接着说，“为什么法国有个奥尔良，而美洲有个新奥尔良呢？你知道吗，还有……”

“天气太冷，不要多说话，”谢尔盖打断他说，“你本来就咳嗽了。”

谢尔盖把儿子送到学校以后，继续往前，往地铁走去。他通常走到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接着在高尔基大街步行，穿过普希金广场，下坡到中央电报大楼，从这里拐弯到部里。整个这段路程估计需要几分钟就够了，一般九点整，他踏进嘈杂的正门。谢尔盖一边向卫兵出示证件，一边和同事们彼此交谈几句，然后乘电梯来到四楼。

今天早上也是这样。

谢尔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脱下大衣，挂在衣柜里，搓了搓冻僵的手，然后在桌子后边坐下来，惬意地点上烟吸起来。第一支烟向来是最有滋味的。

这时，电话突然响了。“是啊，一天开始了。”谢尔盖一边想，一边摘下了话筒。

“您请讲，彼得·伊万诺维奇。”

“请到我这里来一下，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五分钟之后，他走进了局长接待室。

“就他一个人吗？”他用头点了一下门，问秘书道。

“他把斯维特洛夫叫来了。”秘书回答说，还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星期一重大的日子，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谢尔盖会意地点了点头，算作回答。

在局长轩敞的办公室里，有两个人隔着大写字台在低声交谈。谢尔盖走进来，两个人同时抬起了头。

“请坐。”局长从容不迫地说，用手势指着写字台旁边的第二把椅子。

他一向稳重自持，显得特别沉静练达，难得一笑。梳成整齐的分头式的浅色短发遮住了浓密的白发，但在他清瘦红润的脸上，眼睛周围和嘴角上明显地出现了细小的皱纹。

斯维特洛夫年轻，好冲动，结实丰满的面颊上泛着健康的红晕。他一只大手里拿着黑色钢笔，好像拿着根划过的火柴棒。

在斯维特洛夫前面靠近写字台的小桌上，堆着塞满文件的厚厚的一摞摞文件夹。

“你好，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他说，“祝你碰上好天气。你昨天大概滑雪了吧？”

“滑雪了。”谢尔盖温和地微微一笑。

“我和薇拉去图里斯特旅行了一趟。那里的山可真壮观！”

“好了，好了，你们倒闲聊起来了，”局长淡淡地一笑说，“言归正传吧。请把整个情况从头报告一下。不要着急。我们要进行讨论的。”

斯维特洛夫像谈论滑雪那样轻松而无拘无束地说：

“应该从诈骗案件开始谈起，彼得·伊万诺维奇。”

“那就开始吧。”

“是。这是一起涉嫌汽车的特大诈骗。有四个情形可以说明。”

“三个。”谢尔盖纠正说。

“已经四个了，”斯维特洛夫迅速做出反应，“还有一份调查材料。”谢尔盖摇了摇头。

“一个危险的团伙在活动。”

“正是这样，”斯维特洛夫附和道，“还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为了更加令人信服，犯罪分子把身份证留给了受害者。”

“这个我们知道。”谢尔盖点了点头。

斯维特洛夫狡黠地一笑：

“另一件事你不知道。不过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所有的身份证都是偷来的，甚至上面的照片都没有撕下来重新贴过。这种伎俩对那些轻信的人才有用。”

“这个我们也知道……”

“你别忙。那么留下来的四个身份证中有三个是在博尔斯科市签发和注册的。这个你也知道吗？”

“很想知道……”

“你想过了。这是一条线索！并且目前只是第一条线索。现在可以谈关于安眠药的事吗，彼得·伊万诺维奇？”斯维特洛夫转向局长问道。

“等一下。您有什么补充的吗，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博尔斯科是您的辖区。”

“暂时没有。”

“那好。请您接着谈吧。”局长朝斯维特洛夫点了点头。

“那么，”斯维特洛夫情绪高昂地继续说，“现在谈最后一个情况。犯罪分子在长途列车上结识了一个受害者，一个打算在莫斯科购买大宗货物的人，并偷偷地往酒里下了安眠药，然后窃走了现金、信用卡和证件。这个人死了。”斯维特洛夫含有深意地举起食指说：“这里有一个细节。”

谢尔盖怀着越来越浓的兴趣洗耳恭听。关于诈骗汽车的事件他是知道的，当时犯罪分子冒充某机关工作人员，打着销售汽车的幌子，把受害者诱骗到这个机关里来。可是这条线索原来竟延伸到了博尔斯科！并且现在又发现了安眠药……

“……有一个细节，”斯维特洛夫接着说，“事情发生在莫斯科至博尔斯科的路段上。你注意到了吗？”他看了谢尔盖一眼。

“喏，这个路段需要行驶一个多昼夜，”谢尔盖摇了摇头，“火车都是经由其他城市路过这里的。”

谢尔盖多半是由于意外而提出异议，他内心里已经开始感觉到斯维特洛夫的推断有某种逻辑上的联系。

“你为什么确信是一个团伙在活动呢？”谢尔盖问，“采用的手段好像有两种。”

斯维特洛夫滑头地一笑。

“为什么？就是为这个。我已经说过了，在诈骗的四种情形当中，有三个留下来的身份证是博尔斯科签发的。不是吗？而第四个……第四个身份证是在火车上从一个被催眠的人那里偷来的！可以说是用第二种手段干的。借助于……它叫什么名称来着？……”他匆匆打开一个文件夹，在装订好的文件里一页页地翻寻起来，然后说出了安眠药的名称。

谢尔盖甚至惊诧地吹了一声口哨。

局长不慌不忙地点上烟吸起来，然后把一包烟从桌子上推到自己的部下跟前，往后一仰，靠在了沙发椅背上。

“一切都和博尔斯科有牵连，”他从容自若地说，“您，如常言所说，是行家里手，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这件事您就抓一下吧。其余的事交给您的副手去处理。您现在和斯维特洛夫坐下来，初步拟定出作战方案。午饭后你们飞往博尔斯科。要抓紧时间。每一分钟都可能有新的犯罪。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团伙。并且你们要注意，他们是从诈骗开始下手的。现在又采用了暗中投放安眠药的卑劣手段。今后也许更加危险。因此，务必抓紧时间。”他坚决地又说了一遍。

“明白了，彼得·伊万诺维奇。”

“那好。你们大概没有意见吧？”

“那些身份证把人搞得不得安生，彼得·伊万诺维奇。而这又是有现实

意义的事业。”

“我知道。您一直在为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暗暗担忧。”局长笑了笑，但他的声音里表现出令人感到温暖的绵绵情谊。

“看来担忧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谢尔盖也微微一笑。

“不是您一个人……那好，着手干吧。您打算带谁一起去，决定了吗？”

“谁也不带。在博尔斯克，我有一个可靠的人。”

“谁？”

“罗巴诺夫·亚历山大·马特韦那维奇。不久前他被任命为刑侦处处长了。”

“你们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一起工作过吗？”

“正是这样。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八年。”

“一言为定。”局长用手掌啪地拍了一下桌子，暗示谈话到此结束。“两小时以后我等你们的方案。就这样吧，你们可以自由了。”

谢尔盖和斯维特洛夫同时从位子上站起来，把堆积如山的文件夹平均分开，从办公室里走出去了。

航空站有上下两排窗户的候机大厅里像平素一样嘈杂、紧张而忙乱，数以百计的单个的人汇合在一起，在极短的时间里聚拢在这个大厅里。他们都有各自的命运、打算和愿望，有各自的性格与气质、悲伤与欢乐，他们由于巧合而集中在这同一个地方，要去同一个方向，怀着唯一的心愿——飞走，飞往某地，办理某事，一定要飞走，尽快地、刻不容缓地飞走。激动不安或者表面上平静自若的、忧虑烦恼或者喜笑颜开的人们聚集在数不清的售货亭、问询处、小卖部柜台跟前，聚集在占据整个一面墙壁的、标明班次的、闪闪发亮的巨幅匾额旁边，或者坐在摆着极长的、顶到大厅两端的一排排沙发椅上，翻阅着报纸、杂志，匆匆浏览着电报、报导、短评、文章标题，因为航空站特殊的、极不稳定的生活节奏，以及焦急和等待不允许集中注意力做任何事情。有人不时对那些兴奋的、淘气的孩子呵斥两声，母亲们试图把他们抱在腿上，哄他们睡觉。

嘈杂的说话声时不时地盖过被烧热的飞机发动机强劲而遥远的轰鸣声，给候机大厅里带来一阵新的、隐隐约约的惊惶和紧张。

谢尔盖坐在沙发椅上，把脸掩在竖起来的大衣领子里，似乎以此与周围忙乱的人们隔离开。他腿上放着一个棕色的大公文包，提手是铜的，样式很时髦。从旁看去，谢尔盖好像在打瞌睡，其实他脑海里思绪汹涌，都是一些不连贯的片断，急匆匆一闪而过。一会儿，手忙脚乱地帮他往公文包里放东西的维季卡突然浮现在脑际。这时，他最感兴趣的是，父亲将乘坐什么飞机：“图”还是“伊尔”。他显然更喜欢喷气式飞机“图”。后来，谢尔盖给列娜留了一张字条，而维季卡迫不及待地揪住他的袖子：“……他说有支流的密西西比河比密苏里河长三百公里。这是骗人的，真的有支流吗？”在门口，他最后一次紧紧搂住谢尔盖的脖子，悬在他身上，压低嗓门，担心而好奇地问：“爸爸，你没有忘记带手枪吧？”他深为父亲及其工作而自豪，这一点使谢尔盖甚感欣慰。

但是谢尔盖现在把关于儿子的思绪驱散开，努力集中思想考虑公务。可

是这一点没有办到，反而突然开始想起萨沙·罗巴诺夫来了。很想知道他在那里，在新的工作岗位怎么样？萨什卡古道热肠，而且说话诙谐。要想对他做出评价，必须对他有了解才行。于是一位身材不高而敦实的、几乎是方形的萨沙·罗巴诺夫，即亚历山大·马特韦那维奇·罗巴诺夫出现在谢尔盖眼前：他那垂到额头的一绺浅色头发、依然那样狡黠的眼睛和老是可笑地皱着的满是雀斑的翘鼻子。唉，萨什卡，萨什卡……他们有多少年的友谊了？他们是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碰在一起的。萨沙比谢尔盖早一年半来到这里。就是说，他们的友谊大概不少于十二年。他们在办第一个大案，即“形形色色的案件”时结下了友谊。谢尔盖清楚地记得他。他像个“小弟弟”似地来找卡佳·格朗宁娜，也就是说，当时她还不是格朗宁娜……当时，那条叫弗莱达的狗被打死了。一条出色的狗……并且抓获了老牌匪徒格里高利耶夫……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之后，发生过多少事，接触过多少人，各种各样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形形色色的人。而且总是有萨沙在身边，还有科斯加·格朗宁·喏，这个人现在还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担任领导。“不，我和萨沙还是要为我们这次相逢干上一杯。”谢尔盖暗自笑了笑。他开始估计抵达博尔斯克的时间。一般地说，他不会晚到的。萨沙当然会去接他，他已经给他发了电报。

“啊，他们真该死！……”谢尔盖突然听见旁边什么人在喊叫，便抬起头来。

在候机大厅上空，从扬声器里传来漠不关心的、喉音很重的话，盖过了噼噼喳喳的喧闹声：

“……次航班，”播音员报出谢尔盖所要乘坐的班次，“因技术原因延迟两小时起飞。再广播一遍……”

“您看，真难以设想，”坐在旁边的一个人转过脸对谢尔盖说，“不管你怎样计划、打算和考虑，他们只一句话——技术原因，就全吹了。我们要能这样出报纸就好了：‘亲爱的读者，由于技术原因，报纸延期出版。’那非得闹翻了天不可！我们的技术原因可比他们多。”

“这毕竟比因为天气而延迟起飞要好，”谢尔盖说，“遇到那种情况，根本没有盼头。”

“两小时之后，他们这里连天气也要变坏了！您瞧着吧。”

谢尔盖微微一笑，看了看邻座。这是一位身材瘦削的年轻小伙子，戴一顶毛茸茸的护耳皮帽，穿着新款厚呢大衣。他的腿跟前放着一个公文包，和谢尔盖的一模一样，只是颜色是黑的。

“您也去博尔斯克吗？”谢尔盖问。

“对。”

“那么我们是同路人了。也好，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尔舒诺夫。我去出差。”

“我叫格奥尔基·乌尔曼斯基，”年轻人回答说，“在报社工作，《红旗报》报社。”

“报界。应该跟您交个朋友。”谢尔盖笑了。

“就是嘛。您在什么单位工作？”

亚历山大的小名。——译者注

亚历山大的昵称。——译者注

“我在内务部工作。”

“啊！是警察吗？” 乌尔曼斯基越发活跃起来，“我们和你们早就是朋友了。一切关于民众纠察队员和警察的材料都是通过我的专栏发表出去的。我们是竭尽全力赞扬你们的。”

“你们真的在赞扬我们吗？”

“肯定的。喏，我们对纠察队员有时提出批评，而对警察不会的。有这样一条宗旨。”

乌尔曼斯基快活地丢了个眼色。谢尔盖微微笑了笑。

“那么假如没有这条宗旨呢？”

“您没有用心听我说，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乌尔曼斯基笑了起来，“我们也是爱国主义者。您想必是下去作视察吧？”

“什么情况都会有，” 谢尔盖不置可否地回答说，“你们那条宗旨虽然令人感到愉快，不过依我看却是危险的，”

“为什么？”

“我是这样认为，假如使国家的某一个基层单位摆脱舆论批评，那么这个单位就会严重地生锈。”

“宗旨不是我们制定的。该做什么和如何来做，都是那里考虑的。” 乌尔曼斯基提出不同意见，特别强调了“那里”这个词。

“对正确的宗旨做出不正确的解释，这种情况是有的。”

“我和您，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好像互换了角色，” 乌尔曼斯基笑了，“不是我们批评你们，而是你们批评我们。您知道吗？我有一个建议。由于技术原因，我们或许能到餐厅去撮一顿？可以说，民航赠送给了我们两个小时。”

“好吧，建议通过了。”

“您要知道，” 乌尔曼斯基俯身向谢尔盖，压低声音说，“我还有一个建议。您看，一个姑娘坐在那边。她也是飞往博尔斯克的，我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把她也邀请上怎么样？”

谢尔盖朝乌尔曼斯基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那边沙发上果然坐着一个年轻姑娘，身穿黑色皮袄，毛茸茸的高帽子下边露出几缕浅色的鬃发。她那姣好的脸上微微显出惊惧的神色，惶恐不安仿佛在她那大眼睛里凝滞了。

“姑娘长得不错吧，啊？” 乌尔曼斯基用行家的口吻问道。“她大概是头一次坐飞机。您瞧她那副着急样儿。”

“挺可爱的，” 谢尔盖同意道，“只是有点儿不便去邀请她。”

“哪里话！我一个人去是不方便。可是有您在……而且我们抱着最美好的，我敢说，甚至是最人道的意愿，” 乌尔曼斯基激烈地反驳道，“您允许吗？”

谢尔盖耸了耸肩说：

“那就去邀请吧。”

乌尔曼斯基提起公文包，朝姑娘走去。

“对不起，” 谢尔盖听见他快活的声音，“我和我的同伴断定，您也是飞往博尔斯克的。”

姑娘打了个哆嗦，抬起惊惶的眼睛望着他。

“是的。有什么事吗？”

“我们只是想邀请您到餐厅去坐一坐。您瞧，民航把我们可害苦了，不

是吗？走吧，真的。我们在一起，时间会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

“不，不。谢谢……”

“您不必担心。我们只是一块儿坐一坐，聊聊天。” 乌尔曼斯基坚持说，并开玩笑地加了一句：“我们甚至什么饮料都不喝。我们都是可信赖的人，我在报社工作，我的同伴在……部里工作。”

谢尔盖暗自笑了笑：“看来，他决定不说出我的部去吓唬她。”

这时，乌尔曼斯基继续热情地说服那姑娘，那姑娘终于顺从地站起身来，和他一起走到谢尔盖跟前。

“请认识一下吧，” 乌尔曼斯基高兴地说，“这位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叫我格奥尔基就行了，下边不需要了。您叫什么名字？”

“我？” 姑娘重问了一句。“我叫……玛丽娜。”

“好漂亮的名字。我们走吧……”

他们三人穿过乱哄哄的候机大厅，踏着宽敞的楼梯，登上了二楼。

餐厅里比楼下肃静。对着停机坪的窗户旁边有一张空桌子。乌尔曼斯基手脚麻利地把残留着不知是谁吃剩下的饭菜的盘子一个个擦起来，端到紧邻的业务台上，把高脚酒杯也放过去，抖掉桌布上的残渣，用邀请的手势指了指桌子说：

“有请。现在一切都井井有条了。”

谢尔盖把玛丽娜让在前边。

“我们在这里能听见什么时候广播登机吗？” 姑娘不安地问。

“肯定能听见。这里就有扬声器，” 乌尔曼斯基安慰地说，“稍等，我去找一本菜谱来。” 于是他环视了一圈周围的桌子。

谈话渐次开始了。说话的其实主要是乌尔曼斯基，他在讲编辑部那些无休止的、令人发笑的故事，他总是这些故事中最具吸引力的形象。玛丽娜心不在焉地听他讲着，分明在想自己的心事。当两个男子汉点上烟吸起来时，她突然也坚决要吸一支，并笨拙而冲动地对上了火。“她很着急。” 谢尔盖想道。

“您也去出差吗？” 他问。

“不。我到……叔叔家去。”

“要待很久吗？” 乌尔曼斯基探问道。

“说不准。看情况吧……”

“请您多待一些时间。我给您介绍介绍我们的城市。您来过博尔斯克吗？”

“没有……”

“您看，我们这里有一流的剧院，古老的教堂，公园……”

“是啊，是啊……” 玛丽娜不经意地点了点头。

“她肯定顾不上教堂。” 谢尔盖心想。

“您打算写什么呢？” 他问乌尔曼斯基，“您是为了找材料来莫斯科的吗？”

“不，瞧您说的，” 乌尔曼斯基笑了，“我们自己的材料足够了。我是来为朋友庆贺生日的。待了两天。”

“昂贵的快乐。” 谢尔盖说。

“没什么。我和瓦利卡是一起从新闻系毕业的。哎呀，小伙子可出息了！您知道吗，他的悟性和敏锐是罕见的。他前途无量。只要跟他谈一会儿话，

自己就好像长高了一头。要知道，他视野很开阔。我喜欢这样的人。我现在尤其需要这一点。”

“为什么偏偏现在需要呢？”谢尔盖感兴趣地问。

“有这样一件事。他们打算对我提出起诉。”乌尔曼斯基解释说。

“我碰到两个有意思的伙伴，”谢尔盖心想，“不管是他还是她……”

玛丽娜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她凝望着某处的空间，小口地喝着咖啡。她那细细的眉毛紧张地挑动着，据此可以猜出，她又在想什么心事。

她身着雅致的淡蓝色上衣，围一条亮丽的蓝色薄纱围巾，衬托着她那蓬松的浅色头发和面颊上柔和的红晕，显得十分相配和谐。于是，谢尔盖不由自主地欣赏着，不时看看姑娘。

“玛丽娜。”谢尔盖叫道。

在最初的一刹那，姑娘漫不经心地瞥了他一眼，然后急忙问道：

“您说什么？”

“我觉得您跟我们在一起感到无聊。”谢尔盖微微一笑。

“哪里话！不，不！……”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和我在一起感到过无聊。”乌尔曼斯基愉快地声称，“我现在给你们讲一件我们一位工程师的真事。简直是一篇现成的幽默小说。他曾在阿斯旺工作过。他离开那里时，别人送给他一条幼小的鳄鱼作为纪念。非常小的小鳄鱼，装在一只小锌盒里。你只要把手指塞给它，它便用没有牙齿的嘴吸吮，在水中翻跟头。总之，小鳄鱼十分可爱。于是，你们瞧……”

扬声器在天花板下面的什么地方突然响了起来。乌尔曼斯基阴郁的预言落空了：播音员郑重宣布开始登机了。

“竟有这种事！又不是时候，”乌尔曼斯基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居然搞出这种事来。玛丽诺奇卡，上飞机后我把这个故事给您讲完。”

“可是我们的座位不挨着。”姑娘微微一笑。

“这个我们看看再说！”

密密麻麻的人群从白雪覆盖的停机坪向飞机走去。乌尔曼斯基竭力挡住玛丽娜以免她被凛冽狂劲的顶头风吹着。

长长的机舱里拥挤而忙乱。大多数乘客还在寻找自己的位子，有些乘客已经脱下大衣，另一些乘客把手提包、公文包以及一包一卷的东西塞进头顶上方的网袋里，还有一些乘客正努力在深凹的沙发椅上坐得更舒适些，以做好远航的准备。

谢尔盖第一个找到自己的位子，开始注视玛丽娜和乌尔曼斯基：他们的座位更远一些。身材高大的乌尔曼斯基戴着毛茸茸的棕红色护耳皮帽，显得超群出众，伸出的一只手里拿着两张机票，一张是他自己的，一张是玛丽娜的。他远远地停在前边的什么地方。玛丽娜从沙发椅当中轻盈地移到自己的座位跟前，而乌尔曼斯基则俯身向坐在旁边的一位女士说着什么。过了一分钟，那位女士含笑站起来，于是她和乌尔曼斯基互换了机票。

“他总算安顿下来了，”谢尔盖一边温厚地想，一边朝靠窗户的自己的

埃及的一个省会。——译者注

玛丽娜的小名。——译者注

位子挤过去。

乘客们渐渐地各就各位了，很快，从套上护套的沙发椅高靠背上方只能看见他们的脑袋了。

一位清秀优雅的女乘务员出现了，她戴一顶船形制服帽子，娇媚地推到耳朵上。她用清脆的声音报告了目前要飞行的路线、令人头晕的高度、极快的航速和舱外可怕的低温，然后满怀敬意地报出机长的姓名。原来机长是一位苏联英雄，乘客们暗自感到欣喜。

这时，发动机放慢强大的功率开始隆隆地响起来。过了一会儿，飞机颤抖了一下。在窗外，在突然变得更加浓重的黑暗中，机场的灯光时隐时现。开始起飞了……

谢尔盖微微闭上眼睛。他的思绪已回到家里去了。维季卡大概已经做完了功课，列娜现在不可能使他丢开地图集。列娜今天没有演出，晚上她在家，她会打发维季卡睡觉的。而且在厨房里吃晚饭的将是他们两个人。奶奶也许会来的，她本来打算来的。然后她将独自回家。晚上，谢尔盖通常把她送到地铁站，因为他们那条胡同里又滑又黑……

谢尔盖不由得暗自笑了笑。不知为什么，他从小就记住了曾在什么地方读到的托尔斯泰的一段话：“一个赶路的人行至中途时想的是，他身后留下了什么，而行后半段路时想的却是，前面等待着他的的是什么。”譬如，等待着谢尔盖的是萨沙·罗巴诺夫，他大概在不时地看表，正准备到机场去。他当然已经知道飞机晚点了……

等待谢尔盖的还有工作，还有错综复杂的案子。是啊，一个危险的团伙，他们已经杀了人，罪责难逃。摆在谢尔盖面前的是要找到线索，通过这条线索，顺藤摸瓜，一举打掉这个团伙。在没有出现新的受害者，没有发生再次犯罪之前，必须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谢尔盖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没有办法，他的工作就是这样。一般地说，他对工作是胜任而愉快的。但是每一次，在着手调查一件复杂的犯罪活动时，他总感到前面是可怕的一团漆黑，犹如现在机窗外面一样。窗玻璃上只映出机舱里的灯光。这灯光甚至使人看不见外面的黑暗。如同在他的工作中一样，为了什么都不被掩盖住，什么都不要把黑暗遮挡住，为了使眼睛习惯黑暗，并到时间渐渐把前面的东西看清楚，现在就必须把与案件无关的一切统统抛到脑后。

那么办这件盘根错节的案子，他已经具备了什么呢？临行前，他和斯维特洛夫制定的方案一般说是正确的，虽然只是一个大致的方案，应当去寻找线索，这是明摆着的。自己寻找或别人帮忙寻找，在最可能的地方，在最可能的人们当中，像经验所提示的那样。而目前一切都是模糊的，不明确的。所以一定不能使神经松懈，不能张皇失措，不能四面出击。这是现在最重要和最困难的。神经，神经……顺便说说，犯罪分子也有神经。这是一场神经战。

谢尔盖微微睁开了眼睛。周围的人们都在读书看报，相互交谈，有的人舒适地倚靠在沙发椅的高靠背上打盹儿。飞机有点颠簸。发动机强大的轰隆声突然减弱了。

“天啊，飞机怎么了？”坐在不远处的一位女士不安地问。

“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说，“害怕为时尚早。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谢尔盖笑了笑，然后悠然地点上烟吸了一口，看了看表。啊哈！已经飞了一半路程了。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偶然结识的旅伴。格奥尔基大概不会使玛丽娜感到寂寞和害怕的。说不定他还在讲什么小鳄鱼的故事呢……

旁边是一位老者，舒适地发出轻轻的鼾声。他身着黑色卡拉库尔羊羔皮领子的大衣，没有系扣子，戴的那顶也是黑色的卡拉库尔羊羔皮帽子，滑落到斑白而浓密的眉毛上。他那口髭浓重的胖脸在睡眠中显得怒气冲冲。他腿上有一张摊开的报纸，被他那厚敦敦的手掌弄皱了，手背上鼓起一条条静脉。“是个做工匠的老头儿，”谢尔盖思忖道，“还没有退休，还在劳动。很想知道他出行去干什么。”

他扫了一眼报纸，看了看整个版面的标题。《革命的五十年，乌拉尔的岗位》。还有一幅漂亮的照片：一排巨大的高炉。题词……谢尔盖微微俯下身看了看：《国家的骄傲——马格尼特卡的高炉车间》。是啊，一幅富有感染力的图片。乌拉尔的岗位……

那么他，谢尔盖的岗位呢？是啊，比如说，当然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报道：《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岗位》。再说，在这样的标题下边能配什么图片呢？为了抓获犯罪分子，为了不再发生新的犯罪，谢尔盖依然乘飞机去出差，到非常遥远的地方。要知道，犯罪分子周围现在也有人。他们都保持沉默吗？没有发现吗？害怕吗？要么他们认为，这与他们不相干，他们本来就够忙的了？

没什么，谢尔盖会找到所有这些人，说服他们，让他们给他提供帮助。在参加工作的这些年里，他遇到过多少这样的人啊！大多数人给予了帮助，大多数，但不是所有的人……哪怕只有一次真正帮助过他，或者像他一样，哪怕有一次冒过危险和感觉到斗争异常紧张的人，现在都会去帮助每一个人。

这时，他听见头顶上年轻女乘务员清脆的、有点儿庄重的声音：

“乘客公民们，请系好安全带。博尔斯克到了，飞机要降落了。”

谢尔盖凭窗眺望。

在下边很远的地方，在他身下黑魆魆的极深处，出现了点点灯火：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过了一分钟，灯光又出现了，已经离得更近了。在灯光照耀下，现在可以分辨出一条条街道、林荫道和广场。闪烁的灯光仿佛被一条条看不见的线串成了长长的奇巧别致的项链。

发动机的声音开始减弱，断断续续地响着。飞机似乎变得沉重了，犹豫不决地往下滑行，由于疲劳而颤抖着，颠簸着。下面的灯光消失了，城市落在一边了。

坐在旁边的老者醒来了，在沙发椅上忙乱起来，整理好帽子，习惯地用手把口髭捋顺，不知为什么生气地问谢尔盖：

“这么说，我们到了？”

“到了，老伯，到了。我们都活着。”

“那就谢天谢地了，外边多黑啊。”

飞机轻轻地触了一下地，疾驰起来，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颠簸着。着陆灯光在窗外一一闪过。乘客们紧贴着窗户，兴奋地彼此交谈着。那些性急的乘客站起来，已经把物品从网袋里取了出来，认真地扣上扣子，动作笨拙地从沙发椅之间挤过去。

当谢尔盖已经站在狭窄拥挤的通道上，缓缓向出口移动时，才恍然想起

自己偶然认识的旅伴，开始用眼睛寻找他们。他立刻看见了乌尔曼斯基高大的身影。乌尔曼斯基不知是向他挥手致意，还是向他告别。没有看见玛丽娜。谢尔盖挥了挥手，算作回答。谁知道他们还会不会相见呢？

他们将会在怎样意外而复杂的情况下重逢，难道这是谢尔盖能够预测到的吗？

……乘客们踏着高高的，有点儿颤悠的舷梯慢慢地走下来，踩在雪地上，由于寒风砭骨而瑟缩着身子。

下边站着许多人。

谢尔盖刚一走下舷梯，一个戴着有护耳的帽子，把衣领立起来的人就跑到他跟前来。

“谢尔盖！”

只见那人笨拙地上前去拥抱，把被霜弄得湿乎乎的脸贴在谢尔盖的面颊上，然后急匆匆地拿起他的公文包。

这是萨沙·罗巴诺夫。他那冻得发红的四方大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情。

“走吧，老朋友，走吧，”他催促道，“为了迎接贵客，仪仗队已经列队恭候了。瞧，就在那边。”他朝航空站亮着灯的大楼方向挥了挥手，然后向四周环视了一下，喊道：

“尼古拉！”

一个人离开接机的人群，来到跟前，口齿清晰地自我介绍说：

“刑侦处副处长，赫拉莫夫大尉。”

“嗨，像个学生，”罗巴诺夫傲慢地说着，把公文包递给赫拉莫夫，“拿着。”

“行李不多，”谢尔盖一边反对说，一边要回公文包，“我自己来。”

“首长身先士卒，”罗巴诺夫用开玩笑的口吻难过地说，“甚至连效劳的机会都不给。”他们已经上了汽车，在驶向城里的路上，萨沙说出了自己的决定：“这样吧，现在直接到我那里去。”

“不，先去旅馆。”谢尔盖提出异议。

“你到旅馆去干什么？”萨沙发火了，“怎么，你这是到了外人那里吗？”

谢尔盖笑了笑，说：

“你最好直截了当地说，你没有弄到房间吧？”

“怎么没弄到？！只要需要，难道我们还会有弄不到的东西吗？可是……”

“那就去旅馆。”

“真拿他没办法！”罗巴诺夫伤心地感叹道，“我是想给你创造一个舒适优雅的环境。”

“你先结婚，然后再创造舒适的环境吧。”

“是吗？你是在暗示？那好，我明天就结婚！”

司机嘿嘿一笑。谢尔盖也笑了。惟独和司机并排坐在前面的赫拉莫夫平静自若，不动声色。

“瓦尼亚，开到‘中心旅馆’。”罗巴诺夫吩咐道，“我们要向首长证明，一切都预先安排好了。其余的事情，我想那边都安顿就绪了吧？”他做了一个极富表现力的手势，问赫拉莫夫道。

“是的。”

“预先定出两套迎接你的方案，”罗巴诺夫向谢尔盖解释说，眼睛里闪

烁着激情，“我们知道你那不合群的性格。”

看得出来，他对朋友的到来感到无比高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于是一切忧虑、焦急和不快一时间竟荡然无存，不知退到哪里去了。其实，谢尔盖也正是为了这些操心事到他这里来的。

这时，汽车在城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疾驰，不大的商店橱窗、灯光和电影院五光十色的广告一闪而过。

“这是新落成的邮政总局大楼，”罗巴诺夫说，“你瞧，多漂亮啊。比莫斯科的邮政总局大楼稍微小一点儿。前面就是建设者文化宫。哎呀，那才叫快呢，一下子就盖起来了！这种情况莫斯科没有。真带劲儿！”

“我发现，这半年来你成了这里的爱国主义者了。”谢尔盖微微一笑。

“对不起，只有五个月。”

“正是这样。甚至未婚妻也找到了吧？”

“当首长发命令当英雄的时候……”这时，罗巴诺夫打住话头，突然干练地说：“喏，旅馆到了。请吧。”

汽车在灯火通明的正门口停住了。

来到人行道上，罗巴诺夫惊讶地扬起了眉毛。

“你看，”他指着停在不远处的一辆绿色伏尔加对赫拉莫夫说，“这是我们的值勤车。它怎么停在那里了？”

他那红扑扑的脸庞露出凝思的神情。

“你去了解一下。我和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现在上楼到房间里去。快点，科利亚，快点。这个我不大喜欢。”

赫拉莫夫点了点头，大步流星地朝正门走去。

谢尔盖向司机道了谢，从车上下来，问道：

“出什么事了？”

“暂时还不清楚，”罗巴诺夫忧心忡忡地回答说，“赫拉莫夫马上会来报告的。我们走吧。”

高大的前厅里熙熙攘攘。行政值班经理的小窗口旁边唧唧喳喳地排着一队人。

罗巴诺夫到间壁后边去了一下，然后手拿一张蓝色的方形纸卡走了出来。

“三层。走吧。”他说。

谢尔盖上楼梯时间：

“发生了什么事？”

“值班经理现在什么也不清楚。好像一个女人出了什么事。已经叫了救护车。说不定那边已经通知我们了。”

“嗯。”谢尔盖怀疑地摇了摇头。

房间宽敞而舒适。

罗巴诺夫干练地把房间仔细检查了一遍，满意地说：

“一切正常。那边是浴室和盥洗间。这边，”他拉开高大的窗帘，“可以说是卧室。”

靠窗户摆着一张雅致小巧的写字台，上面放着电话机，窗台上有一个电话簿。长沙发旁边摆着铺上花桌布的圆桌。靠近圆桌的椅子上有一只小手提箱。谢尔盖指了指小手提箱，问道：

“这是谁的？”

“我们的，”罗巴诺夫简短地回答说，“来吧，我们把衣服脱下来。这里热。”他第一个脱下了大衣。

过了几分钟，有人敲门。

“进来，进来！”罗巴诺夫喊道。

赫拉莫夫走进来，把门严严实实地关上。从他那冷冰冰的长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

“喏，科利亚，出什么事了？”罗巴诺夫急切地问。

“允许报告吗？”赫拉莫夫望了谢尔盖一眼。

“说吧，说吧。请坐下。”

赫拉莫夫摘下帽子，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他转向罗巴诺夫说，“260号房间里一个女人死了。”

“怎么死的？”

“毒死的。”

“是她自己服毒自杀的吗？”

“房间里曾经还有一个人。”

“她来这里做什么？”

“住宿登记卡上填的是：‘私事’。在她的物品里找到一封信，很短，只有一行：‘来吧，应该谈一谈，这是最后一次。’”

沉默。过了一会儿，谢尔盖问：

“她是什么中毒，查明了吗？”

赫拉莫夫停了一下，回答说：

“查明了。是安眠药，大剂量的。”

“什么？！”

罗巴诺夫甚至从座位上微微欠了欠身。

“是的，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

“什么时候死的？”谢尔盖很快地问道。“说个大概时间也行。”

“大约两小时之前。”

“一桩更加危险的命案发生了，”谢尔盖思忖道，“真是说来就来了。”他站起来，习惯地整理了一下制服下边的枪套，问赫拉莫夫道：

“那些人还在工作吗？”

“是的。”

“走，我们到那里去。”

第二章 从房子里到车站上

按约定时间，他们晚上在旅馆附近的拐角处碰头了。一个身高体胖，五十来岁的人穿着肥大的深色大衣，系一条鲜红的围巾，戴着毛茸茸的鹿羔皮帽子。另一个是年轻人，也是高个子，身体柔韧灵活，脸庞黝黑而瘦小，留着小黑胡，穿着时髦的绿色氨纶拉链衫，戴一顶浅色的拉毛鸭舌帽。

“怎么样，一切都安排好了吗？我希望是这样。”年轻人愉快地问。

“我们办事向来万无一失。该记住了。”

“塔玛拉等着我们呢……”

“我知道。瓦西里怎么样？”

“他也到那里去。”

“那好，”已过中年的人抻了抻大衣袖子，看了看表，“时间到了。要想在车站上行动，阿列克，一切都要有周密的考虑和打算……像表一样。目前面临的是一场复杂的战役。这样的战役我们以前还没有过。”

“其它的我个人不需要。”年轻人漠不关心地反驳道。

他们在行人稀少的、几乎没有灯光的大街上飞快地走着。

“你是不是对冒险感到腻烦了，阿列克？”已过中年的人一边小心翼翼地问，一边把大衣下边的围巾拉得更严实一些：寒风直吹在脸上。

“你知道吗，我从小，可以说从幼年起就幻想着这种事。”

“你从小就是个浪漫主义者，阿列克。”已过中年的人又淡淡一笑，并担心地补充说：“你要记住，现在要有一个轻松自然、亲切友好的环境。塔玛拉是个情绪易于波动的人。”

“是个奢侈的女人！……”

“算了，算了，”已过中年的人生气地打断他说，“不许放肆。干我们这一行，阿列克，你知道什么是主要的吗？诺特。听说过这个吗？”

“这是一个什么人物吧？”

“是科学地组织劳动。这种事情应该知道。”

小伙子饶有兴味地高声大笑起来。

“我爸爸没教过我这个。”

“那好，我来教你。”

最后一句话里带有残酷而霸道的意味。谈话停止了。

他们很快又来到离他们碰头地点不远的那条热闹的大街上。年轻人不时地斜眼看看自己的旅伴，看看他那几乎浮肿的、不动声色的大宽脸和紧闭着的厚嘴唇。“是个硬汉，”他心想，“一点儿都不着急。而面临的却是这种事……”

年轻人对情况知道得不多……而且他也不必知道。

“瞧，车站在那边，”他指了指不远处排得不长的一队人，“三路无轨电车。”

他准备跑过去，因为覆满了雪的无轨电车已经进站了。

可是已过中年的人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径自走到人行道边上，挥了挥手。一辆出租车在他跟前停了下来。

“上车吧，”他朝年轻人点了点头，“赶紧。”

他本人在前边挨着司机坐下来，报了地址。

年轻人惊诧地望着他一眼，但没有说话。

行驶了相当长的时间。骤然下起了铺天盖地的、有附着力的大雪。雨刷来回地擦着挡风玻璃，发出吱吱的响声，来不及把雪扒下来。司机紧张地仔细望着，向前俯下身子，嘴里骂骂咧咧的。汽车不时地在转弯处打滑。旧马达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司机愠怒地敲打着摇把，不停地换挡。他根本没有注意自己这两名缄默不语的乘客。终于到达了指定地点。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刹住车，擦了擦满脑门子的汗，气愤地说：

“这破车，得把它……可是谁都不说把它淘汰下来。”

“当头儿的都在想什么呢？”已过中年的人一边问，一边费劲地从裤兜里掏出钱包。

“啊呀，没有一点儿主动精神。”司机摆了摆手。

“没有主动精神，亲爱的，看见路上有钱都不肯捡起来，”站在他背后的年轻人笑起来，“要知道，捡钱需要弯腰。”

已过中年的乘客狠狠瞪了他一眼，说道：

“什么时候都得依靠社会舆论。社会舆论会支持的。多少钱？”他俯身看计程表。

司机淡然一笑，看了看他，但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目光里有一种凝思的神情，仿佛他要试图回忆什么事似的。已过中年的人觉察出他的目光，冷淡地问：

“看什么？”

“没什么。我好像前不久拉过您。”

“没有，亲爱的，你没有拉过我。我今天刚到你们城市来，而且是头一回乘出租汽车。收钱吧，”他把钱递了过去，“不用找了，但愿下一次不要搞混了。”

两个乘客离开以后，司机朝侧面的玻璃稍微弯下身子，看了看他们的背影，然后耸耸肩，开动了马达。

他们离开汽车走了一段距离时，年轻人问：

“我很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下车？”

“你想让我们直接驶到正门口吗？他们，那帮鬼东西，都有职业记忆力。我也认出他了。”

“您确实是今天才来的呀！”

“但好像不是第一次吧？”

“啊哈！您也有职业记忆力。”年轻人笑起来。

“你现在刚发现吗？”

他们疾步如飞地走到拐角处，折进一条胡同里，经过几座楼房，走进一个没有灯光的大院子里。

他们在黑黢黢的门洞里抖掉身上的雪，登上二楼，在一家门口按响了门铃。

给他们开门的是一位身材苗条的黑发姑娘，穿着运动裤和高领绒线衫。

“哦，终于来了！”她大声喊道，“瓦夏已经在等着了。”

来人在狭小的、摆满东西的前厅里脱下大衣，那姑娘便把他们领进了房间。

圆桌上亮着带有布制大灯罩的明晃晃的台灯，长沙发旁边开着落地灯，

窗户跟前的小梳妆台上方也亮着灯。

“我喜欢把灯都打开。”姑娘解释说。

圆桌跟前坐着一个人，他面孔苍白，留着棕红色口髭，稀稀拉拉的浅色头发平光地梳成背头，露出很深的秃鬓角。

桌子上有一瓶白兰地和一盘下酒菜。

“请坐吧，谢苗·特洛菲莫维奇，”那姑娘说，“你也坐吧，阿列克，来喝一杯祛祛寒气。”

年长的客人注意地看了看坐在桌旁的人，粗暴地说：

“把酒拿走。你们倒是有时间喝酒消遣。”

“哟，好像真了不起似的，”姑娘任性地说，“我们才喝了一点点嘛。”

虽然如此，她还是乖乖地把酒瓶收到餐柜里了。她回到桌子跟前，从烟灰缸里拿起了吸剩下的半截烟卷。

“你们也许想吃点什么吧？”她问道，“毕竟……”

“我们吃饱了，”已过中年的人一边打断她的话，一边在长沙发上坐下来，“再过一个小时就得到车站去，我看你还没有穿好衣服。”

“嗨，这个一下子就好了。”

“什么事？我来帮她。”年轻人愉快地做出反应，迷人地微笑着。

“现在没有你我也行。”姑娘意味深长地断然回绝道。

“哎呀，亲爱的，你连玩笑都不懂……”

“好了，够了，”已过中年的人打断他，迅速地和那姑娘交换了一下目光，“你们注意听我说。你，瓦西里，不住嘴地吃个没完，真的是饿了。”他对坐在桌旁沉默不语的那人说，然后朝后一仰，靠在沙发椅背上，不慌不忙地一边点上烟吸起来，一边想着什么心事，仍然用不慌不忙的口吻接着说：“你们两个到车站去，塔玛拉，你和阿列克，你们俩一对，这样去最合适。客人，”说到这个词，他讥诮地冷然一笑，“我希望塔玛拉会认出来。”

“那当然！”

“可是他们今天到达，这确切吗？”

“确切无疑。”

“他们有一批相当可观的货。”

“那当然！他们准备提供多少，你们知道吗？我可看见了。他们是头一次贩运这种货。”

“你很聪明。一切都应该看到。”

已过中年的人狡猾而意味深长地看了姑娘一眼，而她会意地对他报以微笑。

阿列克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头一次？”他挑衅地问，“他们是胆小鬼吗？”

已过中年的人故作大度地微微一笑。

“你知道他们是怎样保护所种的东西吗？”姑娘解释说，“都是野生的——命令统统除掉。干脆烧光。你能想象吗？据说，你要在什么地方找到这种东西，就像找到蔷薇一样宝贝得不得了。干这种事提心吊胆，害怕得要死。真想不到！”

“你这就会吓得发抖的，”已过中年的人又淡淡一笑，“这可不比你搞卡拉库尔羊羔皮。收益翻一百多倍。算了，”他打断自己的话，认真地接着说，“必须把客人拉到奥尔洛夫大街。一定要小心谨慎地、亲切友好地说服

他们，把他们拉到预定地点。要如此这般地说，说主人在另外一个地方等候。他那里不方便，而那里……还有你，阿列克，要小心，”他严厉地望了年轻人一眼，“不要当儿戏。他们有手枪，都是玩命的人。假如有什么不中他们的意，我们大家将会被打得血肉模糊的。”

“一切都会安然无恙的，”年轻人应声说，他四仰八叉地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吊儿郎当地不时抽几口烟，“我希望，要死也只能为追求一个女公民的爱情而死，这样才叫死得其所。”

已过中年的人的眼睛里又闪过一丝冷笑。

姑娘贴墙站在通往隔壁房间的门口，听到这句话，卖弄风情地耸了耸肩膀。

“令人厌恶的浪荡子。这种人不配得到女人的青睐。”

“我要女人干什么？”年轻人突然把手往上一举，慷慨激昂地大声喊道，“我需要的是……”

“够了，我说！”已过中年的人提高嗓门说，“开始准备吧。把其它证件也带上，以备不时之需。”他上衣兜里掏出两张身份证，打开看了看，然后给了那个姑娘一张，另一张给了年轻小伙子，“你们熟悉一下，一定要记住。”

年轻人接过身份证，仔细看了看，冷笑一声，说：

“霍赫洛夫！啊呀，不幸的霍赫洛夫。不幸的……”

“我要这身份证干什么？”姑娘一边惊奇地问，一边转动着手中的身份证。

“如果他们要看的话，你就拿出来。那么你去穿衣服吧。”

姑娘耸了耸肩膀，消失在门后了。

已过中年的人看了看表。

“那么你，瓦西里，也该准备了。”他对留小胡子的人说。那人坐在桌子跟前，口里仍然嚼着东西。

“嗯……”

“起来，去准备吧。”

那人吃力地站起来，抻了抻瘦小的灰西服上衣。上衣下边露出颜色花哨的格子翻领衬衫。他向门口走去。

“把一切都准备好，明白吗？”

“嗯……”

他一边走一边还在嚼着东西。

他离开以后，已过中年的人朝阿列克转过身来。阿列克凝神望着空间，若有所思地吸着烟。

“你，阿列克，应该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到车站去。它们在前厅里挂着，你看见了吗？”

阿列克无精打采地耸了耸肩：

“可是这……”

“没关系。你穿自己的拉链衫已经在市里太被人熟悉了。我再向你讲一遍，这是一场严峻的战役。这样的战役，我们以前还没有经历过。如果我们失败……那么你自己明白。”

“我明白，亲爱的。”年轻人抑郁地点点头，叹了口气，补充说：“你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想家了。我的二老双亲深信我有一份稳妥、

安定的工作。要知道，他们问我什么时候休假，什么时候到他们那里泡海水浴。他们还询问为什么我……”

“我更感兴趣的是，你是怎么回复的。”已过中年的人强调说。

“你以为我会怎样回复他们呢？我写信说：‘我会去的，亲爱的父母。可是我们现在正在做年终总结，我非常忙。’”他忧伤地淡淡一笑。

“我不大喜欢你这样的情绪，亲爱的。你一会儿说，你不需要干别的工作，一会儿又发牢骚。这个我不喜欢。”

“你以为我喜欢吗？但我还是这样想：这份差事反正早晚得洗手不干。喏，你大概已经晚了。我有机会。我的心在这样提示我。”

“你会因思念塔玛拉而憔悴的，”已过中年的人用头点了点隔壁房间的门，淡淡一笑说，“这就是他妈的心给你的提示。”

“哎！你胡说什么？”年轻人沮丧地摆了摆手道，“这就是我们男人之间的谈话吗？”

“对于这样的谈话，你选择的时间不合适。”

“你这人不适合进行这样的谈话。”年轻人蹙起细而黑的眉毛回答说。

“我这人？”已过中年的人冷笑了一下，但他用那肿泡眼犀利而不怀好意地盯了交谈者一眼，“关于我的情况，你了解得多吗？哎呀，我这一辈子过得才真叫生活，亲爱的。忍受了一次次不公正——瞧，”他用手掌抹了一下很粗的脖子，“换了别人，两辈子都够了。可是我却默默地忍受着。顺便说说，我的一个恩人在这里，在博尔斯克。战前，他因为一件小事坐过牢。所以我现在就好比挂在他家的门钩上，只要他猛地一拉，我就彻底完蛋了。而他就是这种人，他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冷不丁地一拉，而且会毫不犹豫。我现在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年轻人抬起充满愤恨的眼睛望着他。

“你为什么保持沉默，啊？为什么让他活着？你害怕他，是吗？”

“时候不到。我们迟早要算账的。”已过中年的人不耐烦地望了望隔壁房间的门，“喏，她是怎么搞的？准备去参加舞会吗？”

“女人不管干什么，都像是准备去参加舞会，亲爱的。”

“离火车到达之前……”已过中年的人焦虑地看了看表，“只剩四十五分钟了。到了车站，你还得熟悉一下环境。那里什么人都可能有。唉，亲爱的，”他淡淡一笑，往前移了移，搂住了年轻人的肩膀，“如果这场战役得手了，你会得到例外休假的，假期两个月。而且全部酬金预先支付。懂了吗？只是不能气馁，不能悲观失望。要快快活活地活着。”

“我本来活得就挺快活，”年轻人点了点头说，“不会有更快活的了。”

这时，门开了，姑娘走了进来。她穿一件很贵的蓝西服上衣，匀称秀拔的腿上穿一双颜色花哨的方格长筒袜，脖子上戴一条细细的金项链，上面饰有一枚挺大的宝石坠子，恰好垂在胸前，十分好看。

“哇，简直美丽得令人目眩！”年轻人感叹道，滑稽地眯缝起眼睛。

“塔玛拉，把白兰地拿来，”已过中年的人出乎意料地吩咐道，“我们干一杯饯行酒。”

“啊呀，说得对！”

她急忙向餐柜跑去。年轻人从沙发上站起来，伸了伸懒腰，露了一下牙齿，说道：

“你说得对，应该干一杯。热血将会沸腾，心儿将会歌唱。给我来大一

大杯，亲爱的。”他对姑娘说。

她面带微笑，把高脚杯移开，给他斟了满满一玻璃杯。

他们三个人碰了杯。

“喏，愿上帝保佑。”已过中年的人说。

在前厅里，两个年轻人穿外衣的时候，他又担心地说了一遍：

“你要当心，阿列克，他们可都是不要命的人。他们无所顾惜。”

“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年轻人快活地说，我是雄狮，而不是人，亲爱的。”

“狐狸毕竟是狐狸。你要以计谋取胜。”

“万无一失。”年轻人有把握地说，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他们离开以后，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已过中年的人这时才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然后锁紧眉头，一边朝房间走去，一边恶狠狠地大声说：

“你会得到我给你的假期的，狗东西。而且这根本不影响对你们的监视……”

列车在白雪皑皑的原野上行驶着。广袤的原野上丘陵连绵，微微起伏，呈现出一片淡淡的蔚蓝色，一直延伸到天尽头——没有一棵小树，没有一个冲沟，也没有一个小村庄。肆虐的暴风雪刚刚停了，铅色的黑压压的乌云这时在空旷的地平线上空可怕地翻滚着。渐渐没入乌云后面的太阳用预示着不祥的火红色的霞光从下面照射着天际。

“啊呀，好恐怖的景象，”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摇了摇头。他站在窗户跟前，怕冷地用睡衣遮住丝绸条纹衬衫下边凹陷的胸脯，“简直可怕极了。您来看看。”他转过身对同包厢的邻座，一个脸色红润、性情温厚的胖工程师说。

“是啊，气势磅礴。”那人同意道，又微微一笑，补充说：“不是可怕，不是恐怖，而是气势磅礴。”他放下报纸，打了个哈欠，“已经看不清楚了，或许要把灯打开了吧？”

“对，对，打开吧！”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一面非常客气地高声说，一面恋恋不舍地把视线从窗户上移开，并且又冷得动了动肩膀，“说真的，这种景象甚至对心理都会产生影响。”

“您听我说，老兄，我们去用晚餐吧，怎么样？”胖子出人意料地提议道，“趁现在您还未因那些可怕的事而对晚餐失去胃口。等我们到达博尔斯科，天就晚了，旅馆里的餐厅就不营业了。而这里餐厅与我们只隔三节车厢。决定了吗？”他有力地拍了一下膝盖，愉快地加了一句：“我们喝上一两杯，说不定您一高兴，我们再多喝点儿呢。”

“不行，”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闷闷不乐地摇了摇头，“您要知道，我有胃溃疡。我就在这儿吃点儿就行了。妻子给我烤了面包干，有一瓶牛奶，还有溏心儿鸡蛋。您要知道，任何烧烤的、咸的和辣的食品我都不吃。”

“你可真是的，天哪！”胖子感叹道，“他还有胃溃疡！哎，走吧，我们要点营养食品。那里有，我真的告诉您。走吧，我们到那里坐一坐，散散心。”

他如此坚决地说服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以致后者到底依从了。

他们换上衣服，离开包厢，来到狭窄的、轰隆作响的过道，向过道尽头走去。他们随着车厢有节奏地颠簸，一会儿靠在这边，一会儿靠在那边。他们走过哗啦作响的、透风的车厢连接处，来到下一节车厢，然后是第二节，

第三节，最后来到了餐车。

这里灯火通明，人声嘈杂。但仍然还有空位子。

落座以后，话题突然完全转到别的方面了。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把眼睛瞪得溜圆，机械地一块块揪着白面包瓢，开始讲述自己单位里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

“……您知道吗？他到了处里，没有向任何人问一声，径自冲着我走过来，平静地从自己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什么文件，转身离开了，俨如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真有意思。那么后来呢？”

“要知道，我不知为什么觉得不妙，担心起来……”

“那当然。”胖子讥讽地插了一句。

“不，您别冷嘲热讽。当时我跟着他出来了。只见他走到一个人跟前，把文件拿给他看，急急忙忙说着什么，于是那人赶紧掏出钱，给了他。好大一包！要知道，我心里七上八下地，有点不安起来。我们可不办理任何现金支付业务，只办理款项转账。您知道吗，他一拿到这笔钱，便迅速地下二楼去了。这时我也跟着他下了楼……”

“您真是个不顾死活的人。”胖子仍然用讥讽的口气说。

“不，说真的，我不是那种所谓多么勇敢的人。不过当时只是感兴趣罢了。甚至觉得纳闷儿。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啊，是啊，我发现您喜欢猜谜语，”胖子笑起来，“亚洲有一条河，由四个字母组成，第二个字母是‘a’……”

“不，您不要嘲弄！后来一切都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激动地扶了扶眼镜，打断他说，“在二楼，他把这些钱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转交给另一个人。可是我看见了！我甚至感到一种恐惧，有一种说不清的预感。”

“嗯。这当然可疑。”

“您看！第二个人——我不知为什么把他记得非常清楚——迅速地朝我迎面走来，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他甚至还面带微笑。正好这时弗谢沃洛德·阿尼西莫维奇请我到 he 那里去。这是我们的总工程师。过了半小时，我们听见走廊里吵吵嚷嚷，乱乱哄哄。我吓得半死，倏地站起来，往三楼跑去。我看见正是刚才把钱交出去的那个人在走廊上急得团团转，大喊大叫，几乎要哭了。‘你们那个工作人员在哪儿？’他喊道，‘他把我的钱拿跑了！’我们的人跟着他跑来跑去。总之一句话，糟糕透了。后来查明……”

“是啊，是啊，查明是怎么回事？”胖子随声问道。

“原来，那两个奸商打着我们这里出售‘伏尔加’汽车的幌子，把那个公民领到我们这里来了。真难以设想！我们从来没有出售过什么汽车！他们竟如此诡诈地把他骗了。简直可怕！第一个人，就是跟那位公民一块儿来的那个，第二个人，就是那位公民把钱交给了他的那个，是从一个办公室里出来的。第一个人走到第二个人跟前说：‘就是这位公民，维克托·伊万诺维奇，想买一辆我们的汽车。’那人回答说：‘那好。只是要先开票，得快点，收款员马上就要走了。’‘您能开吗？’‘当然，’他说，‘公民同志的证件没有问题吧？’想想吧，厚颜无耻之徒！总而言之，他们把他完全搞糊涂了。他们当然溜掉了。而那个，第一个人，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为了让人相信，竟然把身份证留给了他。‘既然如此，’他说，‘那我从你们这里把钱拿上，’

这身份证暂时搁在你们这里。你们不认识我。’您看，这身份证自然是假的。”

“假的？”胖子怀疑地重问了一句。“多半是偷来的。”

“咳，就算是偷的吧！”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气愤地大声说，“这改变不了真相。事实本身够骇人听闻的。发生这种事，叫人活着都觉得疼得慌。而且会从四面八方听到……”

“算了，算了，又说无聊的话了，”胖子笑了起来，“您，老兄，又惶悸不宁了。而且从四面八方！我告诉您，对那些玩忽职守的人应严加惩处。”

“不，您简直让我吃惊！……”

他们争论起来。

他们吃完饭以后，车窗外面已经漆黑一片了。餐车里，大部分桌子已经空了，只有两三伙喝得微醉的人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一个疲惫的、渐近老境的女服务员坐在餐柜旁边的角落里，不以为然地时不时朝他们那边望望。

“您看，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胖子看了看表，心满意足地确定说，“您要知道，再过一小时十五分钟，我们就到博尔斯克了。”

“您说什么？”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着急起来，“该收拾行装了。”

“啊，来得及。您到博尔斯克待很长时间吗？”

“只待两天，然后去莫斯科。长期出差真受不了。出差得了胃溃疡。不管到哪里，什么东西都不能吃。我请求不要再派我出差，可是不行，还是派我。”

“跟领导没搞好关系吧？”

“哪里！恰恰相反。”

“那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信赖。”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要知道，我们那里资料短缺的情况快过去了。可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知道吗，我特别担心检查时把什么东西漏掉。我到各地去，大家都认识我。”

胖子好奇地看了看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

这时，窗外的黑暗中闪过星星点点的灯光。灯光渐渐多起来，时而散开，向远处什么地方奔去，时而一下子逼近路基，变成一个个黄色方格。不知一座什么工厂的灯火通明的巨大厂房显现出来，旋即消失在后边，代之呈现出一座座小平房，窗户里重又亮起了灯光。

车厢在道岔上颠簸起来。路分为两股、三股、更多股。一些亮着灯的站台、仓库，一列列黑咕隆咚的、顶盖上落满雪的空车厢徐徐掠过。时不时地传来远处电气机车的汽笛声和喳喳作响的、犹如易碎物质破碎声的、干巴巴的信号声。

列车渐渐驶近博尔斯克。

乘务员走进包厢，把带有一个个小口袋、插着白色铺位号牌的黑色漆布放在膝盖上摊开来。

“票你们还要吗？”她问。

“当然要！”胖子快活地回答，“我们是公职人员，亲爱的。我们要报销的。”

乘务员把票交给他们，然后整理了床铺。

“我们快到了，”她离开时说，“停留十五分钟，也许时间更短一些，因为晚点了。”

隔壁包厢里，人们已经开始躺下睡觉了。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穿上大衣，把衣领竖起来，戴上帽子，手里提着破旧的手提箱，急不可耐地在过道上走来走去，眼镜片不时发出闪光。

列车明显地开始减速了。

窗外闪过灯火通明的高高的站台：系着白围裙的搬运工推着运货车。

乘客们——原来相当多——都聚集在过道上。

列车终于哐啷一声停住了。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和他的旅伴随着人流走出车厢，不由自主地朝四周环视了一下。

“噢，天气还是相当冷啊，”胖子精神抖擞地说，“怎么样，出发吧？”

“是啊，是啊，当然，”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回答说，“真的，太冷了。”

他们一边顺着站台朝前面很远的地方，亮着“城市出口”的牌子走去，一边绕开站在那里的人。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突然停下来，压低声音说：

“我的上帝，这好像是他……”

胖子由于习惯不知不觉地又朝前走了几步，然后惊诧地回头一望，只见他的旅伴惊慌失措地在原地转来转去，便回到了他身边。

“您怎么了，老兄？丢什么东西了吗？”

“您知道吗……您知道吗……我甚至不敢说出来……可是，我觉得……”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嘟嘟囔囔地说起来，忽然开始仔细地审视自己的手提箱。

胖子也俯身去看手提箱。

“手提箱怎么了？您不要这么着急。好像有什么不得了的事似的……”

可是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突然改用吱吱的声音小声说：“什么‘好像有什么不得了的事’？”他生气地说，“您看一看吧。千万要悄悄地。您看见那边亮着路灯的柱子跟前有一个人吗？高高的个子，胖乎乎的，戴着鹿羔皮帽子？”“哦，看见了，”胖子讽刺地说，“这人是谁？乔装的世袭亲王还是逃犯……”

“我觉得这就是他。您明白吗？”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小声说，“就是当时把钱拿走的那个人。”

“这只是您的幻觉而已。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胖子断然反驳道，“走吧，走吧，这样站着会冷的。”“我不能走……”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诉苦地说，“这真可怕。应当……应当把他阻拦住……”

“什么？您发疯了！我敢保证，您肯定弄错了……”这时，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所指的那个人朝四周张望了一下，匆匆忙忙地向旁边走去，转瞬间不见了。“我的上帝，他好像在躲避我们。”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惴惴不安地小声说。

“他在避风，而不是避我们。”胖子愤愤地反驳道。可是过了不一会儿，他们一切都弄清楚了。

有两个人——一个是戴着帽子、穿着黑色大衣的高个子年轻人，一个是穿着灰鼠皮大衣的姑娘，走到刚才那个人站过的地方。姑娘不知嘀咕了句什么，那年轻人便举起一只手，喊道：“我们在这儿！”

有两个人离开在站台上徐徐行进的一群刚下火车的乘客，走到他们跟前，其中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大手提箱，看样子很重。姑娘说：

“请互相认识一下吧。这位是……”

她的话被嘈杂的人声淹没了。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回头看了看，踌躇不决地说：

“这里应该有警察。我们只要把情况告诉他……”

“天哪，他怎么会在这里呢？”胖子懊丧地反对说，“您到底走不走？”

“您想要我们离开吗？”

“是的，我想要我们离开！”

他们又争执起来，同时仍然装作摆弄手提箱的样子。

这时，路灯旁边进行了下面一段谈话：

“怎么样，我们走吧？”姑娘问拿手提箱的人。“你们就在那里过夜吧。”一直十分戒备的那两个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个回答说：

“不用了。我们去住旅馆。我们明天早上来。”

“那我就劝不了。”高个子年轻人含有意味地说。

“喏，为什么？”来客中另一个人谨慎地问。

“我听说今天那里发生了切普。使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感到胆战心惊。”

“切普是什么意思？”那人又问道，“请解释一下。”

“喏，怎么说呢？”年轻人笑了笑，“总之一句话，就是发生了严重事故。死了一个人还是怎么的。警察正在对所有的人进行审查。”

“啊哈。明白了，明白了。谢谢。”那人点了点头，又看了一眼沉默不语的同伴，然后问姑娘道：“彼佳为什么没来，啊？你为什么带生人来？”

“我单独一个人害怕。彼佳在等你们。他不愿意到这里来。要知道，他这人可慎重了。”姑娘说。

来人摇了摇头。

“带生人来不好。我们不相信。”他又看了一眼高个子年轻人，“他可靠吗，啊？”

“当然可靠。”姑娘急忙保证说。

“也喜欢赚钱吧？赚大钱？”

“谁不喜欢赚钱呢？”

“当然，当然，”来人点了点头，“谁不喜欢赚钱呀。住得远吗，啊？”

“一点儿不远，亲爱的，”高个子年轻人插嘴道，“步行很快就到了。或许能碰上一辆出租车。”

“房子是单独的吗？”

“是单独的。完全是独门独院。”

“周围有花园吗？”

“有一个院子，并且有两个出口，分别通向两条大街。对这一行我们也懂，亲爱的。”

这场谈话好像渐渐使高个子年轻人兴奋起来。但是来人似乎没有发觉这一点。

“好吧！”他咂了一下嘴，转身对同伴说，“我们去吧，瓦尼亚，啊？”

那个叫“瓦尼亚”的点头作答，把同伴叫到一边，并提起手提箱，径自走了。

“等一等。应该合计合计。”那个同伴说。

他们小声嘀咕了一阵，然后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个被称作瓦尼亚的人有点粗鲁地说：

“我们同意了。你们可要当心，如果出了事——我们可不是吃干饭的。”并恐吓地补充说：“我们是讲认真的人，不懂得玩笑。”

来人提起手提箱，于是他们一伙急忙顺着站台向通往市里的出口走去。

“您看，您看，”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惊惶地小声说，“这个人跟着那帮人走了。我担心他有什么图谋。或许应该警告他们一下？”

“当然。而且他们会立刻把他拦住。”胖子高兴地附和道，“我真不明白，您怎么就冻不坏呢？我好歹有这一身肥肉保驾，要不然……”

“哪里！我简直要冻死了，”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大声喊道，“我担心明天会……”

“啊！您老是有担不完的心。说实在的，您的表现就像个小娃娃。”

他们一边在站台上走着，一边彼此交谈着，目光始终盯住那个戴鹿羔皮帽子的身宽体胖的人。那人小心地走着，竭力躲在走在前面的人背后。

当他们来到空荡荡的站前广场时，天已经很晚了。胖子说：

“我们加快步伐，追上他们。”

“不，不，现在不是时候，”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惊惶地说，“否则他会发现我们在靠近他们……而且……而且他会躲起来，但愿不要发生这种情况。或许他还会一下子认出我来。”

“咳，您挺懂行。您原来竟是个职业密探。您可要考虑到，往后要想靠近会更加困难。至少周围现在还有人。”

“是啊，您说得对。”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迟疑不决地说。

这时，后面跟着那个不明身份的人的那些人穿过广场，在一条不知什么大街的转角处消失了，那个人紧随其后。于是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和他的旅伴只好别无选择地朝同一方向走去。

前面展现出一条长长的、阒无人迹的大街，稀稀拉拉地亮着路灯。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突然加快脚步，好像被勇敢，更多的则是被不顾一切所驱使，开始追赶走在前头的那个人。

胖子惶恐不安地问：

“说实在的，您想要干什么？”

“截住他……”

“那么然后呢？”

“就……就叫喊……让那些人都听见……”

“您发疯了！他会把您……”

“万一有情况，他们会帮忙的……况且我们毕竟是两个人，他不敢。”

这时，那人听见背后有脚步声，回头看了看。他大概断定这两个人不会对他构成危险，便放心地朝前走去，他可能觉得赶上他是完全自然而然的，因为人们都在赶路，冻得够呛。既然两个人都拿着手提箱，当然是刚下火车。

当他们相距已经非常近的时候，那个不明身份的人甚至闪开了道，让他们走在前面。

可是其中一个追上他的人，戴眼镜的瘦子，猝然停下来，一边用空着的手不好意思地扶扶眼镜，一边非常客气地说：

“对不起，我想请问您……”

“我没有时间，公民。”不明身份的人嘟哝了一句，一边把脸掩进立起来的衣领里，不知是为了避风还是为了避偶然相遇的人的目光。

“不，不，我恳求您。”

“我说了，我没有时间。”

不明身份的人转过身，打算往前走，可是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一把抓住他的大衣袖口：

“我请求您回车站一趟。”

“什、什么？”那人大吃一惊。

“是啊，是啊。应该弄清楚……”

这时，不明身份的人匆匆瞥了一眼渐渐走远的那伙人，用力把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推开，撒腿跑掉了。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用沙哑的声音喊道：

“您胆敢动手！……”

“抓住他！……抓住他！……”胖子叫喊起来。

他，还有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也跟在后面飞快地去追赶那个跑掉的人，但是那人溜进一个黑洞洞的院子里不见了。

当他们又跑到大街上时，这里已空寂无人了。

“那伙人在哪儿？”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气喘吁吁地问，“他们到底在哪儿？……”

“看来，他们都走了。”

“可是他们听见我们喊了吗？我看见有一个人甚至回头看了看。”

“啊！”胖子摆了摆手，擦去额头上的汗，“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您这样的英雄。”他笑了笑，“喏，我希望，您现在该放心了吧？”

“那有什么办法呢？”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一边心绪不佳地回答说，一边环顾着四周。

“怎么叫‘有什么办法’？可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比如说，在那个院子里设埋伏。”

“哎呀，您少开玩笑。他跑掉了，这简直太可怕了。”

他们彼此交谈着，重又来到空荡荡的站前广场。这里风特别大，卷起了低吹雪，刮得路灯摇摇晃晃，长长的身影时而投在闪闪发光的布满雪的马路上，时而映在周围一座座沉静的、窗户里黑黢黢的楼房上。唯有那栋中间矗立着高高塔楼的长形的、敦实的车站大楼里还亮着灯。

“也许我们该到那里去吧？”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朝车站那边挥了挥手，“打听一下这个地方哪里有旅馆。”

“随便去什么地方都成，只要走就好。这可恶的风……”

他们穿过广场，慢腾腾地向车站走去。

弄清楚了：旅馆就在附近。“坐无轨电车有两站来路，”偶尔碰上的一个行人一边向他们解释，一边朝那条大街（他们就是刚刚从那里过来的）的方向挥了挥手。

“他以为我们随身带着无轨电车呢。”胖子悻悻地发牢骚说。

他们冻坏了，拖着疲惫的身子终于来到旅馆高大的正门口。门口亮着两盏带厚重台座的巨大球形灯。

旅馆里没有空房间了。由于他们把冷酷无情的女值班经理说服了，才得到允许在前厅里的长沙发上坐到天亮。

“哎，我们要是见机行事，早就弄到房间了，”胖子叹了口气，解开大衣，“这个泼妇直往手心里盯。”

“您是指……以某种方式……贿赂吗？”

“正是，亲爱的，正是这样。”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只短叹一声，作为回答。

第三章 市场上的货亭内外

像往常一样，谢尔盖七点钟醒来了。房间里一片昏暗，凉飕飕的。很难辨别出周围的物体。墙边那块模糊的斑点是衣柜。窗户跟前是写字台，上边的灯被谢尔盖移到了床头柜上：他睡觉前看书了。

宽大柔软的床铺又使人闭上眼睛，昏昏入睡了。不行。谢尔盖伸出一只手，从床头柜上拿起表。喏，当然，正好七点。该起床了。他果断地撩开被子，只穿着裤衩背心便跑到窗户跟前。冷气从打开的通风小窗里透了进来。

谢尔盖看见宽阔的大街上盖满了雪，稀稀拉拉的行人使街上显得更加冷清。对面一座高楼里已经有几家窗户里亮起了灯。“勤快的人开始起床了，”谢尔盖心想，“你也该行动了。”

他把一小块地毯拉到房间中央，开始做体操。他的身子变成了绯红色，感到热烘烘的。“维季卡现在当然在逃避做操，”谢尔盖心想，“只要我不在家，他肯定偷懒。”

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谢尔盖这时正在刮脸。局值班员用朝气蓬勃的声音问，什么时候把汽车派到旅馆来。

“谢谢，不用了，”谢尔盖回答说，“这里好像很近，我步行就到了。十点钟有人来找我，您盯着就行了。”

他把话筒挂了。他在这座城市里的生活和要查办的新案子就这样开始了。这件新案子照常是重要的，对于他来说，现在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他将怎样查清这个案子呢？结局会是什么样？没人知道，他也不知道。问题就在这里。方案当然是有的，但现实比任何一个方案都复杂，而且会把不可能预料到的情况悄然塞进来。说实在话，已经塞进来了。好像就专等着他的到来似的，而且有一次……这个女人年轻、漂亮，他一直忘不掉她。喏，姑娘，你的行为举止怎么能这样不慎重，你怎么能允许自己这样呢？……你相信了？你喜欢上他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你是如何到这里来的？而主要的是，他是谁？……

谢尔盖匆匆忙忙地刮完脸，穿好衣服。他觉得两手发颤。“你激动了吗？”他恶狠狠地问自己，“你可怜她了？非常可怜？那你就不要再激动了，好好想一想。这是那条链子中的一环。动动脑子，考虑考虑吧。”

这个女人身上大概带着钱，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虽然……那封奇怪的信。就是说，另有犯罪动机？不，不，这一点现在不可能下结论。应该首先搜集材料，加以研究。对于那些案件和目前这个案件，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它们会在某一点上相互交叉，肯定会有交叉。

谢尔盖走过长长的走廊，把房间钥匙交给值班员，轻捷地跑下楼去。

年轻的女值班员望了望他的背影。一个有趣的男人。漂亮的黑西服，白尼龙衬衫，打了一个时髦小结的灰领带。他本人长得仪表堂堂，头发乌黑，像他的西服一样，脸庞也是黝黑的，只是有一道伤疤，灰色的眼睛是善良的，嘴唇丰满……他是从莫斯科，从机关里来的。关于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已经猜到了。警察局为他指定了专用房间。而就是昨天他们那里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件。他大概就是为此事而来的。

谢尔盖来到前厅。值班经理的小窗口跟前仍然挤着一堆人。有的人精神焕发，看样子是刚来的；有的人睡眠不足，无精打采，愁眉苦脸，无疑，他们从昨天晚上就开始等待空房间了。真糟糕。

他顺路走进一家咖啡馆，很快地吃了早点：一瓶牛奶和夹肉面包。他看了看表。好了，到时候了。

谢尔盖一来到街上，便感到严寒刺骨。“零下二十五摄氏度，说不定更低。”他思索着，并把大衣领子立了起来。

周围行人已经很多了，蓝色的无轨电车在行驶，一辆辆汽车疾驰而过，天空阴沉沉、灰蒙蒙的，雪飘飘洒洒，下得不大。

谢尔盖朝四周环顾了一下。左边，在大街的尽头，是车站。他应该往右到广场，然后再往右，刑侦局值班员是这样解释的。

他很快走到一座整齐的三层楼跟前。楼的正面宽大的窗孔上饰有雕塑装饰，被均匀地涂上灰色，这样大概不会引人注目。但是现在所有的凹陷处和凸出部都覆满了雪，于是楼房正面呈现出一道道新奇独特的曲线。

值班警察表示尊敬地行了个举手礼，看了看证件。于是谢尔盖上楼去了。刑侦处在二楼。

萨沙·罗巴诺夫坐在位于长走廊紧头上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他看见谢尔盖进来了，便迅速站起身，从桌子后边走过来。

“喏，睡得好吗？”他一边问，一边帮谢尔盖脱下大衣，挂在衣柜里。“换了新地方，睡得怎么样，啊？”他仿佛预料到答复似的，又补充说：“我说了让你到我那里去住的。本来就是嘛。”

“一切正常。”谢尔盖一边表示异议，一边搓着冻僵的手，“你们这里旅馆没说的，就是床位紧缺。”

“什么地方不紧缺呢？我们正在盖新旅馆，紧挨着车站。一座大型旅馆，采用最新的科学技术，配有空调装置。到那时你再来吧。”

“好的。既然我现在已经来了，那我们就着手干起来吧。人都召集来了吗？”

“有两个已经到了，另一个马上到。我的同事们会接待他们的。你放心好了。”

“不，我要亲自跟他们谈谈。你现在去处理那件命案吧。”

“你知道吗，这里头又出现一个情况。”

罗巴诺夫忧虑地皱了一下鼻子，用手捋了捋淡黄色的头发。他的装束也显得十分考究：雪白的衬衫，棕色的细领带，擦得油光锃亮的尖头皮鞋。

“喏，又出现什么情况了？”

“你知道吗，抓来一个小男孩。他吸食毒品，下流东西……”

“叫他父亲揍他一顿。”

“他吸的是大麻膏。我们这里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毒品。”

“谁把他抓来的？”

“我们一个同事，刚才来上班的时候在自家楼门洞里抓到的。他们当时有两个人。你看，其中一个溜掉了。我们当然会找到的。”

“那小伙子说什么？”

“他说他是在市场上买来的。一个什么叔叔卖给他的。他说，他们觉得好玩才决定尝一尝的。毒品这种东西也是尝着玩的吗？”

“是啊。这很危险。他有什么症状吗？”

“症状很糟糕。大哭大叫，泪如泉涌。他的神经是不是已经被毒害了？我从来没见过小伙子这样嚎陶大哭的。哭得简直都没气了。看着都令人害怕。”

“那就只好陪他到市场上散散心了。”

“当然，只好如此。先给他灌点儿缬草酊解解毒，把他救过来，你看怎么样？缬草酊对女人挺见效。”

“行，给他灌吧。不会有坏处。那么你们就着手处理那件命案吧。把我安顿在哪里？”

“我先引见你跟我们局长认识认识。他吩咐过让你去一下。然后你就坐在他的副手的办公室里好了。他出差去了。我们走。”

他们上了三楼，在同事们好奇的目光注视下穿过接待室，来到了局长办公室。

半小时以后，谢尔盖把其中一个等待接见的人请进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赫拉莫夫，他坐在旁边靠窗户的地方。

一个身量魁梧、仪表堂堂的男子推门走进来，穿着毛皮大衣，敞着怀，一只手里提着大公文包，另一只手里拿着“莫斯科人”牌海狗皮帽子。他的脑门由于出汗而发亮，刮过的胖嘟嘟的脸红通通的——这个人觉得很热。

“请坐吧。”谢尔盖对他说。

“我没有功夫坐下来，同志，”那人一边用教训的口气回答说，一边在椅子上坐下来，“我早就该上班了。有人也在等着我呢，也在……”

“我应该向您道歉，”谢尔盖息事宁人地微微一笑，“那么您对他们也说声抱歉。我决不耽搁您很长时间。”

“您已经把我耽搁了。”他发牢骚说。他倒不是那么气势汹汹，多半是感到委屈：“到底有什么事啊？”

“乍看起来小事一桩。乍看起来，”谢尔盖强调说，“请告诉我，这是您的身份证吗？”

那人感兴趣地接住递给他的身份证，还没有打开便说道：

“没错，是我的。那么是你们找到的吗？”

“对。您能不能说一说，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和它分离的？”

“在心情最郁闷的情况下，”那人淡淡一笑，“甚至都没来得及告别。简单地说吧，是被偷走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声明中都写清楚了。”

“我们想把某些细节弄清楚。譬如，您的身份证是在什么地方被偷的，您还记得吗？”

“几乎肯定是在无轨电车上。当时车上有一个形迹非常可疑的家伙在旁边蹭来蹭去。”

“您能记起来他长得什么样儿吗？”谢尔盖瞥了一眼不动声色、正在吸烟的赫拉莫夫。

“长得什么样儿……”那男子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这我记不清了，就觉得那家伙非常可疑。”

“您也许能记得他穿什么衣服吧？”

“嗯……穿什么衣服？大体上说，跟大家穿的一样。”

“是蓝大衣吗？”

“不，不。不是蓝大衣，是黑大衣。而且……没有穿大衣。我现在想起来了。对，对，穿的是棉袄。”

“戴一顶呢帽子，对吗？”

“哪里！是带护耳的棉帽子。而且他的脸发肿，有粉刺。一双黑眼睛贼溜溜的，骨碌骨碌乱转。当时我还心想：这人一定是骗子。”

“干瘦干瘦的，矮个子？”

“不，”那男子摇了摇头，“比我高。您知道吗，跟这种人打交道很危险。这种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谢尔盖不易察觉地瞥了赫拉莫夫一眼，赫拉莫夫也同样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

“请告诉我，”谢尔盖又问道，“要是您碰到他，您还能认得出来吗？”

“嗯……好像可以吧……”

“那么，谢谢您，阿法纳西耶夫同志，”谢尔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多有打搅，再次请您原谅。我们就不再耽搁您了。是不是需要给您开张证明，说明您是在我们这里耽搁了？”他笑了笑，“大概不需要吧？”

“好吧，那就给我开个证明吧，”那人很有风度地点了点头，“要不然好像是为了夫人而耽搁了似的。”

当阿法纳西耶夫点了点头，离开办公室以后，谢尔盖高兴地问：

“您有什么要说的吗，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

“像先卡·科克柳什内干的，中校同志。”

“您就直呼我的名字吧，好吗？”谢尔盖请求道，并又干练地问：“用什么方法？”

“他的方法。用刀片。”

“是这样。没什么，请下一个。”

下一个是一位身宽体胖、精力充沛的老太太，脸色红润，没有一丝皱纹。谢尔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请她坐下，她便一进门就得理不饶人地、气冲冲地说起来：

“这叫什么事啊，他要流氓，而我倒进了警察局？这是根据什么法规，根据什么指令，啊？你们以为我就不会请求主持公道吗？我会的，不管哪里我都敢去！你拦不住我！你不要笑，不要笑！我不吃你这一套！玛什卡，那人高马大的婆娘，恐怕写好了吧？我也会写，我识字！……”

谢尔盖惊诧地望着赫拉莫夫，用目光问他，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一个老太婆呢，既然第二个身份证也是一位男子的。

赫拉莫夫好像压根儿不会笑似的，不动声色地说：

“她被偷了。身份证是她丈夫的。她随身带着两个，一个是她自己的，一个是她丈夫的。”

谢尔盖笑了笑，感兴趣地看了一眼老太太。

“什么，什么？”她没有听清楚，“我偷什么了，你这个极不要脸的东西？我可是……”

“大妈，您请坐。”

“我干吗坐着？老在这儿坐着，可是我的事多得不得了。而且是坐在警察局里。我要走！你拦不住我……”

她不是很快就能平静下来的。当她终于搞清楚为什么召请她来以后，她的怒火才变为强烈的好奇。

“我的身份证也找到了，还是只找到了他的？”

“目前只找到了您丈夫的，”谢尔盖回答说，完全下意识地叹了口气，“您还记得身份证是在什么地方被偷的吗？”

“等一等，等一等，”老太婆一边表示异议，一边紧张地想着什么，“就是说，是这么回事。肯定得收取一半罚金。”

“您说什么？”谢尔盖没听明白。

“是这么回事。我丢了身份证，是不是要罚我十个卢布？肯定要罚的。可是已经把它找到了！”她得意地打量了一下两个男人，“要是另一个身份证找到了，你们就会再收取十个卢布，肯定的。找到身份证就要罚款，没有这样的法律。我要起诉。不管什么地方我都敢去！你拦不住我……”

“先别忙，大妈，别忙。你这是说到哪儿去了，真的！”谢尔盖懊丧地大声说，“请你告诉我，身份证是在什么地方被偷去的？”

“在什么地方被偷去的？在食品店肉食部被偷的。我们楼上的谢拉菲玛不排队乱夹塞，我就嚷嚷起来了，可她……”

“等一下，大妈。你看见是谁偷的了吗？”

“要是我看见是谁偷的，他这个该死的家伙还能溜掉吗？我会把他……”

“为什么说是‘他’？也许是‘她’呢？”

“不可能。只有一个男人在我们中间转来转去。肯定是他。”

“他长得什么样儿？”

“我难道还看他长什么样吗？我净看谢拉菲玛了，她简直像坦克，硬闯。你难道就不阻止她吗？”

“那么他是怎样把它们掏出来的呢？”

“就是这样掏出来的。用刀片在下边把书包划一道口子——唻啦！他倒还没有对我划一刀，可恶的家伙。当我叫喊起来时，他已经窜到门口了。”

“干瘦干瘦的？”

“什么干瘦干瘦的！壮实得很。一句话，像头纯种公牛。而且，顺便说说，他那丑陋的脸上净是粉刺。呸！”

“如果我们把他指给您看，您能认出来吗？”

“我能把他的眼睛抠出来！你别看我这样温文尔雅的，我的神经系统可不得了。”

把老太婆请走，同时与她保持最良好的关系，真是费了不少劲。当她终于离开以后，谢尔盖喘着粗气，对赫拉莫夫说：

“咳！审十个骗子都比跟这样一个老太婆谈话轻松。您大概又在想您那个科克柳什内了吧，啊？”

“是的。先卡。”

“他还在逍遥法外吗？”

“是的。他暂时还在逍遥法外。”

“能跟他谈一谈就好了。他把偷来的身份证都脱手给谁呢？”

“目前没有可能。他从市里溜掉躲起来了。”

“瞧，他工作很有经验，”谢尔盖心想，“只是萨什卡怎么跟他一起工作呢？”

“好吧，”他长吁了一口气，“请最后一个。”

赫拉莫夫清瘦而沉静的脸上突然露出难为情的神色。他好像有点不自然地咳了一声，说道：

“他睡着了。您的意思是他叫醒吗？”

“睡着了？”谢尔盖感到很吃惊。

“是的。”

“有意思。为什么不叫醒他呢？”

“只有等他睡醒以后才能跟他谈话。这个我们都知道。”

“明白了。不过还是得把他叫醒。”

谢尔盖强忍住了笑。

“是。”

赫拉莫夫出去了。少时，他带来一个睡眼惺松、脸孔发胀，穿着皱皱巴巴的大衣的人。

“进来吧，进来吧，彼得洛维奇，”赫拉莫夫说，“既然睡醒了，那就进来吧。”

那人半睡不醒地眨巴着眼睛，向桌子那边走去。

谢尔盖严厉地把他从脚到头打量了一番，毫不客气地问：

“身份证在哪儿？”

“什么？”

“出示身份证！”

“啊—啊……”那人似乎现在才明白管他要什么。“身份证？……”他挠了挠乱蓬蓬的后脑勺，“我没有带着。要去拿一趟吗？”

“您领到新的身份证了？”

“干吗要新的？”他有点晃晃悠悠，站不稳当。“我只有一个，怪不幸的，孤苦零丁。”

“这么说来，您把它放在家里了？”

“本来就放在家里放着。我马上回去取一趟。”

“我们送您回去。”

那人膀肿而昏昏欲睡的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他大声地抽了一下鼻子，晃了晃脑袋。

“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取。”

“我说我们送您回去。”

“那么你们能体谅我的处境吗？”

“能，”谢尔盖微微一笑说，“只是首先必须了解您的处境。您坐吧。”

那人蔫头耷脑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您请讲。”

“那么情况是这样。这大约是两个星期以前的事……”

“两个多星期。”

“也许是两个多星期吧。我到市场上去。任卡给了我三十戈比，让我买土豆。她当然事先把我搜了一遍，结果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就是说，什么也喝不成。要知道，心里火烧火燎地难受，想喝得要命。我又看见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喝，当然都是双双对对的。真的，有些人还在找伴。在这种情形下，你会怎么做呢？而我身上不巧只有三十戈比。嘿，我带着身份证呢。任卡可没有考虑到它的威力。于是我便把不幸的它，也就是身份证，交出去了。”

“‘交出去’是什么意思？”

“啊，是这样。就是说，我把身份证给了他，算作抵押。那么他给我……就是说，给我一瓶酒。”

“他是谁，这个善人？”

“他叫达尼雷奇，”那人仿佛沉入幻想地说，“是个热心肠的，开了一个日用小百货商亭。”

“他怎么会有‘伏特加’呢？”

“他经营的……”

“那么您的身份证在他那里了？”

“应该在。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弄丢的话。”

“也有这种情况吗？”

“肯定有。怎么？人吗，他也是人啊。”

谢尔盖瞟了一眼赫拉莫夫，后者又点了点头。现在这次点头的意思是，他认识“热心肠的人”达尼雷奇。“他领悟力真强。”谢尔盖暗自注意到。

一小时以后，他已经掌握了有关那个在集体农庄市场上开日用小百货商亭的彼得·达尼雷奇·谢苗诺夫的详尽的材料。这家伙是个非常奇怪的人，当然也是非常可疑的人。谢苗诺夫生活得十分阔绰，隔三差五地在市场上一两天不露面，无论是在博尔斯克，还是在其它城市，他都有许多熟人，经常来找他的还有一些女人。他是单身汉，好交际，人也不笨。刑侦局的人员对谢苗诺夫发生兴趣可不止一次了，然而，除了他们已经掌握的他的那些不足以作为罪证的鸡零狗碎的投机倒把行为以外，没有发现谢苗诺夫在任何其它方面有问題。

一位年轻的侦查员把有关谢苗诺夫的材料向谢尔盖做了汇报。看来，他很激动，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恨与沮丧。

“咳，我们一无所获，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就这些。他简直是条鳗鱼，逃脱掉了。可是这……这个狗东西，您都无法想象。”

“您能想象吗？”

“我能，我马上可以提出证据……”

“假如没有事实，那就没必要做任何想象。这只会造成妨碍，”谢尔盖说道，“需要的是事实，迫切需要。顺便问一下，您知道谢苗诺夫有没有亲属？”

“只有一个妹妹，带着女儿单过。”

“她有工作吗？”

“有。好像……在药店工作还是什么的。”

谢尔盖警觉起来。在药店！不，这个谢苗诺夫分明值得注意。把身份证给了他，现在可能会把安眠药也给了他。他想起旅馆里那个女人也是服安眠药而身亡的。于是他今天早晨头一次想起罗巴诺夫。很想知道他那里情况怎么样。没有来电话。他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电话机。但谢尔盖改变了主意。不，不，先紧着把一件事情做完再说。

“我现在有一个请求。您好像叫弗拉基米尔吧，下边呢？”

“就叫我沃洛佳好了。”他快活地回答。

“那好，沃洛佳。是这样，您现在有空吗？”

“我随时听您吩咐。”

“好极了。请拿出一张纸来。您写：第一，确切查清谢苗诺夫妹妹的工作地点；第二，这个药店的药品有没有被盗的迹象以及在药店管理制度中的任何有关舞弊、错误、缺点等。要根据一切渠道进行检查，清楚了吗？”

“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一切都会办妥的。”

只剩下谢尔盖一个人了，他看了看表。可以给罗巴诺夫打电话了。奇怪的是他一直没有来电话。看来，这件凶案把他忙得晕头转向了。

谢尔盖伸了个懒腰，果断地从桌子后边站起来，解开很紧的衬衫领子，往下放了放领带，在办公室里踱了一会儿步，然后走到窗户跟前。太阳在蔚蓝色的屋景中缓缓游动，照得人眼睛发花，皑皑的白雪在一座宽敞的大院子中的不知什么建筑的屋顶上和窗前一排四面伸展的枞树的树枝上闪闪烁烁。

电话铃响了，谢尔盖回到桌子跟前。

“中校同志，局值班员报告。这里来了一位公民，有事要声明。允许打发他到您那里吗？”

“为什么到我这里？”

“我认为，中校同志，您会感兴趣的。”

值班员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腔调。

“让他来吧。”

几分钟之后，有人犹豫不决地敲了敲门。于是门口出现了一位瘦削的、个子不高的人，戴一副眼镜。

“可以进来吗？”

“请进，请进。进来吧，请坐。”

谢尔盖感兴趣地仔细打量着来访者。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不好意思，揪着手里的身份证。身份证！谢尔盖从早上开始脑子里想的净是别人的身份证。而且这位公民……他的身份证大概出了什么问题。莫非……

“对不起，看在上帝的面上……”来访者终于开口说道，“我真的不知道……那位同志为什么让我来找您……其实也许是我完全弄错了……对了！”他恍然想了起来，“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科洛斯科夫，坐火车到这里来的。您看，这是我的身份证。”

谢尔盖一边拿起身份证，一边不由自主地问：

“这是您的吗？”他立刻笑了起来，“对不起，脑子里装的尽是别人的身份证。”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的脸上先是露出惊诧，继而是恐慌，最后是同情。

“是啊，是啊，当然，”他赶忙回答说，“您的事情本来就够多了。我还到这里来……”

“你到底有什么事？”

“我？您知道吗，我简直不知从哪儿说起。昨天，您要知道，在车站上……或许不。还是从头说吧。我是从莫斯科来的。我们单位不久前发生了下面一件……嗯……事故……还是怎么的。可是首先……”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十分激动，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但谢尔盖却越来越注意倾听，对这个人被带到他这里的这个幸运的机会感到惊讶。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否能把这一切讲明白。这件事真把我急坏了。简直不得了！怎么能这样呢？而且当时一个警察也没有！”

“请原谅，那么你确信，这就是那个人吗？当时天可是黑了，而且您很着急。”

“是啊，当然。但我还是觉得我没有弄错。”

谢尔盖沉思起来。

“那么这伙人，他跟着走的这伙人……他跟在这伙人后面，是这样吗？”

“我……我认为是这样。”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踌躇起来。

“那么这伙人您也看清楚了吗？”

“喏……当然或多或少吧。他们离得很远。”

“您到底记住了哪一个呢？”

“哪一个？……就是那个姑娘。她穿着灰鼠皮大衣。”

“还有呢？”

“还有？……其余的好像一个也没记住。要知道，黑魆魆的，看不清楚。有一个高个儿，一个矮个儿。”

“您知道吗？”谢尔盖突然产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念头，“你能抽出半小时的空闲时间吗？”

“如果需要的话，……那就……请吧。”

“好极了。”

谢尔盖摘下话筒，看了看玻璃板下边的电话表，拨了一个内部电话号码。

“我是科尔舒诺夫。可以弄辆车用半个小时吗？……到市场去一趟……对，对，是的。我这里有一位公民。顺便介绍一下……好的，您也跟我们一起去吧。”

他放下话筒，一面从桌子后边站起来，一面对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说：

“我们走。进行一次小型游览。”他微微一笑，“您是来客，我也是来客。我们去熟悉熟悉城市。说不定我们会在路上碰见‘熟人’呢。”

……市场上的人已寥寥无几。在一排排长长的板棚下边，有些地方还站着集体农庄的女庄员，她们把一堆堆胡萝卜、香菜、腌黄瓜摆在柜台上。一些来晚的主妇提着篮子走到她们跟前。鸽子在空柜台之间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几只麻雀在忙碌地觅食。

脏污的、被踩过的雪在脚下咯吱咯吱作响。

但是数不清的日用小百货、小五金、图书和食品商亭、小摊和小商店一个紧挨一个地顺着围墙一排排摆开，生意十分红火。集体农庄庄员把带到城里来的货物全部脱手以后，现在正急欲买东西。

谢尔盖和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跟着年轻的侦查员沃洛佳，环顾着四周，横穿过几乎整个市场。一个日用小百货商亭周围聚集了许多妇女，沃洛佳在不远处停下来，用眼睛指给谢尔盖看。

一个脸膛绯红而肥胖的人戴一顶鹿羔皮帽子，在柜台后边懒洋洋地走来走去。他不住地打哈欠，同时礼貌地用手轻轻捂住嘴，故作宽容地对围在商亭跟前的妇女说着什么，从货架上一会儿取下带闪闪发光的玻璃纸包装的男衬衫，一会儿取下小镜子，一会儿拿小瓶装的香水，一会儿又拿别的什么给她们看。后来，他消失在通向外屋的门后边，只一刹那功夫便出来了，又拿出一些不知什么纸包，不经意地往柜台上一扔，仿佛感到惊讶：谁会对这些玩意儿感兴趣呢。

谢尔盖警戒而不引人注意地对他观察了一阵，然后斜眼看了看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起初漫不经心地向四周打量着，但很快，他的注意力被他们旁边那个日用小百货商亭吸引住了。

“认得出来吗？”谢尔盖悄声问。

“好像是他。”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浑身发抖，犹豫不决地回答说，眼睛始终盯着那个卖货人。

“您不要那样老盯着他看，”谢尔盖提醒道，“否则他很可能也会认出您来。”

“是啊，是啊，当然。”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把目光移开了，由于出乎意料而打了一个哆嗦。

“天哪，这是她……”

“她是谁？”

“那个姑娘。您瞧，在柜台紧头上。她刚来。看见了吗？戴着灰鼠皮帽子。没错儿，百分之百是她。看见了吗，她在跟他说话？哎，我现在肯定这就是他。”

果然，卖货人一看见那姑娘便兴奋起来，忙不迭地隔着柜台向她俯下身去，结果那些女顾客挡着，一时竟看不见他了，而那姑娘马上离开了商亭。

谢尔盖回头看了看站在旁边的沃洛佳。

“沃洛佳，您看见那个姑娘了吗？”

“什么样的姑娘？”

“就是刚才站在柜台那里，戴着灰鼠皮帽子的？”

“没看见，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那我们就试试看，找一找她。真见鬼，刚才还在这儿站着呢。”谢尔盖懊恼地说。

他们急急忙忙地在市场上转了一圈，但哪里都不见姑娘的踪影，只好回到汽车这里。

他们离开一小时以后，商亭的后门打开了，戴灰鼠皮帽子的姑娘走到商亭和围墙之间的狭窄的过道上。她东张西望地看了看，带着调皮的微笑对送她出来的谢苗诺夫说：

“哎，我走了。我希望现在已经可以走了吧？”

谢苗诺夫点点头，一把将那姑娘搂在怀里，贪婪地吻了吻她的嘴唇，然后小声问：

“你爱我吗？”

“当然。要问多少遍才行呢？”

“你要当心，”谢苗诺夫忧心忡忡地说，“下一次你不许再干蠢事。你差点儿把那些人毁了。我不是说那个案子。”

“是他们想要去旅馆的。而那里，据说……”

“我们知道，”谢苗诺夫神秘地笑了笑，“一切都知道。”

“我可是替你担惊受怕了一场。”

“替我！鬼知道你把他们带到哪里去。”

“我知道吗？我以为……”

“算了，算了。你已经把一切都讲清楚了。已经摆脱出来了。”

姑娘委屈地撅着嘴，但她的双眸里却闪着调皮的眼神。

“你真是女妖。”谢苗诺夫心软了，一边说，一边又把她搂在怀里。

姑娘柔媚地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开，挥了挥戴着花色手套的手，向他告别，然后一边顺着围墙跑去，一边在商亭后面躲躲藏藏。她走到其中一个商亭跟前，推开一扇小门，来到大街上。看来，这条路她非常熟悉。

半小时以后，商亭里又闯进一个人来。谢苗诺夫对他发脾气说：

“你死在市场上才好呢。懂吗？你可找到开商店的地方了。”

在回局里的路上，谢尔盖问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

“您下榻在什么地方？”

“啊，说实话……现在还没有地方住。”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们答应说，旅馆里可能会有床位……可是那里的值班经理

却那么个劲儿……这一夜我们是在长沙发上度过的……”

“好了，我们给您安排旅馆，作为对警惕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奖励吧。”谢尔盖微微一笑。

到了局门口，他下了汽车，轻轻按住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的胳膊肘说：

“现在汽车送您到您所要去的的地方。一小时以后，您就可以在旅馆办住宿手续了。谢谢您做的这一切。那好，我们还会见面的。”

“这要谢谢您才是，我……给您添麻烦了，实在感到不好意思。”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难为情地、含糊地低声说。

谢尔盖一边上楼，一边勉强保持住平衡，不致使脚踩空。这是怎样的收获啊！现在可以逮捕谢苗诺夫了，他的这些罪证确凿无疑。跟这个酒鬼对质，这是其一。身份证在哪儿？怎么落到那个受骗者手里的？哼，您不知道？同科洛斯科夫对质，这是其二。您坦白吗？不？把您押送到莫斯科。在那里跟受骗者对质，这是其三。这一切，尊敬的谢苗诺夫，掩盖是掩盖不了的，说，谁是同谋，钱在哪里——一句话，您要老实交代，争取减刑。

谢尔盖讥讽地笑了一下。“怎么样，”他问自己道，“喘过气来了吧？血压降到正常标准了吧？那就开始周密地思考吧。”是啊，是啊，毫无疑问，十年前他就该把谢苗诺夫抓起来。而现在……不，不行。您再逍遥一阵吧，亲爱的，再逍遥一阵吧。我反正认识你，你不肯坦白你利用在火车上被催眠，并被抢劫者的身份证进行的第四次诈骗，那么使用安眠药你自然更不会招认了。这一点也会给你拿出证据的。到那时……到那时你就别指望对你宽大了，谢苗诺夫。两起凶杀。两起啊！最后一起——昨天旅馆里那个女人。你为什么要杀害她，谢苗诺夫，杀害一个年轻的女人，目的何在？

谢尔盖已经来到走廊上，一边走，一边皱了皱眉头，习惯地咬起嘴唇。他走到指定给他的办公室门口，用力把门推开。

罗巴诺夫懒洋洋地躺靠在桌子后边的沙发椅上，若有所思地吸着烟。看见谢尔盖以后，他活跃起来：

“你可回来了。跟你在一起真能把人活活饿死。你把什么东西丢在市场上了？”

“我在那里没有丢东西，我倒是在那里找到了东西。”

他那意味深长的语调使罗巴诺夫警觉起来。他赞赏地看了自己的朋友一眼。

“哎，请拿出来吧。你找到什么了？”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你先拿起话筒，给旅馆打个电话，订一个双人间。”

“给谁订啊？”罗巴诺夫担心地问。

“两位普通公民。他们已经在那里的长沙发上睡了一夜了。我想，够了。”

“得了，得了，你别杞人忧天了，”罗巴诺夫滑头地微微眯缝起眼睛，“你倒成了个大善人。”

最后他还是给旅馆打了电话。值班经理一口咬定没有空床位，但她后来让罗巴诺夫给旅馆副经理打电话。副经理更是叫苦连天，把客房紧张的状况描述得一塌糊涂，并让他去找经理。经理让他再去找值班经理。几经周折，房间总算定下来了。罗巴诺夫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呼哧呼哧喘着气，洋洋得意地看了谢尔盖一眼道：

“这下你信服了吧？现在开始讲吧……要不算了！我们先去吃饭。五点

多了，谢天谢地。”

食堂里已经没人了。服务员在做收尾工作，撤换桌布，在小卖部里把餐具弄得哗啦作响。

“玛申卡！”罗巴诺夫喊道，“可以劳驾您一下吗？我们有急事。”

胖胖的女服务员带有责备意味地朝他那边看了一眼，叹了口气。

“哎，又有什么事啊？”

“玛申卡，这是我的朋友，”罗巴诺夫巴结地说，“他从莫斯科来。”

“是吗？很高兴。只是……”

“玛申卡，他的生活还是按着莫斯科时间。那里现在正是午饭时间，请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谁又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一想呢？从早上七点就开始干了。哎哟，这个刑事侦查。你们生活有没有钟点？其他人来就来了，可是您的人，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我真不知道……你们吃点什么？只剩下红甜菜汤和蒸肉饼了。”

“都端上来吧，玛申卡。剩什么要什么。哎，我们也许能为莫斯科的客人弄个冷盘吧？”他无所表示地动了动手指，“再来一瓶啤酒怎么样？”

“哎哟，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您在利用自己的权势……”

她摆动着两条粗壮的大腿走开了。

“好了，”罗巴诺夫满意地说，“环境营造好了。现在开始吧。谁先讲？”

“向来是下级先讲，”谢尔盖用教导的口吻说，“请报告吧，少校。”

于是，罗巴诺夫立刻收敛了笑容，沉着脸开始认真地讲起来。

那个女人叫尼娜·维克托罗夫娜·戈尔利娜。她从莫斯科来。罗巴诺夫已经给那里发了关于她死亡的通知书。莫斯科刑侦局明天将把有关戈尔利娜的资料寄过来。现在已经知道，到旅馆来的不是她一个人，有一个男子送她来的。他的特征很一般：年纪不轻，身体肥胖，穿着深色大衣，戴一顶鹿羔皮帽子。在房间的桌子上发现两只杯子，其中一只杯子上留下了戈尔利娜的指纹，另一只杯子上没有任何痕迹。还有，偶然发现戈尔利娜的身份证里夹着一张从博尔斯科克发出的电报收据。刑侦局工作人员已经去过邮电分局，找出了戈尔利娜填写的电报用纸。电报是发往伏尔加格勒的，存局待取，收报人是玛丽娜·弗拉基米罗夫娜·伊万诺娃，电文是：“我去你等。”莫明其妙的电文。因此，应向伏尔加格勒发出委托，请他们侦查并审讯伊万诺娃。还有一个有趣的情况：电报是两个星期之前拍的。由此可见，戈尔利娜要么在昨天以前就住在市里什么地方，要么她昨天第二次来这里。罗巴诺夫请求莫斯科把这一情况也查清楚。这就是目前所掌握的全部情况。

“嗯。一切都很蹊跷，”谢尔盖摇了摇头，“看来，戈尔利娜原本想要去伏尔加格勒，让伊万诺娃等她。可她却到博尔斯科克来了。不知是谁请她来做最后一次谈话。于是她就来了。结果……信在你那里吗？”

“在我这里。”

“信是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出来的？”

“不知道。没有信封。”

“这一切非常奇怪，”谢尔盖一面沉思地又说了一遍，一面掏出烟来，“这里可以吸烟吗？”

“到我办公室去吸吧。玛申卡已经不时地在朝我们这边看呢。玛申卡！”

服务员急忙走过来，仿佛知道他们在进行严肃的谈话，一边收钱，一边用抱歉的语调说：

“要是依着我，你们只管坐着好了。只是食堂主人要骂的。早该关门了。”朋友二人踏着宽阔的楼梯，来到二层罗巴诺夫的办公室。

“开始吧，”萨沙迫不及待地说，“谈一谈你有什么新情况？你在市场上找到了什么？”

“我在那里找到了某个谢苗诺夫。我还是按顺序讲给你听吧……”

谢尔盖讲完以后，两个人默默地吸了一会儿烟，企图暗自把这一天当中得到的情况做个比较，哪怕串在一起也好。罗巴诺夫首先打破了沉默：

“我告诉你，这简直是个字谜！画谜！闷葫芦！不明身份的人的方程式！对于这样的情形还可以冠以什么名称呢？唉，要是能查明谢苗诺夫认识的那两个女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就好了！”

“‘要是这样就好了！’这正是必须查明的。”

“哎，我们现在要紧紧盯住谢苗诺夫。把他的一切关系都要调查清楚。”

“这是明摆的事。遗憾的是，有一个关系已经断了，”谢尔盖叹了口气，“他当然会灭迹的，会把对这一关系引起注意的一切蛛丝马迹都灭掉，假如他现在还没有灭掉的话。伊万诺娃相距遥远……”

“正因为如此……”

“是啊，你说得对。应该帮助伏尔加格勒的同志们把这件事搞清楚。那里可能会留下痕迹。”

“我们给普罗霍罗夫写个话传电话，通过专线立刻发出去。现在几点？”罗巴诺夫看了看表，“十八点十五分。那里还营业。”电话响了。罗巴诺夫急忙摘下话筒。

“喂？”

“是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吗？”

“我是。”

“打搅了，我是报社的乌尔曼斯基。可以去看看您吗？”“我正忙着呢，乌尔曼斯基同志。过一两个小时好吗？”罗巴诺夫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谢尔盖。谢尔盖笑着说：“让他直接去旅馆。代我向他问好。”

接着他们又查阅了一摞摞文件，回忆细节，讨论罪犯所犯罪行中的每一件事，仔细研究数不清的审讯记录，一字一板地高声宣读其中的个别地方，逐字逐句地加以缜密思考。“你明白吗，”谢尔盖说，“材料不足是挺糟糕的，根本没有材料更糟糕。我认为，材料太多是最糟糕的。这样非常容易走偏。只要一走偏，将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你知道。”“古怪想法，对吧？”罗巴诺夫笑了笑。

“古怪想法加事实，是出于对所选择的道路真诚不贰的信赖。”“从理论上讲，你也许是对的，不过在当前情况下……请你注意。一切线索都与谢苗诺夫有牵连。”

“目前倒不是一切线索都与他有牵连。比如安眠药的事，还没有弄清楚。我倒是对他妹妹很感兴趣。”

“是啊。我们可以向他证明他的诈骗行为吗？可以。既然科洛斯科夫已经认出了他，那么别的人也会把他认出来的。然后是那些身份证。其中一个身份证他肯定拿过。”

“受过诈骗之苦的人提供出犯罪分子的哪些特征了吗？”

他们重又精心研究厚厚的一摞摞文件，大声地念审讯记录，并争论起来：

“像是谢苗诺夫。”

“不完全。”

“我说他像！你想要什么？让那些吓坏了、吓傻了的人们给你提供绝对准确的特征吗？连面颊上的痣也包括在内吗？”

“顺便说一句，谢苗诺夫的痣在耳朵后边。”

“对，对。你想叫人都去看他耳朵后边吗？你听听这个沃尔科夫报告了些什么吧……”

于是，罗巴诺夫又一字一板地、着重地读着审讯记录。

“对了，还有一件事，”谢尔盖忽然想起来，“应该搞到谢苗诺夫的笔迹样本，跟那封信的笔迹做个对比……”

“哪封信？哦，是写给戈尔利娜的那封信吗？”

“正是。听我说！邮局里那封电报没收了吗？”

“那还用说！”

“我们动手把电报和信做个比较。说干就干。哪怕现在大致相近也好。”

“哎，真有你的！信是写给戈尔利娜的，而电报是她拍的。”

“不管怎样，还是要对比一下。”

罗巴诺夫耸了耸肩，老大不情愿地在厚厚的一摞文件里翻寻着。终于找到了：一张揉皱的小纸片上仓促地写着：“来吧，应该谈一谈，这是最后一次。”还有一张电报用纸。

谢尔盖和罗巴诺夫俯身去看摊在桌子上的信和电报。过了一会儿，罗巴诺夫抬起头来。

“哎，我跟你讲，弄得简直都头晕脑涨了。这肯定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

“明天送去做笔迹鉴定。鬼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谢尔盖疑惑地看了朋友一眼，“我们大概是累了吧，啊？”

在办公室里出现的一刹那凝重的沉静中，电话铃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罗巴诺夫急忙拿起话筒。

“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他听出是乌尔曼斯基的声音，“我已经到旅馆了，可是你们……都八点多了。”

“我们就去。”罗巴诺夫回答说。

他们下楼时说定，不再谈论工作，够了，他们的确累了。那么他们最新的一个发现也许只是他们杜撰的？但这一切都放到明天吧。

大街上又黑又冷，砭骨的寒风一阵阵吹来，把刺人的冰碴子打在脸上。

但他们依然决定步行去旅馆。任风去吹吧。况且必须改换一下，干点别的什么，哪怕去跟寒风抗争，看看微不足道的街景，甚至就是步行也好。他们两人吸完了烟，立刻如饥似渴地呼吸寒冷的新鲜空气。

他们步履匆匆，一言不发，超过了前面的行人。

快走到旅馆时，罗巴诺夫凑近谢尔盖，用盖过呼啸的风声的嗓门喊道：

“我忘了问你，列娜怎么样？”

“还好。正在排演。”

“那么一切正常喽？”

谢尔盖点了点头。“他就好打听，”他笑了笑，暗自思忖道，“他大概还记着办‘黑娥’案件时发生的那桩帽子事件。”

他们走进旅馆前厅，有点气喘吁吁，脸冻得发红，一眼便看见了乌尔曼斯基。

年轻记者穿着大衣，没有系扣，在沙发椅之间悠然漫步，放下护耳的皮帽子推到了后脑勺，一只手里拿着带有“航空”字样的带拉链的精美皮夹子。

乌尔曼斯基眼很尖，看见他们走进来，便一边满面笑容地朝他们走去，一边大大咧咧地挥动着皮夹子。

他们三人来到房间，谢尔盖轻轻把门关上，这时乌尔曼斯基不无得意地宣布说：

“总算把您请来了，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为了对您的光临聊表庆贺，”他从大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瓶酒，“我希望，您不会反对吧？”

“记者都是很机灵的，”谢尔盖笑了，“怎么会反对呢？”“特别是我们的记者，不得了，”罗巴诺夫滑头地看了乌尔曼斯基一眼，插话说，“可是他们行动起来一向……用你们的话怎么说？带有潜台词，对吗？”

乌尔曼斯基哈哈一笑，算作回答。

“真有您的，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您否定了人的无私的内心感情。”

“好了，”谢尔盖出面干预道，“俗话说，既然酒打开了，那就把它干了。关于这个潜台词吗，”他使了个眼色，“我们也有。”罗巴诺夫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忧虑起来。他注意地四下里看了看，稍微掀开桌布，往桌子底下瞧了瞧，拉开遮挡着床和床头柜的帷帐，把那里所有的东西都仔细检查了一遍。“你找什么？”谢尔盖用毫无恶意的口吻问道。“正如《危险来临》中水手长普里霍季科所说的：‘这种事既然发生了，那就干脆把最后一根黄瓜也切开。’有一个黑色小手提箱交给你保管……”

“啊——啊，我把它交给旅馆行政管理处了。我想这是过去的房客忘在这里的。”

“你真的交了？！”罗巴诺夫表情生动地、惊恐地问道，“怎么，你的嗅觉衰退了？”

“我又不是警犬，我要嗅觉干什么？”

“作战嗅觉。完了，老兄。你不中用了。好在你还有像我这样的朋友。”

他表示抗议地嗅了一阵，好像被什么无形的磁铁吸住了似的，走遍了房间的犄角旮旯，然后走到谢尔盖跟前，严厉地要求道：“哎，你吸一口气。”并表示同情地摇了摇头，最后急速地跑到过厅，消失了。

乌尔曼斯基哈哈大笑，倒在了长沙发上。

过了片刻，罗巴诺夫提着小手提箱来到房间。他洋洋得意地把小手提箱往桌子上一放，声明说：

“我在机场就告诉过你，预先定出两个接待方案：在我家里和在这里。由于你的任性，由于技术原因耽搁了一昼夜……”

他那满是雀斑的圆脸上不禁掠过一丝阴影。谢尔盖皱了皱眉头。

“什么原因啊？”乌尔曼斯基好奇地问。

“我们不是在美国，”谢尔盖尖锐地说，“这里没有什么可供人们娱乐消遣的。”他改变了口吻，重复说：“酒打开了，索兴把它干了。”

他们三人很快围桌而坐。

“哎，我们共同认识的那位姑娘的情况怎么样？”谢尔盖问乌尔曼斯基。

“哦！”乌尔曼斯基懊恼地把手一摆，“您知道吗，我根本就没有找到她！”

“‘找到’是什么意思？”谢尔盖感到惊诧。

“是这么回事。她当时说什么都不肯让我送她。我好不容易才问出她叔叔

的电话。我今天一打电话，结果是一个什么单位。她大概搞混了。”他转向罗巴诺夫说：“您最好帮帮忙，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

“没问题。她叫什么名字，姓什么？”

“我只知道她的名字叫玛丽娜。”

“嗯。少了点儿。”

“玛丽娜……”谢尔盖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我今天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个名字……”

罗巴诺夫故作冷淡地回答说：

“伏尔加格勒的玛丽娜·伊万诺娃。”

“对了。”

“我一定能找到她，你们等着瞧吧。”乌尔曼斯基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

“祝您成功，”谢尔盖微微一笑，“假如找到了，您可得和我们共同分享欢乐。”

“嗨，您还想要抢功，”乌尔曼斯基带着从不知失败为何物的人的自信使了个眼色。

谈话不知不觉转到乌尔曼斯基身上。

“您现在在写什么呢？”罗巴诺夫问。

“我打算写一篇特写，关于一位战争英雄。他就住在我们的市里。要知道，我找到他可费了劲了。一个不合群的老头儿。他什么都不肯讲。”

“他姓什么？”

“费奥多罗夫。”

“写写吧，写写吧，”罗巴诺夫给他打气说，“这比写骗子好多了。”

“为什么？你们的工作也应该写。当然，要把握好尺度，”乌尔曼斯基笑了，“不要引起不良的关注。”

客人们很晚才散去。

……第二天早晨，谢尔盖刚刚来到局里，罗巴诺夫便打来了

电话，急切地问：

“你已经到了？”

“是的。出什么事了？”

“正如那封电报里写的：你就着急吧，详情写信说明。我这就到你那里去。你先着急一阵吧。”

罗巴诺夫心急如焚地闯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只精美的文件夹，两根线绳悠来荡去。他头发蓬乱，满脸通红。

“你看看吧！”他一进门就说开了，但马上把门严严实实地关上了，“看吧！莫斯科来的情况。这和我们要查询的情况相左。原来是这样。建筑局的出纳员尼娜·维克托罗夫娜·戈尔利娜盗窃巨款后逃匿了。还有！”罗巴诺夫把另一份情况放在桌子上，不假思索地一口气说道：“正在寻找从伏尔加格勒失踪的女公民玛丽娜·弗拉基米罗夫娜·伊万诺娃。”

“嗨，好家伙……”谢尔盖不知所措地说，“这可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第四章 自我伏击

有人轻轻敲了敲门。

“请进！”谢尔盖大声说。

赫拉莫夫瘦削端庄的身姿出现在门口。

“你有事吗，尼古拉？”罗巴诺夫问。

“我可以向处长报告一下情况吗，中校同志？”赫拉莫夫看了谢尔盖一眼。

“请吧，请吧。顺便说一下，我叫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赫拉莫夫那副一本正经的派头使谢尔盖感到恼火。

而他却沉着自若地报告说：

“瓦利卡被拘捕了。您本来想要亲自对他进行审讯的。”

“是吗？”罗巴诺夫振奋起来，“我马上来。你先开始吧。”

“谢苗诺夫怎么样？”谢尔盖问赫拉莫夫。

“暂时没有任何消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同志……昨天下班以后我顺路去了食品店一趟，买了一瓶白兰地、酒菜、柠檬和一盒糖。不过当时那里没有顾客。他本人也没有从屋里出来。而食品店一早就开始营业了。”

“看来，他自己把所有的酒和食品都喝光、吃掉了。”谢尔盖淡淡一笑。

“尚未查明，同……”

“并没有要求进行调查，”谢尔盖勉强承受住了赫拉莫夫令人发笑的声调，“那个穿灰鼠皮大衣的姑娘怎么样，还没有露面吗？”

“是的，没有露面。”

谢尔盖转向罗巴诺夫说：

“这个瓦利卡是什么人？”

“第二个毒品吸食者。记得吗，我昨天告诉过你？”

“啊—啊，大麻膏？”

“对，对。问题很严重。你先去审讯吧。”他对赫拉莫夫又说了一遍。

“是。”

赫拉莫夫离开以后，罗巴诺夫长出了一口气。

“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呢？”

“首先要开动脑筋进行思考。”

“那好。就是说，戈尔利娜盗窃了巨款，被杀害了。是这样吧？她打算到玛丽娜·伊万诺娃那里去，结果后者失踪了。是这样吧？因此，谢苗诺夫跟她们的关系无从查清。”

“但是正在进行严密的侦查，”谢尔盖意寓深长地举起铅笔，“戈尔利娜是被人用安眠药杀害的，投放安眠药的人正是在火车上进行抢劫的那个人。他的身份证落在受骗者的手中。而落在受骗者手中的身份证最后又落到谢苗诺夫的手中。这就是第一条链子。”

“无疑，这条链子禁不住推敲。那么第二条呢？”

“你听我说。那个参与身份证犯罪活动的人，夜间在监视那个姑娘……”

“而且后来被科洛斯科夫在市场上认出来了。那么他就是真正的谢苗诺夫。”

“对。虽然认出来了，但还不十分肯定。这一点也应该考虑到。”

“当然应该。不过谢苗诺夫同那个姑娘……至少是认识。既然她后来

市场上去找过他。”

“说的就是这个。”

“嗯。那么这条链子既和戈尔利娜无关，也和伊万诺娃无关。”

“暂且无关。”谢尔盖纠正说。

“总之，这条链子也禁不住推敲。”

“那么，亲爱的，我们破案一向是从什么入手呢？”

“这当然没错。”罗巴诺夫叹了口气，同意道。

谢尔盖笑着看了朋友一眼。

“那么现在的任务是要运用启发法。”

“这又是什么名堂呢？”罗巴诺夫惊诧地问。

“是一门关于创造思维的科学。遗憾的是，这门科学仅仅处在

萌芽期。针对我们的工作而言，大概是这样：把事实搜集起来了，似乎觉得它们有逻辑联系，但是把它们串成一条链子，便发现所缺少的链环，而后通过这条链子去达到目的，也就是揭露犯罪。对此，我和你现在都没有现成的良方，没有已知的方法。我们以往的经验里没有任何现成的、适合于业已发现的情况的一成不变的公式。必须创立新的、完全崭新的公式，崭新的解决方案，即实

现通常所说的创造活动。”

“你想得倒不错，‘创造活动’，”罗巴诺夫笑了笑，“那你就去实现吧，既然你是这样博雅精深的大学者。”

谢尔盖笑着把两手一摊，说：

“我是说，这门科学仅在萌芽期。未来的理想是：一旦出现新任务，你就服用一种对某些大脑中枢有效的药物，这样一来，你就会霍然产生灵感，有所发现。你能想象吗？”

“好了，这要等一百年以后。”罗巴诺夫把手一摆，“我曾在什么地方读过一篇关于柴科夫斯基的文章。他说，灵感就好比一位不喜欢懒汉的女宾。你只要坐下来工作，那么灵感自然而然地就来了。这一点，老兄，目前更可信。”

“那好，让我们像柴科夫斯基那样工作吧，”谢尔盖使劲伸了

个懒腰，“说不定会有什么产生的。那么，第一条链子看来是这样……”

他拿起一张纸，画了几个圆圈，用箭头把它们一一串连起来，而后在一个圆圈里写上“伊万诺娃，失踪了”，第二个圆圈里——“戈尔利娜，安眠药”，第三个圆圈里——“列车，安眠药”，第四个圆圈里——“他的身份证，诈骗”，第五个圆圈里——“从谢苗诺夫那里弄来的身份证，诈骗”，第六个圆圈里——“谢苗诺夫”，并在指向谢苗诺夫的箭头上边打了一个问号。

“你看，这就是第一条链子。是这样吗？”

“是这样。只是打这个问号没有必要。身份证是从谢苗诺夫那里搞来的，这一点确凿无疑。”

“假定是这样。”谢尔盖犹豫了一下，把问号勾掉了，“现在来看第二条链子……”

他重新画了一个圆圈，写上“在车站上的人”，然后标出箭头，指向写着“穿灰鼠皮大衣的姑娘”的第二个圆圈，又画一个箭头指向下一个圆圈：“谢苗诺夫”，然后从他这里把箭头移向也打上问号的第一个圆圈。

“辨认毕竟不准确。”他解释说。

“我同意，”罗巴诺夫点点头，“可是你为什么认为他监视的就是那个姑娘呢？那里还有两个行人，提着沉甸甸的手提箱。手提箱里不知装着什么东西……而且列车是从中亚发出来的，你别忽略了这一点。”

“那好。链子在这种情形下没有断开，反而加长了一环：他关注的是手提箱，而接手提箱的是那个姑娘。再没有别的。你说得对，列车是从中亚发出来的……”

“是啊。而且这一切发生在同一天……”罗巴诺夫沉思地说，“第二天在市里，在市场上，”他着重强调了最后一个词，“就出现了大麻膏。”

谢尔盖警觉地看了朋友一眼。

“是头一次吗？”

“头一次，”罗巴诺夫肯定地点了点头，屈着手指，不慌不忙地一一列举：“从中亚开出的列车……手提箱……谢苗诺夫做生意的那个市场上出现的大麻膏……已经吸食大麻膏的那些男孩子……啊？这也是一条链子吧？”

“好像是。”谢尔盖忽然建议道：“我们去找那个瓦利卡谈谈怎么样？”

谢尔盖已经来到了走廊上，他恍然想起来他还没有问扎特金是否去过了医药管理局。他甚至停了一刹那，打算返回办公室，但又转念一想，扎特金多半还没有顾上去了解情况，便跟着罗巴诺夫走了。

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里，赫拉莫夫坐在其中一张桌子后边。一个约摸十五岁的少年有点儿不自在地侧身坐在他对面。那少年脸色苍白，头发蓬乱，穿一件灰色大衣，敞着怀，一条卷成死辫的破旧围巾在细细的脖子上来回晃悠。他那双惊惧的黑眼睛望着赫拉莫夫，发肿的嘴唇裂着口子，明显地哆嗦着。房间里再没有其他人了。

看见谢尔盖和罗巴诺夫走进来，赫拉莫夫从位子上站起来。那少年也随之腾地站了起来，揉搓着手中的帽子。他原来是瘦高个儿，比赫拉莫夫还高，因此看上去显得更加可怜巴巴。

“你们继续谈，”罗巴诺夫挥了挥手，“我们听一听。”

于是他和谢尔盖在旁边一张空桌子后边坐了下来。

“哎，帕诺夫金，”赫拉莫夫一边厉声说，一边在原先的位子上坐下来，“你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少年低着头，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回答说。

“关于你的责任，你也搞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给了你时间去考虑，对吗？”

“给了……”

“你瞧，一切该做的都做了。”赫拉莫夫满意地总结说，并换了一副责备的口吻继续说：“可是你对自己的行为还没有认真地向我做出解释。因此，我再问你一遍：你为什么要买那种毒品？”

“不为什么……”

“你这样解释很不明智……”

“这无法做出明智的解释……”

谢尔盖感兴趣地看了看那少年，然后看了看罗巴诺夫，朋友二人会心地微微一笑。

“这么说，”赫拉莫夫厉声说道，“你是个没有理智的小伙子了，也就是说，你很愚蠢。明白吗？”

“明白了……”

“看来，你父亲打你打少了。所以你的个子长得快顶到天了，而却没长智慧。”

“他从来就没有打过我。”那少年的嘴唇由于委屈而颤抖了一下，并用仇恨的目光瞥了赫拉莫夫一眼。

“从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他没打过你。”赫拉莫夫依然用严厉而平静的声音说，“那么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谈。你从谁那里买的？”

“我不认识他。”

“你认识，帕诺夫金。我不催你，你好好想想。考虑一下要负的责任，我好像对你说过了。我给你说过要负的责任吗？”

“说过了。”

“那你就好好想想。要是你说出来，对你会有好处的。”

“我不认识。”

“我不催你，帕诺夫金，”赫拉莫夫威严地警告说，“我要求你考虑考虑。”

“我不认识。”少年低下长着乱蓬蓬的浅色头发的脑袋，固执地又说了一遍。

“等一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谢尔盖忍不住插嘴说道，“请允许我跟他谈谈。”他随即转向罗巴诺夫说：“你不反对吧？”

“请吧。”罗巴诺夫表示同意，并对赫拉莫夫说：“我们出去一下，有件事。”

他们离开了房间。

“你，瓦利卡，在上学呢还是在工作？”谢尔盖问。

“在上学。”

“几年级？”

“八年级。”

“毕业后参加工作吗？”

“不。我要继续读书。”

“这是你自己决定的呢，还是父亲硬让你这样做的呢？”

“自己决定的。我父亲是个好人。”少年寻衅地说。

“他在哪里工作，你父亲？”

“您想要通知吗？”

“通知谁？”谢尔盖耸了耸肩，“我们可是有你的地址。”

“通知单位，使他丢脸。”

“使父亲丢脸，是吗？”

“嗯。说他没有把我管教好。”

“你好像不是流氓，也不是小偷。没有理由无论是让你，还是让你父亲丢脸。”

“那买的东西呢？……”

“你们就是为了买这个才到市场去的吗？”

“不是。我们到那里去买鱼食。”

“是这样。父亲究竟在哪里工作呢？”

“在工厂，他是六级曲线板工，”少年的声音里显出了自豪感，“他的相片陈列在厂区里。”

“你父亲是个名人。”

谢尔盖从容地点上烟吸起来，没有急着把烟卷收起来，问道：

“你吸烟吗？”

“不。小时候吸过，戒了。”

少年明显地开始渐渐软下来，说话已经不那么拘束了，甚至说得挺流畅，毫无畏惧地望着谢尔盖。

“好样的，有毅力。我就怎么也戒不掉。”

“您从事的工作很紧张。”

“这倒是，”谢尔盖叹了口气，“就拿眼前你们这件事来说吧。

当然，你们并没有犯罪。只是有危害，对健康危害极大。不过你，假定说，是个很有头脑的青年，尝试过……顺便问问，你觉得很舒服，是吗？”

“不，头发晕。要知道，头渐渐地眩晕起来，就好像腾云驾雾似的，味道有点甜丝丝的。”

“说不定其他人会喜欢呢？”

“哦，这个我清楚。就说戈什卡吧……他完全是个小男孩。他说，我们明天再去买。我给了他一拳，让他尝尝厉害。我说，你要是敢买，当心这个。”

谢尔盖笑了起来。

“那还用说？我和他是好朋友。”

“对，危险就在这里，瓦利卡。你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饱以老拳。就是说，如何去挽救他们，那些傻瓜？”

“应当禁止买卖。”

“说得对，应当禁止。可是以后呢？”

“以后？……哎，那就罚款，行吗，谁卖就罚谁。”

“罚款？”谢尔盖笑了笑，“假定说，你突然碰上一个歹徒，他抢走了你装着工资的钱包，而且还捅了你两刀。对他能罚款了事吗？”

“您这是打比喻……”

“对。比喻不恰当。伤口可以愈合，人会恢复健康，会用下个月的工资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那么如果开始吸食那种毒品——一下子就完了。全部工资都将花在这上面。当钱不够用时，为了弄到钱，就会去犯罪。这是两条罪行。还有一条罪行——他会使朋友们卷进来，把他们害死。那么你来比较一下看，什么更危险。”

谢尔盖没有发觉，他已经由于愠怒而声音发颤了。

“是的，”瓦利卡轻声回答说，“你说得对……”

“本来嘛。你再注意一下另一个问题：他卖给你们的那根自卷烟只有一克重，而他却收了一个卢布，对吗？可见，一公斤他就会收取一千卢布。那么他把五百卢布交给给他送来一公斤毒品的那个人，另外五百卢布就归他自己了吧？他巴不得给你掏罚款了事，他还会觉得挺满意。他本人恐怕不吸这种毒品。他本人恐怕是身强体壮的。”

“嗯。他很健康，而且皮肤红润，”瓦利卡愤恨地坚决说，“这种人才应该关起来呢。”

“不错。可是他本人是不会自动到我们这里来的：请把我关起来吧。首先得把他找到才行。”

“那您就到市场上去吧，他在那里，我一开始不想说。总之，我害怕。既然是这种事……他就待在那个啤酒摊那里。他还对我们说：‘如果还需要的话，你们就尽管来找我。’他穿着黑棉袄和皮靴。他叫先卡·科克柳什内。”

“这确切吗，瓦利卡？”

“我亲耳听见的。”

十五分钟之后，行动小组赶到了市场。但先卡不在那里。在其它一些他经常出没的地方也不见他的踪影。大家仔细寻找了好半天，可是毫无结果。

“你知道吗？”罗巴诺夫对谢尔盖说，“还有一个环节——先卡。现在两条链子连结在一起了——身份证和麻醉品。”

“这两条链子的背后都是同一个家伙——谢苗诺夫，”谢尔盖补充道，“可是怎么找出他与戈尔利娜和伊万诺娃的联系呢？这个问题真让我伤脑筋。”

“戈尔利娜有一方面很有意思，我们对此还没有深入研究。和她一起来旅馆的那个人是谁？那里有人看见过他……等一下，”罗巴诺夫打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急急忙忙地一页页翻起来，“啊哈，找到了……看门人和楼层值班员看见了。”

“谁对他们进行了审讯？”

“扎特金。”

“扎特金？慢！”谢尔盖恍然想了起来，“他从医药管理局还没有回来吗？”

“我们马上查问一下就知道了。”

罗巴诺夫还没有来得及拿起话筒，电话就响了。

“喂！……扎特金吗？这简直是心灵感应。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请你来一下。”

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侦查员走进办公室。

是的，他去过了医药管理局，也去过了检察院和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找出了有关药品盗窃的卷宗。案子是半年前发生的。犯罪分子不久前被判了徒刑。在被盗的药品中有安眠药，其中也包括那个可恶的制剂。谢苗诺夫的妹妹没有受到追究，因为没有起诉她的罪证。她只是作为本案的证人。不过……在任何事情中都可能疏漏，何况她的工作表现不好——喜欢喝酒，游手好闲，金钱不断。顺便说一句，她和哥哥相处得很和睦。

“是的，”谢尔盖同意道，“疏漏是完全可能的。”

“在任何情形下，”罗巴诺夫寓意深长地说，“她都是那个案子的嫌疑者。那么，由此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他看了看谢尔盖。

“结论目前只有一个：这些资料不能肯定，但也不能否定我们的怀疑。谢苗诺夫可能有安眠药，完全可能。”

“那么第二个结论是绝对推翻不了的。”罗巴诺夫补充说。

“什么结论？”

“在列车上投放安眠药的人就是在旅馆里投放安眠药的人。”罗巴诺夫有把握地说。

“在旅馆里嘛……”谢尔盖若有所思地揩了揩额头，“关于旅馆的情况，我和你好像谈过……对！我们谈过看见过那个人的人。是两个吧？”

“他们是我审讯的，中校同志，”好冲动的扎特金插话说，“是看门人

和楼层值班员。他们是好人，完全可以信赖。”

“是啊，但他们提供的那个人的特征不怎么样，对吗？”

扎特金把两手一摊。

“又是那个结论：这些特征不能肯定，但也不能否定谢苗诺夫曾跟戈尔利娜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戴鹿羔皮帽子的……”

“慢！”谢尔盖打断他的话，转向罗巴诺夫：“戈尔利娜打算在博尔斯克待几天？”

“稍等，”罗巴诺夫重又开始翻阅文件，“她填写的那张住宿卡搁哪儿了？……啊哈，就是它！哦，一共三天。‘因私’。”

“正是。”谢尔盖回答说，并讥讽地指出：“罗巴诺夫同志在这里都没有办法给出差的人搞到一个房间，而她却‘因私’住进来了，并且没有用他帮忙。”

“这倒是一个思路！”罗巴诺夫大声喊道，“如果不用我帮忙，那么是谁帮了她呢？”

“她会偷窃，”扎特金鄙视地说，“她就会找地方安顿。看来，她是一个狡猾的女人。”

“那里的值班经理好像也不是那么坚持原则的人，”谢尔盖说，“这是我听说的。恐怕给她塞上十个卢布就……”

罗巴诺夫激愤地打断他说：

“谁？戈尔利娜吗？说不定是跟她在一起的那个人呢。假设是谢苗诺夫呢？您怎么能知道呢？”

“是啊，是啊，”扎特金对他的见解表示支持，“那是个天底下头号的大滑头。”

“决定了，”谢尔盖结束道，“我们推心置腹地跟值班经理好好谈一谈。好像是个女的，对吗？”

“那还会是什么样！”

“那么我说对了？……”

“你会见到的，”罗巴诺夫笑了笑，“我决不会夺走你的快乐。”并威胁地加了一句：“一定要注意，一切都对着谢苗诺夫。啊，但愿有机会狠狠惩治他一顿。我要叫他心惊胆颤。他碰到我手下……”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话。局值班员像往常一样，用警惕性很高的语调报告说：

“少校同志，有一位公民要见您。他非常着急。允许放他进去吗？”

“什么人？”

“他姓谢苗诺夫，名字叫彼得·达尼雷奇……”

“什么？！”罗巴诺夫惊愕地看了谢尔盖一眼，“谢苗诺夫？……”他渐渐冷静下来，对着话筒喊道：“让他进来！快点！趁他现在还没有变卦！”

而后，他往椅背上一靠，看了看谢尔盖和扎特金。

“哎，你们说这怎么解释？”

搞不清楚他的嗓音里什么更多一些：高兴抑或不知所措。

“他马上就到，会解释清楚的，”谢尔盖用特别明显的平静口吻回答说，“你要记住，关于他的情况，我们可是一无所知。”

“问题就在这里！要不你来跟他谈吧？我要是一看见那副嘴脸，真的，我可不敢替自己担保。”

“好了，好了。所以我来担保。我不能出面。任何其他他人也不行。他是冲着你来的。他大概认识你吧？”

“不认识，他这个坏蛋，一定是嗅到了什么，”罗巴诺夫摇了摇头，“所以他现在想抢在我们前头。他跑来是要供认什么的，你们看吧。”

谢尔盖耸了耸肩。他极力保持镇静，不表露出自己的惊讶和不安。谢苗诺夫的到来没有预示会出现任何好事。谢尔盖对此确信不疑，谢苗诺夫打定主意要搞一个什么危险的鬼花招。他现在决不会乖乖地招认什么的。

敲门声把他的思绪打断了。门即刻打开了，谢苗诺夫风风火火地来到办公室。

他那通红的胖脸上现出失魂落魄的样子，稀稀拉拉的头发乱蓬蓬的，被汗水浸湿了。他吊儿郎当地穿着质地精良的毛皮大衣，没有系扣子，神经质地揉搓着手中漂亮的毛茸茸的帽子。

“允许吗？”

“进来吧。”罗巴诺夫警觉地点点头。

谢苗诺夫急急忙忙地把门关上，跑到桌子跟前，没容罗巴诺夫开口说话，便一口气说道：

“您是警察局，对吧？竟有这种事！您看，多糟糕！居然有人想要杀害我！杀害！”他突然改变声调，叫嚷起来。“我要求！……我要求保护！……您是警察局吧？那就请吧！请予以保护……”

罗巴诺夫十分惊诧地看了他一眼。

“杀害您？……杀害？……”

“是呀，是呀！……他们就是要杀害我！……给，您看吧！白纸黑字写着呢！……”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封，递给罗巴诺夫。

“您坐下吧。”罗巴诺夫一边说，一边接过信来。

“我不能坐！”谢苗诺夫神经质地大声喊道，“我坐不住！您有责任保护我！您有责任！……”

谢尔盖越来越惊讶地仔细审视着谢苗诺夫。毫无疑问，他不是假装的，他吓得要命。不过……万一这一切是在演戏呢？万一这是为了引开对自己的怀疑而玩弄的狡猾伎俩呢？那些罪证都是他的，无可置辩的罪证！谢尔盖注意到，罗巴诺夫也疑虑重重，谢苗诺夫歇斯底里的进逼对他也发生了影响。于是他心里对他说：“沉住气，萨什卡，沉住气。你就装作相信他好了。”

与此同时，罗巴诺夫从信封里抽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展开来，慢条斯理地出声读道：

“我们夜里去，像杀死一条狗那样把你干掉。”他抬起眼睛望着谢苗诺夫，而谢苗诺夫也望着他，那眼神好像是受了迫害似的，嘴唇发抖：“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谢苗诺夫喘着气，大声喊道，“他们就是想要杀害我！……他们想把我害死！……您明白吗？……”

“不，谢苗诺夫公民，我不明白，”罗巴诺夫淡淡一笑，“平白无故地杀人是不可可能的。”

他现在已经恢复常态，平静而讥讽地仔细打量着来访者。

“我告诉您，我真不知道！……您要把他们抓起来，抓起来就完事了！……让他们过后再来解释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要不然……要不然我就不回家”

了！……再没有可说的了！……再没有可说的了！……”

他七扭八歪地往椅子上一坐，动来动去的，一边更稳当地坐好，摆出一副样子，以示在他对自己的安全没有把握之前，决不离开位子。

谢尔盖发现，罗巴诺夫气得眼睛都眯成了一道缝，知道他马上会说尖刻的，也许是没有经过缜密考虑的话来。于是他决定抢在他前面，便用忧虑的口吻说道：

“这位公民的声明应该考虑一下。”

谢苗诺夫转过身来，用锐利的目光匆匆瞥了他一眼，高兴地随声附和道：

“那当然！必须采取措施！刻不容缓！这有必要吧？简直是肆无忌惮！他们会来的！他们肯定会来，既然都已经写出来了！……”

“他在胡说，”谢尔盖暗自思忖道，“统统是胡说八道。可是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真搞不明白。”于是他一边努力使谢苗诺夫完全相信自己的话，一边严肃而担忧地说：

“我们请您写一个正式声明，把这封信附上。为了把事情查清楚，我们行动得要有依据。”

“看在上帝的面上！好哇！我马上写！……您能给我一张纸吗？”他问罗巴诺夫。

在谢苗诺夫一分钟都没有考虑便急急忙忙写声明时，大家都没有作声。

“请写明您不知道这次威胁的原因。”谢尔盖说道。

“一定，一定，那当然！……”

谢苗诺夫写完了，用刚劲的花笔道签上名字，重新读了一遍，把声明和信一并递给谢尔盖。

“请原谅，”他有点讨好和巴结地说，“您是哪位？”

“科尔舒诺夫中校。”

“是按职务吗？”

“我从莫斯科来。在这里出差。”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谢苗诺夫满脸堆笑，“那我可就有指望了，一切都会好的。”

“没有我，一切也照样会好的。”

“您现在可以走了。”罗巴诺夫冷淡地说，“关于令人愉快的措施，我们会通知您的。”

“可是……我想……”

谢尔盖突然灵机一动，产生了一个主意，于是他尽可能委婉地、甚至带着关切的意味问道：

“您想尽快知道这件事，对吗？”

“对呀！我不能……”

“那您就到我们这里来一趟……”谢尔盖看了看表，“现在是中午两点。您傍晚来吧，比如，五点钟。你能来吗？”

“一定来。”谢苗诺夫高兴地大声喊道，“我会准时来的，一分不差！这可是……这对于我来说，可是性命攸关的问题！您要明白我的心情！……”

“明白，明白，”谢尔盖宽厚地点点头，“一切都明白。”

谢苗诺夫从椅子上站起来，系上大衣扣子。

当他终于离开以后，罗巴诺夫用询问的目光瞥了谢尔盖一眼。

“你想出什么来了？”不等回答，他便高声喊道：“下流胚！好一个下流东西！你到底想出什么来了？不过你先说说看，他为什么要搞这个闹剧？你倒是明白了，可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不过我想出一个……”谢尔盖看了看一声不响的扎特金，“您怎么看，看门人能认得出来谢苗诺夫吗？”

扎特金懊恼地摇了摇头：

“不一定。”

“为什么？”

“我到他那里让他提供谢苗诺夫的特征，他向我解释说，他没有看清楚。谢苗诺夫和戈尔利娜非常快地从他身边走过去了。后来他帮一位来客往电梯里搬东西。戈尔利娜一个人坐在沙发椅上，并且非常忧郁，情绪不好。”

“是啊，是啊。那么她的旅伴呢？”

“当时他正站在值班经理的小窗口跟前。”

“由此可见，房间是他订的！”罗巴诺夫大声喊道，“我敢担保！”

谢尔盖点了点头：

“我同意。这意味着还有另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

“值班经理能认出谢苗诺夫，当然，如果这就是他的话。”

“如果她想认出他的话，”罗巴诺夫狡黠地眯缝起眼睛，“这可能会对她不利。他为了弄到房间，肯定给她贿赂了。所以她就从保留的客房中给了他一间。也许，楼层值班员多半会认出他来吧？”他看了扎特金一眼。

扎特金又摇了摇头。

“不一定。她也没有把他看得很清楚。戈尔利娜来找她取钥匙开门，而他却从一旁悄悄溜走了。”

“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她根本就没有看见。”

“是啊，”谢尔盖总结说，“就剩下值班经理了。”他转向扎特金说：“现在快三点了。请在四点钟之前把她带到这里来。”

“是。”

“可是我们对谢苗诺夫怎么办？”罗巴诺夫一边问，一边淡淡一笑，说，“他可是递交了声明。我认为，还是应当试一试……”

“试试什么？”

“把那些形迹可疑的人抓起来，假如他们来了的话。”

“你的意思是设埋伏，对吗？”

“当然。”

谢尔盖陷入了沉思。

“他们正巴不得我们这么做呢……这大概对他们有利……什么对他们有利，什么就对我们不利……”

“当然是这样，”罗巴诺夫同意道，“不过假定他们闹翻了昵？谢苗诺夫想摆脱掉某人？这个‘某人’说不定会对我们有用处。”

“有可能。不过在谢苗诺夫的住宅里设埋伏是很冒险的。”谢尔盖摇了摇头，“他住在什么地方？”

“问题就在这里——他自己有一所小房子，”罗巴诺夫沮丧地弹了一下手指，发出嘎巴嘎巴的响声，“在草甸大街。这条大街直通森林，在城的最

边上。”

“嗯。也许应当在两个地方组织埋伏吧？”

“也许得两个地方。”

“那么我现在讲一下，”谢尔盖果断地说，“您，扎特金，现在去把值班经理找来。一小时后她应该赶到这里。派两名侦查人员到市场上，直奔谢苗诺夫的商亭。如果他动念头要收摊回家，一定要以随便什么借口留住他，再待一个小时。我和你，”他转向罗巴诺夫说，“去草甸大街。我们亲自到那里仔细查看一下，到时候好决定如何采取行动。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应当设埋伏。”

一小时以后，他们回到局里。在返回途中，还在汽车上时，他们就对面临的这场战役的方案大体上进行了讨论。罗巴诺夫的膝头摊放着从便条本上撕下的纸，上面画着谢苗诺夫的房屋位置以及它周围房屋和街道的简图。罗巴诺夫在简图上来回移动着手指，激愤地说：

“一定得把我们的人派去，埋伏在他的房子里。这还用说？否则他会马上猜疑我们不信任他，鬼知道他！他便会马上抢在那些人前头采取行动。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吧？”

“离森林很近，这个我不喜欢。”谢尔盖说。

“我们把通往森林的退路切断就完了。”

“至少有两条退路：这样一条，这样一条。”谢尔盖在简图上移动着手指。

快到局里时，他们最后敲定下来，罗巴诺夫即刻动手在草甸大街布置埋伏，谢尔盖负责跟旅馆值班经理谈话。

“这也不是什么美差。”罗巴诺夫笑了笑，提醒道。

谢尔盖从办公室里给扎特金打电话：

“情况怎么样，沃洛佳？”

“斯克利娅列夫斯卡娅同志在我这里，中校同志，”扎特金过分矜持地报告说，“让她过去吗？”

不一会儿，门打开了。扎特金彬彬有礼地请一位身高体胖的女人走在前面。只见那女人穿一件黑色连衣裙，一条白色珍珠项链垂在她高高隆起的胸前，这更加突出地表现出她那严肃的外貌。她的脸型细长，长得很古怪，表情冷漠，两道又黑又浓的眉毛十分扎眼，眼睛因此而显出一圈黑青。她蓬松的黑发朝后梳着，盘成一个沉甸甸的发髻，露出光洁的大脑门。

那女人俨然主人似的，迈着稳健而决然的步子走进来，威严地、甚至有点傲慢地朝迎着她站起来的谢尔盖点了点头。

“请坐吧，加利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谢尔盖尽量客气地说。“您也坐吧。”他朝扎特金点点头。

“悉听尊便。”斯克利娅列夫斯卡娅一边威严地说道，一边在椅子上坐下来，“我想，你们这里可以抽烟吧？”

没等回答，她便从黑色大提包里掏出一盒烟卷和一只精美的进口打火机，摆在自己面前。烟盒是用玻璃纸做的，花花绿绿，熠熠发光。

“可以抽，请吧，请吧。”谢尔盖热情地回答说，心里暗自想着怎样开始这场谈话更好一些。

工作早已教会了他迅速辨识人的本领。敏锐的职业嗅觉往往刹那间向他指出正确的行动方针。当然，也会出现失误，或大或小的失误，但都证明了

这样一条规则：无论何时都不能完全相信对一个人的初步印象——初步印象有时是靠不住的。

斯克利娅列夫斯卡娅给人的初步印象不佳。在她那刻板的外表和过于自信的平静下边，谢尔盖感觉到她身上有一种戒备的、不真诚的东西，不过这可能是先前获悉的，完全不明了情况的结果，因此需要检验。

“那我可就悉听尊便了，同志，”斯克利娅列夫斯卡娅一边吸着烟，一边冷冰冰地说。

谢尔盖随后也点上一支烟，从容地吸了一口，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仿佛在暗示他们的谈话将是完全信任和随便的。他说道：

“我们要谈的是，加利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前天发生在你们旅馆里的那件令人不快的事。”

“糟糕透顶的事。”斯克利娅列夫斯卡娅严厉地纠正说，并用手指按住两边太阳穴，补充道：“哎哟，因为这事，我第二天夜里都没睡着觉。不管什么安眠药都不顶用。”

一提到安眠药，谢尔盖不禁警惕起来。

“是啊，我能理解您。任何安眠药都不管用……”他表示同情地微微一笑，“您现在吃什上药呢？”

“唉，真是有病乱投医，什么药都吃，”斯克利娅列夫斯卡娅痛苦地摆了一下手，“而且还成天偏头痛，真受不了，受不了！”

她又把手指按在太阳穴上。

“您还是得给我们帮帮忙，把这个案子搞清楚。”谢尔盖婉转地说。

“我的上帝，那当然！我尽力而为。您请问吧。”

“您见过戈尔利娜本人吗？”

“见过。她那么年轻、漂亮，穿得很时髦。我的上帝，真是太不幸了！”

她神经质地深深吸了一口烟。

“您是在自己的小窗口里看见的吗？”

“当然。难道我还能出去吗？我们的工作真要命，一秒钟闲功夫也没有。”

“是啊，是啊，”谢尔盖同情地应和道，“人那么多，都等着，都急着快点登记上房间。”

“哎，您要是知道拒绝人家有多么难就好了！可是旅馆又不是橡皮做的，您明白吗？”

“当然。”

“一个不错的演员，”谢尔盖心想，“但好像并不聪明。她自己倒是把话题引到对自己不利的轨道上了。不过，这是不是故意的呢？我倒要检查检查。她是不知道真正的死因的。”

“您看见戈尔利娜时，她在做什么呢？”

“我记不清了。不过她当时满面愁容，忧虑不安。”

“她大概身体不舒服吧？”

“您要知道，”斯克利娅列夫斯卡娅兴奋起来，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仿佛制止谢尔盖说话似的，“看来，您说得对。是啊，是啊，她大概觉得身体不舒服了。她这不幸的人，当时那副样子非常难看。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是啊，”谢尔盖满意地暗自确定道，“她不会再提旅馆不是橡皮做的了。有了一个的、更可靠的证据。哎，亲爱的，你在耍滑头。但耍得并不

怎么高明。”

“也许，您因此才决定安排她住下来，虽然房间很紧张，对吗？”谢尔盖问道，似乎对她的同情心表示赞赏。

“那当然！我的上帝，我毕竟也是女人嘛。她单身一人，而且带着病，来到陌生的城市里——这太可怕了……其实，是一个熟人送她来的，不过他很快丢下她就走了，本来应该……”

“好了，好了，现在也可以提一提他了。”谢尔盖心里思忖道。

“是他本人来求您安排房间的吗？”

“在这种情形下，根本不用求我，”斯科利娅列夫斯卡娅骄傲地提出异议，“他只要把证件一拿出来，我就全明白了，把最后一间空客房给了她。”

“您真是极富同情心而又体察入微的女人。”谢尔盖微微一笑。

“过奖，过奖！我是个最最普通的女人。”斯科利娅列夫斯卡娅故作宽容地耸了耸滚圆的肩头，显然对他的恭维话感到很得意。

“他没有告诉您她有病吗？”

“您想从男人们那里了解的情况太多了。在多数情形下，他们都是粗心大意的。”

她的声音里突然流露出卖弄的腔调。

“不过，”谢尔盖冷淡地说，“这一点我们会向他本人了解的。我还没有找他谈话。”

在谈话期间，斯科利娅列夫斯卡娅的眼睛里这时头一次闪过警觉的目光，她忍不住大声喊道：

“那么您知道他是谁了？”

谢尔盖看了看表。

“对，他很快就要来了。”他转向默默坐在一旁的扎特金，请求道：“您顺便去看看。说不定他已经到了吧？”

扎特金急忙站起来，走出办公室。

“我甚至看见他都觉得讨厌。”斯科利娅列夫斯卡娅含有敌意地说，一时失去了自己威严而镇静样子。

“那当然。”谢尔盖暗自冷笑了一下。

“还是所谓的同事呢，”斯科利娅列夫斯卡娅忿忿地接着说，“硬是把一个处在这种情形下的女人丢下不管……”

“同事？”谢尔盖不禁脱口说道。

“是啊，他是这样自我称呼的。他好像是偶然在车站上碰见她的。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根本不是同事！”

这时，扎特金回来了，报告说：

“公民来了，中校同志。”

“那好，加利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谢尔盖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我就不再耽搁您了。谢谢您，打搅之处，望请原谅。让我送送您吗？”

“哎哟，哪里话！”斯科利娅列夫斯卡娅卖弄风情地淡淡一笑，“给您添麻烦了，我觉得真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麻烦呢？应当在您的心目中恢复男人的声誉，”谢尔盖报以微笑，用眼梢瞥了扎特金一眼，觉察到他那惊异的目光。

他们来到走廊上。

谢苗诺夫坐在办公室门口的长沙发上，神经质地揪着手中毛茸茸的帽

子。他的额头和浮肿的脸颊汗津津的，闪闪发亮。他看见了谢尔盖，做了一个要站起来的动作。但他一发现斯科利娅列夫斯卡娅便凝然不动了，慌忙移开视线。但是谢尔盖已暗自注意到了这一点。

“等一下，”他冷淡地对谢苗诺夫说，“我马上就回来。”

斯科利娅列夫斯卡娅走在前面，高傲地仰起头，竭力不往谢苗诺夫那边瞧。只消根据她那紧闭的双唇和极力朝前看的眼神，就可以猜想出来，这次碰面对她是不愉快的。

在局门口同斯科利娅列夫斯卡娅告别时，谢尔盖好像顺带地问道：

“顺便问一声，您认出来走廊上那位公民了吗？”

“我？我根本就没有看见……”

“你撒谎，亲爱的，”谢尔盖心想，“并且不怎么高明。没什么，这倒更好。”

他开始不慌不忙地上楼梯。

走到三楼时，谢尔盖看见了走廊尽头的长沙发上谢苗诺夫孤单的、有点驼背的身影，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坚决转身下楼到刑侦处去了。

罗巴诺夫的办公室里烟气弥漫，变成一片蓝雾，侦查员们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谢尔盖没有敲门便走进来，大伙儿朝门口转过头去，一下子都不作声了。

“瞧，他来了。”罗巴诺夫满意地确认说。

“哎呀，你们放出这么多烟啊，弟兄们，”谢尔盖摇摇头，“眼睛都刺得发疼了。”

罗巴诺夫淡淡一笑。

“这是我们自身冒的烟。我们在进一步明确作战方案。”

“他在我那里坐着呢，”谢尔盖用头朝门口点了一下，“谁到他家里去？先去跟他认识一下吧，都已经六点多。”

“菲利波夫，你去一趟吧。扎特金在那里，”罗巴诺夫吩咐道，“其余的人按约定行动。”说完，他转向赫拉莫夫问：“烟、水和夹肠面包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就都齐了。汽车在大门口。出发吧，小伙子们。无线电台可得保护好。万一有情况，我们迅速赶到你们那里。好像没有落下什么东西。那么……”他扫视了一下侦查员们，然后看了谢尔盖一眼：“允许开始行动吗，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有外人在场的时候，罗巴诺夫总是对他一本正经，严守规矩。

“开始吧。”

大伙儿大声地彼此交谈着，离开办公室，来到走廊上。

一种熟悉的、神经质的兴奋感，同走在在一起的这些人之间的那种兄弟般的亲密感，油然袭上谢尔盖的心头。在这一时刻，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共同的任务、共同的目标，还有他们意识到的目前尚不明了的危险和面临的冒险，于是他甚至一时羡慕起他们来了。唉，他好久没有参加过埋伏了！

明显地高兴起来的谢苗诺夫和两名侦查员离开一个小时以后，谢尔盖和罗巴诺夫才想起来他们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一口东西。

“食堂关门了，”罗巴诺夫一边说，一边疲惫地伸着懒腰，“我们到饭店去怎么样？虽然那里有点儿吵……”

“先去旅馆，”谢尔盖回答说，“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家里人的情况。”

“既然这样，那就去吧。”

他们不慌不忙地穿好了衣服：现在可以不必着急。

大街上寒气袭人、狂风怒号，砭人肌骨。

“风把汽车都刮跑了，”罗巴诺夫大喊着说，“只好步行了。饿着肚子走路，可真够费劲的。”

“没什么。我们那里才叫冷呢。”

“老是刮风，真可恶。”罗巴诺夫一边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句，一边把脸埋进立起来的大衣领子里。

他们来到旅馆，一路上寒风吹打，把他们冻坏了。他们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谢尔盖订了打往莫斯科的电话。

“一小时之内。”话务员通知说。

“只好等了。”罗巴诺夫叹了口气，在深沙发椅上坐下来。

可是电话几乎在霎时间响了起来。谢尔盖匆忙拿起话筒。

“瞧我们工作多认真，”罗巴诺夫翘起手指，傲慢地说，“这就是你的……老兄……”

等来的不是莫斯科的电话，而是乌尔曼斯基熟悉而兴高采烈的声音：

“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吗？看在上帝面上，请原谅。您可是亲自让我寻找的。知道吗？我找到玛丽娜了！”

“向您祝贺，”谢尔盖笑了笑，“您怎么找到的？”

“一千零一夜！要是写出来的话，人们肯定会说：‘决不会有这种事。’而主要的是，”乌尔曼斯基得意地下结论说，“我的幸福现在就握在您的手里。”

“这话怎么理解？”

“电话上不可能理解。假如您允许的话……我知道，这是极其无赖的行为。不过……”

“你想来？”

“我是想去，给您从头到尾讲一遍。只是我这天生的腼腆作祟，不好意思。”

“那您就来吧。说真的，我们还没有……”

这时话筒里咔嚓响了一下，传来话务员的声音：

“是您订的莫斯科电话吗？”

“对，对。”

“请讲话……莫斯科，请讲话……”谢尔盖突然听出一个遥远的声音大声呼叫：“喂！……喂！”

“妈妈！”谢尔盖也照例呼叫道，把话筒对在嘴跟前，“妈妈，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谢廖沙！……我当然听得见。你怎么样？你们那里天气冷吗？”

“一切都挺好，妈妈。天气不冷。您怎么样，身体好吗？”

“好，好。列娜在剧院里。维季卡……瞧他要抢话筒呢。”于是谢尔盖听见儿子清脆而激动的声音：“爸爸！爸爸，我把你的碗打碎了！”他知道维季卡的习惯，喜欢把所有不愉快的事一股脑儿都抖搂出来。“我爬到……”

“好啦，乖儿子，好啦，”谢尔盖笑笑说，“情况怎么样？”

维季卡的声音立刻变得快活起来，于是他更加响亮地喊道：

“爸爸，我的劳动课得了五分。你呢？”

谢尔盖常常喜欢对儿子说，他们俩人都在劳动，俩人都要得好分。

“没有，乖儿子。我暂时还没有得五分，”谢尔盖不由得长出一口气，瞟了罗巴诺夫一眼，他正饶有兴趣地仔细听着父子二人的谈话，“不过我会努力干的……”

又响起了话务员的声音，这场愉快而前后不连贯的谈话没有持续多久便中止了：

“您的时间到了。请结束谈话。”

于是谢尔盖只来得及喊了一声：

“替我吻妈妈！再见！”当他把话筒挂上以后，罗巴诺夫责备地说：

“你哪怕代我向玛丽娅·伊格纳季耶夫娜问个好也行啊。”

可是谢尔盖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沉思地说：

“哎，要是我和你劳动能得五分就好了……你知道吗，”他在长沙发上坐下来，点上烟吸了一口，“我记得一个人。他曾是我们的区委书记，名字叫沃洛霍夫。情况是这样的，我复员以后回到了莫斯科，他把我召去，对我说，区委打算派我到刑侦局工作。他说：‘这应该成为您终生的事业，成为您新的职业。’转眼多少年过去了……而且什么事情都发生过……而且，我认为我和你干得都不错。但不知为什么工作得总不那么轻松。”

“我认识沃洛霍夫。”罗巴诺夫点了点头。

两人默默地吸了一会儿烟。后来，谢尔盖说：

“我有时候琢磨，我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大家都说，我们应该对坏人坏事进行惩治……”

“有法院在惩治。”罗巴诺夫摇了摇头。

“那当然。可是我们这一行看起来毕竟挺粗暴，甚至挺残酷。要寻找罪犯，要抓捕他。”

“更重要的是——不让他去从事犯罪活动。”罗巴诺夫说。

“‘不让去’是什么意思？简单地去阻止？那不行。必须得在他心里来个转变。这无异于治好一个重病患者。我告诉你吧，我倒真想把我们的工作与教师和医生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你想得倒美。”罗巴诺夫笑了笑。

“为什么？我明白你笑什么。”

“要是跟教师和医生联系起来，我们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同意。不过我说的是职业道德。只是干我们这一行，认识到职业道德更难一些。但如果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是存在的。确实是存在的。”

罗巴诺夫气愤地叹了口气。

“可是在这些职业中，我看到有很大差别。就拿医生来说吧。他应该对自己所有的病人抱有同情心，我说不好，甚至是爱心，如果愿意的话，因为他面对的是病人，是受疾病折磨的患者。而我却不能去爱我们所有的‘患者’。并且，我们的‘患者’病得越重，我就越恨他。我现在想的是，比如，我应该怎样把谢苗诺夫这个卑鄙的家伙揭露出来，而不是给他‘治病’，我应该如何更快地把他，这个强盗，关进监狱。”

“那么以后呢？”谢尔盖淡淡一笑。

“什么‘以后’？”

“你把他关进了监牢。以后怎么办？”

“啊—啊，以后嘛，当然得对他进行治疗，”罗巴诺夫愁眉苦脸地说，“这事毫无办法。”

“你看，就是说，必须进行治疗。甚至对谢苗诺夫这种人。那么对其他人，比如说，对他引诱误入了歧途，被他迷惑住或吓唬住的那些人怎么办？怎么，这样的人我们没有见过吗？”

“见过……这样的人我们见多了……你所说的这些都是实情。可是谢苗诺夫现在就像钉在我脑袋里的一根钉子。怎样才能使他开口说话，怎样才能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呢？”

“我们的小伙子好像在那里埋伏好了。”谢尔盖说道。

有人敲门。

“请进！”

乌尔曼斯基走进来，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把整个门都占满了。他一如既往地戴着放下护耳的毛茸茸的帽子，提着熟悉的精美公文包。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我知道我这样鲁莽地闯进来极不合适！”他把双手向上举起，一时间变得像只受过特别技能训练的大熊。

“请把大衣脱了吧，”谢尔盖冲他点了点头，“我们下楼到餐厅去。我们简直饿得要死。”

“我可从来不吃饭！”乌尔曼斯基用调谑的语调大声喊道，“尽管市里所有的骗子都将对我宠爱有加。”

餐厅里，乐队在演奏，发出轰鸣声。满脸通红的男男女女在桌子之间婆婆起舞，服务员端着托盘往来穿梭。

谢尔盖、罗巴诺夫和乌尔曼斯基被震得耳朵发聋，他们在门口左右顾盼着，寻找着空桌子。

一个身材瘦削、头发斑白、穿着黑色长礼服的领班在跳舞的人之间优雅地躲闪着，来到他们跟前。

“想用餐吗？”

“就算是吧。”罗巴诺夫微微一笑说。

领班会意地点了点头。

“今天我们这里宴会厅闲着。你们愿不愿意到那里去用餐？”

“好极了。”罗巴诺夫傲气地瞟了谢尔盖一眼。“瞧我们这里服务多棒，看见了吗？”他的目光这样说。

一分钟之后，他们已经在—个不大的空宴会厅里的唯一的一张摆好的桌子跟前落座了。这里凉爽而幽静，几乎听不见音乐声。

罗巴诺夫点的冷盘一端上来，他们便—扫而光，先解了解饿。这时谢尔盖点上烟吸了一口，问乌尔曼斯基：

“哎，您是怎么找到玛丽娜的？”

“说了您准不信，”乌尔曼斯基兴冲冲地说起来，“您还记得我对您说过的那个费奥多罗夫吗，我曾打算写—篇关于他的特写？就是那个战争英雄？”

“记得，记得。”

“是这样。您知道，我可见过谦虚的人，我本人就很谦虚，”乌尔曼斯基把—只手按在胸前，“可是这样的人……从他口里—句话也掏不出来。哎，他压根儿就不想谈，那当然！甚至挺古怪。”

“您大概弄错了，他根本就没有立过任何特别的功勋吧？”罗巴诺夫问道，“比方说，他与那个英雄同姓。”

“哪里话！他有十一枚战斗勋章，两枚列宁勋章！而且我后来查阅了旧报纸。《红星报》上边有关于他的报道。真的，从他的战友们的讲述来看，他当时大概就沉默寡言。可是我现在找不到这些人！而又需要写一篇关于他的特写——瞧！”他用手抹了一下喉咙，“我肩负着主编的任务哪！我本能地感觉到，材料一定是很珍贵的。总之，我今天打定主意了：我想，我要再去一趟。说不定他在我去莫斯科这段时间里回心转意了，正确地理解了我的意图。在我说服他期间，我自己简直也被搞得都不正常了。在这些日子里，我成了西塞罗了。我把问题提到了这样的原则高度……如果跟着我把谈话记录下来，那么这对于宣传和政治教育部门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材料了。所以我就去了。要知道，越是快走到了，我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去也是白搭！说实在话，当我来到他家门口时，我差点儿掉头返回来。假如我扭身回转身，那会怎么样呢！”乌尔曼斯基绝望地抱住脑袋，样子十分滑稽。

“会怎么样呢？”罗巴诺夫兴致勃勃地问道。

“您听我说。我进了那栋楼。他家住在一层。我按了半天门铃：他妻子上班去了，这个时间他在家。一般地说，他退休了。我突然听见噔噔的脚步声……这是女人的脚步声，声音很轻。门打开了……嘿，你们保准不会相信！是玛丽娜！要知道，由于出乎意料，我一下子目瞪口呆了！”

“是啊，真是意外相逢，”谢尔盖惊诧地摇了摇头，“的确让人想不到。”

“就是嘛！”乌尔曼斯基激动地随声附和道，“总之，我还是进去了。老头儿在家。他们让我在桌前就座，请我喝茶。”

“请等一下。那么，他就是她的叔叔吗？”

“看样子是她叔叔。她称呼他‘您’，称呼名字和父称。还有，你们知道吗，她见了我简直吓坏了，我都没法表达。当她知道了我此行的目的以后，她才真的有点儿放心了。”

“奇怪。”

“非常奇怪！我好像还从来没有使姑娘们感到害怕过呢。”

“那么后来呢？”罗巴诺夫插话说。

“喏，我们喝了一会儿茶。顺便说一句，老头儿对她喜欢得不得了，甚至变得爱说话了，好像温和起来了。后来我邀请玛丽娜出去走走，想给她介绍一下我们的城市，到剧院去观看演出。但说什么都白费口舌！连费奥多罗夫都劝她了。当然啦，她不想去！我看出来了，她是害怕。所以我对她说：‘要是您愿意，我们三个一起去，叫上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他是个可信赖的人。’”乌尔曼斯基快活地眨了眨眼，“我给您做了这样一则广告，真没办法！我说，您在莫斯科内务部工作，是上校。”

“哎，应该说是中校。”

“这有什么意义！我差点没说是‘将军’。您知道吗？我觉得这样一来，她反倒更加害怕了。也许这只是我的感觉吧。不过费奥多罗夫对您发生了兴趣，开始问这问那。总而言之，现在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乌尔曼斯基出其不意地下结论说。

“您可真会扭转话锋。”罗巴诺夫笑起来，“恋爱这种事，他是行家。”

一切他都会妥善解决的。”

谢尔盖觉得很窘，淡淡一笑说：

“我不明白，干吗老是我扯进来呢？”

“什么叫‘扯进来’呀？”乌尔曼斯基大声喊道，“要是我们一块儿到那里去，……这一下子就解决了！”

“您知道，唯独这个我干不来。”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这能花费您什么呢？随便哪天晚上都成。您可不能脱离人民啊，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他们开玩笑地又争论了一会儿。晚饭不知不觉地吃完了。

谢尔盖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时大约晚上十一点。广播里在转播莫斯科新闻。狂风在窗外肆虐。“不知小伙子们在那里怎么样？”这个问题谢尔盖今天晚上已经不知想过多少次了。“遇上这样的夜晚……”他在房间里踱着步，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不知该干什么好。后来他坐在灯下，从公文包里取出在莫斯科就已经开始看的书，但是过了片刻，他便把书放到了一边。各种思想纷至沓来，所读的内容根本没有弄懂是什么意思。他一会儿想到谢苗诺夫，想到他莫名其妙地到局里来，想到他收到的那封信，并由此马上想到现在正埋伏在那里的同事们；一会儿想起乌尔曼斯基讲的事情，便开始想玛丽娜，想她奇怪的表现，想费奥多罗夫，但他的思想重又跳到设在谢苗诺夫家的埋伏上头……

谢尔盖往后一仰，靠在长沙发背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眉头紧锁，他那阴郁的目光盯着空间什么地方。过了一会儿，他霍地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终于决定要躺下睡觉了，便开始脱衣服。恰在这时电话响了。

“谢尔盖吗？”

他立刻听出是罗巴诺夫的声音。

“是我。你有什么事吗？”

“你那里情况怎么样？”

“我正准备睡觉呢。”

“我也是。听见了吗，风刮得呼呼的？”

“听见了。”

谢尔盖感觉到，罗巴诺夫也在焦急不安，于是他不知为什么觉得轻松了些。着急的毕竟不是他一个人。

“值班员打电话了吗？”

“打了。”

“怎么样？”

“一小时之前刚换上最后一拨儿人。小伙子们非冻坏不可。现在还没有一点动静。你知道吗，我有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我们自己给自己设下了埋伏，真的。那个坏蛋一定是想出了什么鬼花招。”

“有可能。只好等待了。”谢尔盖叹了口气。

“唉，恨不得马上跟到他们那里去……”

“是啊……可是这决不行。”

“说的就是嘛。”

“你还给值班员打电话吗？”

“一小时以后吧。”

“那你到时候也给我来个电话。”

“你就放心睡吧。”

“在这里跟你们在一起能睡个好觉。”

“明天要穿上制服。”罗巴诺夫用教训的口气说。

“顺便说一句，你也得穿上制服。”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睡吧。如果有情况，会叫醒我们的。”

“好吧。”

谢尔盖愠怒地挂上了电话。岂有此理！好像他第一次派人去设埋伏似的。“你现在就躺下酣然入睡吧。”他愤恨地对自己说，并开始急急忙忙脱衣服。然后他关掉床头灯，钻进冷冰冰的被窝里，用被子蒙住脑袋，闭上眼睛，立刻睡着了。

在谢苗诺夫家设的埋伏一无所获：没有一个人来找他。于是决定第二天夜里再设埋伏。

可是早晨……

罗巴诺夫来到谢尔盖这里，挖苦地问：

“你好像说过，你对戈尔利娜的行为有些不清楚，对吧？”

“我是说过。”谢尔盖警觉起来，预感到将要发生新的不愉快。

“举个例子说吧。为什么她给伊万诺娃拍电报说要到她那里去，而却跑到这里来了？”

“说的就是这个。不过她收到一封信，叫她来这里。所以她……”

“信？”罗巴诺夫没有办法再激发起朋友的好奇心，急躁地打断他，“原来这样。我们已经收到鉴定专家对写给戈尔利娜的信、戈尔利娜给伊万诺娃拍的电报、戈尔利娜在旅馆填写的住宿登记卡所做出的鉴定。这个我后来已经做了补充说明。”

“补充什么？”

“即这三件事原本均系一人所为！三件！看来，信是她自己写给自己的？这叫什么事啊！”

“是啊，”谢尔盖大为惊愕地拖长声音说，“问题就在这里……”

“而且越往后，这里边不明不白的人也就越多。我本人现在已经什么都搞不明白了。”

“我也是。而到后来，顺便说一句，有我们吃惊的：原来这一切竟然如此简单。”

“那就还得活到这个‘后来’喽。”

“比方说，我就抱着这样的希望。”谢尔盖闷闷不乐地回答道。

罗巴诺夫灰心丧气的脸上已经露出了笑容。他那乐观豁达的性格战胜了一切不愉快。

“算了，”他宣称道，“古代一位贤哲说过：‘我活着——我就抱有希望。’”

“这位老者是个乐观主义者。”

“不错，不错。这句话我铭记在心，还在上中学时就牢牢记住了。所以我也奉劝你把这句话记住。啊，我们曾有过多么出色的女历史学家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啊！现在这样的人没有了。”他精神焕发地下结论说：“总之，我们得拼命干。我和你的事够多的了。”

像往常一样，谢苗诺夫一早就开门营业了，侦查人员对他进行着严密的监视。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寻找先卡的工作同时在继续进行。但寻

找毫无结果，虽然刑侦人员好像搜遍了全城。急需找到先卡，因为他偷窃的身份证和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大麻膏可以立刻把谢苗诺夫揭露出来。关于戈尔利娜的案子，莫斯科没有发来任何新的消息，关于失踪的伊万诺娃，伏尔加格勒也没有发来任何新的消息，给其它城市发出的案情通报也没有任何消息反馈回来。

总之，这一天忙忙碌碌地过去了。天黑以后，一班侦查人员又出发到草甸大街去了。又是一个急人的夜晚，时间过得慢得令人难以忍受。这一次，谢尔盖到罗巴诺夫这里来了，他们一起吃了晚饭。他们守着电话机，似乎一步也不敢离开。但是谢尔盖一言不发，神色难以捉摸而可怖，至少罗巴诺夫觉得是这样。

夜半时分，电话响了。谢尔盖腾地从床上跳下来，穿着裤衩、光着脚，就向电话奔去。这是局值班员打来的电话。

“中校同志，埋伏的人员从草甸大街回来了。他们抓到一个人。罗巴诺夫少校已经出发了。五分钟之后，汽车来接您。”

谢尔盖急忙放下话筒，激动万分地开始穿衣服。

当谢尔盖走出大门时，一辆满是雪的汽车正停在人行道边。大街上，暴风雪怒号肆虐。汽车行驶得很慢，前灯隐没在犹如棉絮般狂飞乱舞的茫茫风雪之中。

行动小组的全体成员都集合在罗巴诺夫的办公室里。尽管他们疲惫不堪，冻得够呛，但个个都兴奋异常，争先恐后地讲述着所发生的事，不时彼此打断对方的话。

谢尔盖一眼便注意到正在听汇报的罗巴诺夫的表情。他脸上那股真诚的羡慕和浓厚的兴致，使谢尔盖不由得笑了。

原来那个人偷偷地走到谢苗诺夫的房子跟前，却没有被发现。当他已经上了房顶，到了紧门口，白色的墙壁上猝然清晰地显现出他的影子时，他才被发现。埋伏的侦查人员刹那间一跃而起，那人还没来得及敲门，便被抓了个正着。而谢苗诺夫全然不知道他来。尽管那小伙子身强力壮，性子暴烈，但侦查人员悄无声息而麻利快捷地抓获了那人，动作非常娴熟利落。他没有带武器，而且他根本就来不及把任何东西丢弃。还有一个令人奇怪的情况是，他是只身一人来的。

窗外天色蒙蒙亮了起来，这时罗巴诺夫终于说道：

“好了，一切都清楚了，弟兄们。现在请大家各自回家去休息，好好睡一觉。早晨我们开始第一轮审讯。”

可是早晨送来的是意想不到的新情况。

来自莫斯科的案情通报指出：“被害人戈尔利娜的照片没有被同事们认出来。请将她的身份证紧急送交鉴定。”

一小时以后，科技处作出结论：身份证上的照片被换过了，身份证本身是真的。

这么说来，被害人原来不是戈尔利娜。

第五章 原先的尼娜

那天早上，谢尔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旅馆打电话，但是那里没有人接。谢尔盖双眉紧锁，给值班经理打了电话，相当急躁地问，407号房间的客人科洛斯科夫是不是走了。搞清楚了客人还没有走，谢尔盖便请求转告，他一回来，就让他给科尔舒诺夫打电话，电话号码他知道。

“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形，”他对罗巴诺夫说，“我们越是深入了解，情况也就变得越加盘根错节。你认为呢？”

“是啊，”罗巴诺夫摇摇头，拖长声调说，“我一开始就跟你说过，这是个字谜。尽管我们现在跟谢苗诺夫一起终究会把某些情况搞个水落石出的。那个夜半来客在我们手里。而凶杀吗……看来，身份证是戈尔利娜的，而受害者不是她。这就是字谜的关键所在！那么请问，这个受害者究竟是谁呢？别人的身份证怎么到了她手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利娜本人究竟在哪里呢？”

“而且谢苗诺夫与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谢尔盖加了一句。

“也许没有任何关系吧？”

“有关系。这一点我确信不疑。”

“嗯。我倒有点怀疑。”

“是吗？那就让我们来还事实以本来面貌吧。”

“那好。”罗巴诺夫一边表示同意，一边唉声叹气，“把所有这些事实逐一还原，非得绞尽脑汁不可。”

他走到摆放在办公室一角的一个大保险柜跟前，着手把厚厚一摞文件夹取出来。谢尔盖挪了个座位，从长沙发上坐到更靠近桌子的地方，点上烟吸了起来。

这些文件他们看了不止一次。只需根据外表，谢尔盖和罗巴诺夫就可以立即想起每一份文件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但他们仍然耐心地重新读起来。

一系列事实，直到每一个细节，渐渐地串成一条熟悉的链子再现出来。

那么，所有的身份证（用来进行诈骗活动的）都是谢苗诺夫搞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看来，谢苗诺夫参与了犯罪活动。其中一次犯罪活动就是拿着在列车上被抢和被催眠的旅客的身份证所干的。由此可见，谢苗诺夫同这件事也有干系。况且，正是根据最近这次诈骗，科洛斯科夫认出了谢苗诺夫。这一切似乎都清楚了。

现在来分析一下旅馆里发生的凶案。在这件凶案中，也借助了在列车上使用过的安眠药。因此，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即这件事与谢苗诺夫也有牵连。况且他通过他妹妹完全可能搞到这样的安眠药。斯克利娅列夫斯卡娅好像没有认出他是后来被害的女人的同伴，这丝毫消除不了对他的嫌疑。甚至相反：谢尔盖坚信，斯克利娅列夫斯卡娅在撒谎。

“杀人的动机现在甚至还不清楚，”罗巴诺夫沮丧地说，“戈尔利娜的钱就算是被偷了，可是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身上也可能有钱。”

他们推论到此，不约而同地合上文件夹，摞起高高的一堆，摆放在桌边上。他们决定立刻审讯夜间拘捕的那个人。

过了一会儿，一个瘦高个子的小伙子被带进办公室。他穿一件绿色氨纶拉链衫，手里拿着时髦的拉毛鸭舌帽，留着精心修刮过的讲究的口髭，黝黑

的细长脸上满面倦容，执拗地咬着下嘴唇。

“坐吧。”谢尔盖一边说道，一边注意地仔细打量着小伙子。

小伙子默默地坐下了。

“您叫什么名字，姓什么？”

“阿列克……亚历山大。姓加米多夫。”

“住址？”

“嗯，假定是巴库吧。假定是委员街五号。”

小伙子有点蛮横地冷笑了一下，但谢尔盖装作没有觉察到他那挑衅性的语调。

“您的证件？”

“丢了。您要知道，我自己都感到很难过。”

“您向民警局声明证件丢失了吗？”

“我现在就极其正式地向您声明。”

“您到这个城市来干什么？您这里有熟人吗？”

“那当然？”小伙子又冷笑了一下，这一次笑得有点儿阴阳怪气，“要知道，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好人，也有不怎么好的人。但这与我无关，知道吗？”

“您答话有点儿粗鲁无礼。”

“可他们对我也粗鲁无礼。这样就算两清了。”

“不，”谢尔盖摇了摇头，“我们还远远没有两清。那天夜里您去我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小伙子用平静的语调回答说。

“您不认为，这听起来让人觉得相当愚蠢吗？”

“这对于您来说可能是愚蠢的。而对于我，您要明白，恰好相反。”

小伙子分明在耍嘴皮子。但在他那双富于表情的大眼睛却流露出忧郁的神色。

电话响了。谢尔盖拿起话筒，立刻高兴地大声喊道：

“对，对，是我！您好！非常希望您能到我们这里来一趟。我们派车去接您……哪里哪里，一点也不！……是一辆绿色‘伏尔加’，车号是……”

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罗巴诺夫。罗巴诺夫立刻提示道：

“三一一五。”

谢尔盖重述了一遍车号，放下话筒，几乎高兴地问被拘捕的小伙子：

“那么您是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喽？”

“我无法回答，”被拘捕的小伙子大大地把两手一摊，“我想睡觉。”

“那好，您就到走廊里去坐一会儿吧。那里也可以打个盹儿。”

小伙子被带出去以后，谢尔盖看了罗巴诺夫一眼，说：

“哎，你有什么要说的？”

“小伙子挺有意思。我甚至敢说，他是个大有希望的突破口。你决定让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看看他吗？”

“以备万一。你去派车吧。你现在大概要忙谢苗诺夫吧？”

……过了不大一会儿，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风风火火地闯进了谢尔盖的办公室。他十分激动，气喘吁吁，看得出来，他赶得很急。他穿着大衣，没有系扣，围巾从领子下边露出来，帽子从汗津津的前额推到后脑勺，塌陷的两腮上甚至出现了红晕。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跑到桌子跟前，一边扶扶眼镜，弯身凑近谢尔盖，一边激动地小声说：

“您知道坐在你们走廊上的那个人是谁吗？！这真令人震惊……他就是那个人……他来过我们单位……对，对，对……我清清楚楚记得他，记得比第二个人清楚得多……”

“这准确吗，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谢尔盖喜形于色地问。

“非常准确，就像……就像我现在看见您一样。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起誓……我的上帝，您可千万别把他放走，我恳求您……”

“您放心吧。”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离开以后，谢尔盖又传唤了被拘捕者。

“喏，阿列克，让我们来认真地谈谈。”

被拘捕者抬起温柔的眼睛，惊惶地望着他。这双眼睛里没有了先前那种放肆无礼的神情。小伙子的情绪显然改变了。“他大概认出了科洛斯科夫，”谢尔盖思忖道，“他大概明白了，跑是跑不掉的。”

“哎，现在反正都一样！”阿列克绝望地把手一挥，“您逮捕我吧。您甚至可以枪毙我。世界上将会少一个傻瓜。”他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如果您想要知道，那就可怜我的父母了。他们是那样相信，没有比他们的阿列克更好的人了，”他努力地克制住自己，淡淡一笑，“要知道，他们非常纯朴。”

“您可以跟他们见面。”

“哪里话，亲爱的！要是这样——儿子失踪了，也就算了。而这样——儿子是罪犯，这个我父母肯定受不了，受不了。”

“这事他们反正会知道的，”谢尔盖用下意识的沮丧口吻提出异议，“您以前都想些什么呢，阿列克？”

“哎！男人永远面临着两个危险——愚蠢的自尊心和漂亮的女人。”

“这两者都不可能把一个人推向犯罪。把一个人推向犯罪的是贪欲，是粗暴的残酷行为。而自尊心和爱情只会促使一个人去建功立业。”

“您说得很动听。”

“我说的是实话。您虽然刚才说过‘愚蠢的自尊心’，而漂亮的女人不过如此而已。当然，这也会改变一个人的事业。”

“现在这已经没有意义了，您明白吗。而且这也不会改变我的事业。”

“主要的是，要自我改变，”谢尔盖又反驳说，“到时候事业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后还会谈到的。那么现在您说一说，您来找谢苗诺夫干什么？”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谢苗诺夫。”

“可是您深更半夜敲他家门了。”

“是吗？这个我不知道。”

“我不信您的话，”谢尔盖摇了摇头，“这不可能。”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我不认识姓这种姓氏的人。”

“那就假定是这样吧。可是您那天夜里来干什么？”

“取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假定我不知道。”阿列克紧皱着眉头，“我对您说过了：逮捕我吧，审判我吧，哪怕枪毙我都成。我已经无所谓了。但是我决不会说出其他人。”

您要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账单付款。我现在就正在付款，但只付自己欠的账。”

“那好，您说得对，”谢尔盖同意道，“但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把账付清。每一个人，而不光是您一个。这是法律所要求的。人们希望生活得安定。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后还会谈的。”他拿起话筒，拨了电话号码，“是沃洛佳吗？请到我这里来一下。”

不一会儿，扎特金走进办公室。

“让这个人，”谢尔盖用头指了指阿列克，“到您房间里待一会儿。我会打电话的。”

“是。”

扎特金用手给阿列克指了一下门。阿列克叹了口气，站起身来。

“请您考虑一下，”他对谢尔盖说，“我可以再谈点儿有关自己的情况。但只对您谈。不知为什么，我喜欢上您了。”

他傲慢地扬起头，走了出去。

扎特金同谢尔盖彼此一笑，跟在阿列克后面走了。但是谢尔盖觉得他的微笑中好像含有嘉许的意味。“这个扎特金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谢尔盖心想，并决定要详细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他给罗巴诺夫打电话：

“喏，谢苗诺夫怎么样，在你那儿吗？”

“是的。”

“他有什么交代吗？”

“没有。”

“我现在到你那里去。”

谢苗诺夫坐在罗巴诺夫的办公室里，满脸通红，汗水淋漓。他穿着暖和的大衣，敞着怀，毛茸茸的帽子搁在膝头。

他看见谢尔盖走进来，立刻叫嚷起来：

“首长同志，这叫什么事呀！这种恐吓什么时候才完？！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一无所知！总之……这大概是搞错了！您自己都看见了，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来。直到现在都没有露面！”

“可是您曾坚信，他们一定会来的。”

“是的，我曾坚信是这样。但现在……现在我怀疑了。”

“可是他们来了，谢苗诺夫。”

谢尔盖凝目看了看他那双由于吃惊而瞪得溜圆的眼睛。

“来了？”谢苗诺夫用顿时嘶哑了的嗓音问道，“什——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夜间。”

“不一不可——可能……为什么我……也就是说我们……没没有听见任何动静呢？……”

“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但他们来了。而且把他们逮了起来。确切地说，是把他拘捕了起来。来了一个人。”

谢尔盖发现，谢苗诺夫惊惶失措了，真正地惊惶失措了。这一点十分清楚。但是为什么呢？

“一个人，”谢尔盖又强调说了一遍，“可见他来的目的不是要行凶杀人。”

“那为一为什么？……”

“这个我倒要问问您。”

“可是……我不知道！……让他自己说吧！……”

谢苗诺夫终于克制住了自己的激动，又转而嗷嗷大叫起来。

“他已经说了。”

“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

“那好。我们现在让您跟这个人进行对质。到那时您也许会想起点什么来的。”

“不，不！”谢苗诺夫惊恐万状地举起手来，仿佛要自卫，以免挨打，“我不愿意见他！说到底，我害怕，就这些！”

“您害怕什么呢？他已经被拘捕了。”

“反正一样……反正一样……”

谢苗诺夫又感到一阵阵神经质的寒颤。他那胖乎乎、红通通的面颊颤动起来。

“我们只能把这理解为这样一个意思，”谢尔盖特别平静地反驳道，“就是说，您害怕他说出您所不想告诉我们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听见了吗？……没有这回事！……我……那好！”他突然绝望地大声说，“您就折磨我吧！……您就嘲弄我吧！……”

“那么，您同意对质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您可以拒绝，”谢尔盖耸耸肩膀，“您没有被逮捕。没有对您提出起诉。”

“那当然！我要是拒绝，然后您就会……不，不！我同意！对质就对质！您会看到的……”

过了几分钟，阿列克被带进了办公室。他用冷淡的目光打量了一下谢苗诺夫，然后他的眼睛里刹那间闪过一丝冷笑。

“坐到这边来。”谢尔盖给他指了一下谢苗诺夫对面的椅子，并警告他们俩人说：“你们只能回答我的提问，你们不能互相提问，不能互相交谈和争论。清楚了吗？”

谢苗诺夫连忙点点头。阿列克冷冷一笑，耸了耸肩。

“现在我问您，谢苗诺夫。您认识这个人吗？”

“第一次见到。”谢苗诺夫断然回答说。

“您仔细看看。”

“不，不，这个同……这个公民我不认识。”

“那好，”谢尔盖把他的回答记录下来，并对阿列克也提出同样的问题。

“这个不大讨人喜欢的人使我想起了点什么。”阿列克挖苦地回答说，“假如他能够停止抽搐，那么我也许会回想起来。放心吧，亲爱的，”他对谢苗诺夫说，“坐在一起将会更加愉快的。”

“回答问题要严肃。这不是开玩笑。”谢尔盖正言厉色地提出警告。

“假如要严肃的话，那么，很遗憾，我就不会遇见他了。”

“是这样。”谢尔盖忍住了笑。可以肯定地说，他有点喜欢这个阿列克，尤其是跟谢苗诺夫比较起来。但他向阿列克提出一个新问题：“您深更半夜到谢苗诺夫家里去干什么？”

“取一样东西。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谢苗诺夫大叫起来，脸又涨得通红，“我发誓，我……”

“谢苗诺夫公民！”谢尔盖打断他说，“我现在没有问您。”

“可是……可是我抗议！他胡扯！……厚颜无耻地撒谎！”

阿列克攥紧拳头，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撒谎？狗东西？！”

罗巴诺夫用手按住他的肩膀。阿列克怒不可遏，浑身颤抖，重又在椅子上坐下来。

“好吧，”他威胁地说，“那您就记录吧。要知道，我认识这个狗东西。我本来要从他那里取……一只手提箱！……”

可是从他口里再也得不到任何东西了。他坚决拒绝回答。

谢苗诺夫提心吊胆地斜眼看着阿列克，固执地一遍遍地说：

“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发誓，是第一次……而且我没有任何手提箱！……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

于是谢尔盖开始觉得，他说的是真诚的。

对质终于结束了。阿列克被带走了。谢苗诺夫疲惫不堪地从位子上站起来，用手绢擦着汗湿的脸和脖子，问道：

“我可以……走了吗？……”

他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忙不迭地朝门口走去。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谢尔盖问，这时就剩下他和罗巴诺夫两个人了。

“很想知道这个手提箱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那个呢？”

“你是说火车上的那个吗？阿列克亲自去接站的，跟那个穿毛皮大衣的姑娘一起去的。可是谢苗诺夫……”

“谢苗诺夫好像确实不知道这个手提箱。”

“那么手提箱知道他喽？”

“是啊。”罗巴诺夫长出了一口气。

“这是胡说八道！”

“是胡说八道，但却是事实。”

“你知道。二者必居其一。”

“假如我说我什么都搞不明白，这会使得你更加满意，对吗？”

“当然，”谢尔盖不高兴地冷笑了一下，“至少我们将会处在同样的地位。”他停了一下，补充说：“总之，谢苗诺夫不像团伙的头子。”

“至少肯定是团伙的成员。”

“这是另一回事。但是头子……干这种事，应该是危险的头子。”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罗巴诺夫一眼，“还有，我认为，谢苗诺夫什么时候都不会去杀人的。他不是那种性格的人。”

“嗯，你也许是对的。”罗巴诺夫怀疑地应了一声。

他们最后决定，必须休息一下，按时吃顿午饭，哪怕就一次也行。于是，像往常一样，他们说好决口不谈公务。休息就是休息。

他们顺着宽阔的楼梯下楼时（食堂位于半地下室），罗巴诺夫谈起了关于冰球的热门话题。于是，不用说，立刻爆发了一场争论，因为两个狂热的球迷不可能不谈冰球，况且谈的是组建一支球队，这支球队由来自各地的球员组成，目的是在即将举行的比赛中夺取世界冠军。他们各自都热烈地坚持自己的候选球员，表现出所有真正的球迷所特有的渊博知识，口若悬河地说

出一连串术语和去年国际比赛中的例子。同时，罗巴诺夫跟迎面碰上的同事们一一打招呼，介绍谢尔盖跟他们认识，极力打趣逗乐。他那乐观的性格轻松地战胜了疲劳，所以，谢尔盖望着他，几乎觉得自己身体上的疲劳也渐渐消失了。他已经多少次地感到高兴的是，在办这种棘手而错综复杂的案子时，这个人总是跟他在一起。

这一次食堂里人很多，来来往往，十分喧闹。他们狼吞虎咽，吃得很香。谢尔盖说：

“知道吗，我很喜欢你的扎特金。”

“大家都喜欢他。他是个有前途的小伙子。”

这是罗巴诺夫喜欢说的一个词，从他在莫斯科“狄那莫”当桑勃式摔跤编外教教练时起，这个词就一直挂在他嘴边。于是，谢尔盖淡淡一笑，问道：

“而且还是个富有成效的吧？”

这是罗巴诺夫喜欢说的又一个词。

“你瞧着吧。”他狡黠地回答说。

两人坚决地恪守着不谈公务的约定。可是难道能够不去思考它吗？尤其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中，说话很费劲，更多的是沉默。于是谢尔盖琢磨起阿列克来。这个小伙子是怎么回事，从哪里来？他是怎么卷进犯罪活动的？他可是个有文化、相当聪明的小伙子，爱自己的双亲。当然，他脾气暴躁，自尊心很强，高傲自大。阿列克今天说：“愚蠢的高傲自大。”看来，他不知对什么有点惋惜，发现自己的什么疏忽……发现这样的人有“愚蠢的高傲自大”并不难，因为他年轻，没有经验，大概刚刚从父母的羽翼底下飞出来。而且父母在高加索。他为什么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他的犯罪联系不可能在那里，他的故乡城市，而且不可能把这些联系带到这里来。阿列克显然出身于良好的、诚实的家庭。但是阿列克怎么到这里来了呢？离家出走？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他是爱父母的。大概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要么是发生了不幸的恋爱？不，单为这种事不会离家出走的。阿列克说过：“漂亮的女人……”可是他把漂亮的女人称之为“危险”，人们对爱情，甚至是对不幸的爱情，一般是不这么说的。显然，他后来碰上一个“漂亮的女人”。那么，阿列克到底为什么远离家园，来到这里呢？假若他不是离家出走，那么他大概是到莫斯科或博尔斯科的什么人那里来作客吗？或者进学院读书？假若他是来作客，那么他应该住在谁家里或者朋友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偶然的、更何况是犯罪的联系是很难的。而假若他是来求学的，只身一人，到异地他乡，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种事谢尔盖知道的多了！阿列克究竟是到哪里去：莫斯科抑或博尔斯科？他的道路同那个主要的、最危险的人的道路在什么地方突然交叉起来了呢？阿列克被什么钩住了，被什么钩子钩住了呢？看来，很可能是那个“漂亮的女人”，当然还有“愚蠢的高傲自大”。

是啊，谢尔盖又面临一场人的悲剧，不知又是谁的被蹂躏、被摧残的命运！所以，主要的不是排除，而是争取人的斗争，这种情形已经不足为奇了。而这个小伙子值得去争取，甚至与他本人一道去争取。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罗巴诺夫冲他说道。

“你说什么？”谢尔盖回应道。

“我说，你还要水果罐头吗？”

“不要了，不要了，我们走吧。”

他们从食堂里走出来，点上烟吸了一口，不急不忙地登上了楼梯。

“我想出一个主意，”罗巴诺夫说，“我认为这个主意大有希望。阿列克要来取的那个手提箱……还有在车站上拿手提箱的那两个人……是这样吗？”

“好像是。后来呢？”谢尔盖发生了兴趣。

“后来就是现在这种情况。科洛斯科夫认出来的谢苗诺夫从车站上一直跟着那两个人。而后来阿列克到他那里去取手提箱。不是胡说吧？”

“嗯，不明白。”

“那么也许跟着的不是谢苗诺夫？也许科洛斯科夫弄错了？”

“不管怎么样，他后来把他认出来了，但不敢肯定。是在那里，在市场上认出来的。可是在车站上……除非他们没有跟着他。”

“正是‘他们’！”

“是啊，这很有意思。并且可以向他提出两个问题。”谢尔盖沉入幻想地说。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阿列克……应该再确认一次，他是否到过车站。”

“慢，慢。到车站来接拿手提箱的那两个人的是一个高个子青年和一个穿灰鼠皮大衣的姑娘。是这样吧？”

“这是科洛斯科夫说的。看见他们的还有那个胖子。并且那个青年穿着黑色大衣，戴着帽子。而阿列克……”

“咳！”罗巴诺夫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是啊，当然，”谢尔盖同意道，“所以才这样。”

莫斯科刑侦局的这两位老朋友学会了相互理解。

谢尔盖叹了口气：

“唉，有什么东西就在我们身边，跟我们走在一起，但我们就是抓不住。”

“那么我得找那个胖子摸摸情况，”罗巴诺夫下结论说，“我们好像把他忽略了。”

“务必得找他。我现在就给莫斯科打电话谈一下。我还要跟阿列克再谈一次。他是个大有希望的小伙子。”谢尔盖使了个眼色。

他们在楼梯口分手了。

谢尔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一进来，电话立刻就响了，好像专门等他回来似的。谢尔盖拿起了话筒。

“中校同志，”他听出是值班员的声音，“这里有一位公民来找您。允许放他进去吗？”

“找我？”

“是的。他指名道姓要找您。”

“他姓什么？”

“费奥多罗夫。”

“嗯，我不认识这样一个人。那就让他进来吧。”

“是。”

费奥多罗夫，费奥多罗夫……这个姓似乎挺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姓呢？近几天来，闪现过多少姓，多少人啊！费奥多罗夫……肯定有人向他提到过这个姓……啊一啊，想起来了！啊呀，就是那个乌尔曼斯基！难道是他打发他来的吗？反正他是个厚脸皮的小伙子。而且那老头儿也够可以的……他们可找到了请去做客的办法。

谢尔盖生气了。当有人敲门时，他大为不满地厉声喊道：

“进来！”

一个大块头的人，穿着短皮袄和粗笨的毡靴，侧着身子走进办公室，把手中的帽子揉成了一团。他那汗津津的满头白发乱七八糟地四下支棱着，马马虎虎地朝后梳去，露出刻满一道道深皱纹的宽大前额。留着口髭的圆脸被寒风吹得通红。这个人迟疑不决地在门口站住，他那强壮的躯体差不多把整个门都挡住了。

“啊哈，”谢尔盖不由得惊叹地想道，“不用说，这样的人打仗无疑会屡建战功，成为英雄。”只是他那过分的矜持，几乎是胆怯，使人想象不出这个人曾会立下赫赫战功。

“进来吧，费奥多罗夫同志，请坐。”谢尔盖邀请道。

老头儿终于离开门口，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地走到桌子跟前。椅子在他身下边威胁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谢尔盖这时才发现，他那粗糙而宽大的手里握的好像是一张不常见的很小的身份证。

费奥多罗夫把帽子搁在膝盖上，掏出带花条的手绢，擦了擦汗淋淋的发红的脖子，咳嗽了一下，声音嘶哑地说：

“这是身份证……也许……这个能用得着……”

他小心在意地，甚至好像提心吊胆地把身份证放在桌子上。

谢尔盖更加明显地感觉到，这个大块头的人来找他远不是平白无故的，远不是乌尔曼斯基的微不足道的请求能使他来这里的，这一切要复杂得多，所以费奥多罗夫才这样难为情，才这样激动不安和不知被什么事情弄得沮丧不堪。于是谢尔盖立刻想起了乌尔曼斯基关于使他，谢尔盖，对老头儿一下子发生兴趣的那番话。

这时，费奥多罗夫大声地叹了口气，他那浅色的眼睛从乱蓬蓬的浓眉底下审视地、几乎六神无主地望了谢尔盖一眼。他仿佛很胆怯，不敢开口说话，他仿佛在内心里做着最后抉择：他要不要开始谈话。然而，这个人异乎寻常的大块头和他那令人不快的、不知所措的目光彼此不相符合，以致谢尔盖急忙帮他解围。他拿起身份证，把它打开来，习惯地浏览着上边的登记，说道：

“那么，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

费奥多罗夫垂下乱蓬蓬的花白的头，低声说：

“我叫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

“这么说，是身份证上弄错了吗？”谢尔盖微微一笑，“您想把它改过来，是吗？”

“是的……”

“那么这事不该来找我。”

“这事就得来找您。”

谢尔盖从他那嘶哑的嗓音里听出有点怪腔怪调，这使他警惕起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

“怎么回事？……”费奥多罗夫终于抬起了头，悲伤地看了谢尔盖一眼，“我的事情是这样的……您算算，已经拖了三十年了，可是我过的根本就不叫生活。就是这么回事。路上的母鸡盯着我看，而我在它那圆溜溜的眼睛里看到的却是挖苦：‘我认识你，我认识……’小麻雀在窗户外边冲我喳喳地叫唤，也是这个意思。而我在人们面前却不能说。要是我当初知道在每一个人面前感到恐惧是什么滋味就好了……”

费奥多罗夫用嘶哑的声音慢吞吞地、吃力地挤出这番话来。他的眼睛模糊了，他那麻木不仁、不听使唤的嘴唇微微颤动，看着他这副样子就让人觉得奇怪，甚至有些可怕。

不知这个奇怪的白发巨人还会说出什么话来，为了在此之前驱散笼罩在心头的恐惧，谢尔盖精神勃发地说：

“在人们面前有什么可恐惧的呢，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据说您在前线打法西斯非常英勇。”

“不是说人们，”费奥多罗夫摆了摆手，“我是说我们的人。这种恐惧，它使我睡觉都提心吊胆。它毁了我一生。在前线……我第一个冒着枪林弹雨拼命往前冲。‘你打死我吧，求求你，打死我吧，行行好。我挺不住了。’后来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是俄罗斯人呢，还是别的什么人？不是别人，是俄罗斯人。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应该打坏蛋。待会儿我们会把事情搞清楚的。于是我就开始掐死他们这帮可恶的家伙。这样一来，我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可是夜里做梦老是梦见这帮可恶的家伙。是啊……这段时间对于心灵来说是安宁的。”费奥多罗夫怀着突如其来的忧郁做出结论说。

谢尔盖默默地听着，心里越来越感觉到恐惧。此时此刻费奥多罗夫所讲的这番话的背后有某种可怕的东西，而且谢尔盖什么也不明白，惟恐让这虚伪的不实之词影响了这个人吃力的坦白倾诉。

“喏，战争结束后，我回到家里，仍然像从前一样是个外人。自我感觉像个外人，这是最主要的。”费奥多罗夫没有抬头，继续闷声说道，“妻子等着我，而我对于她也是外人，因为我们没有孩子。我害怕他们，自己未来的孩子们。因为他们也会……”费奥多罗夫喉头哽住了，他费劲地往下咽了一口唾沫，用越发低沉的、勉强听得见的声音接着说：“……他们也会成为外人的。为这事，她，也就是我的妻子，不知流过多少眼泪，只有我和枕头知道她。我对她说：‘你抛弃我吧。’我真恨不得自杀。她拦住了我，并留下来与我相厮守，她这苦命的人……”

费奥多罗夫不作声了，眼睛望着地板。

谢尔盖轻声问：

“您把事情真相告诉她了吗？”

“没有，没告诉。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我没有勇气这样做。而且我在人们面前悔过，为时已晚。我只是对自己感到惊讶，我竟然脖子上挂着这块沉甸甸的石头活到现在。可是现在……我们家里来了个小姑娘……”

“是玛丽娜吗？”

“是她……而且您也正好是从莫斯科来的。所以我打定了主意……”他大声地叹了口气，抬起头来，他那浅色的眼睛里表现出一种悲伤的果断神色，“由于自己的原因，我巴不得死掉才好。我只盼着快点死掉。就是因为她，这只小鸟……”

“您家到底出什么事了，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

“说来话长。是这么回事。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年轻，上过七年学，在集体农庄工作。有一次派我去拉种子。我给拉回来了。结果种子不但不能播种，甚至喂牛牛都不吃。总而言之，是他们偷偷塞给我的。而我因为糊涂，已经在该签字的地方签了字。结果就我一个人成了罪人。我受到

了审判。根据严厉的法律，我被判处十年徒刑。就是这么回事……”

费奥多罗夫不吭声了。谢尔盖惊诧万分，沉默无言。办公室里一时寂静下来。费奥多罗夫叹了口气，接着说：

“是啊……那么我，一个受迫害的人，从此去了我该去的地方：寒冷的北部地区。当时我脑子里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我要逃跑。我没有必要白白待在那里。我在那里待了一年，或者一年多时间，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后来，总之一句话，我逃跑了。我当时年轻体壮，精力旺盛，而脑瓜子里却一片空白。于是我就想到了逃跑。我没有被抓住。我徒步穿过整个泰加森林，用手把狼掐死，吃树皮充饥。可是我并没有打算，没有想到，我会跑到罗斯托夫市。到了那里，有一个人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农庄急需人手，你去应聘吧。于是我来到了国营农场。在那里，为了使自己良心上过得去，我用了十个昼夜就把一个个山头搬掉铲平了。人们见我这样拼命干活，就劝我留下来。根据我的口述，他们给我编了一个所需要的证明书。从此我就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农场紧密地连在了一起。我在那里干活既是因为害怕，也是因为良心。我上了光荣榜。我培植甜菜。为此，我曾到莫斯科参加了展览会。我培植的甜菜一下子出了名。已故的父亲就曾培植过甜菜，我还是小不点儿的时候就帮着父亲干活。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我在莫斯科获得了奖章，还有证书。但所有这些证书和奖状却烧灼着我的手。那上面写的明明是别人的姓名，是我随便想出来的。人们对我十分尊敬，而我却卑鄙地欺骗了他们。我心里当然还有一个恐惧。但愿他们千万可别知道我是逃犯。这时，恰巧在战争爆发前夕，我碰上一个姑娘。我爱上了她，简直爱得神魂颠倒。不久，我们就结婚了，但我还是那样神魂颠倒。国营农场为我们举行了婚礼。我记得，我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后边，又是笑又是哭，眼泪刷刷地流、心怦怦地跳。是啊……我自己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给糟蹋了……婚礼以后，我心里更加难过了。我完全打算好要坦白承认，但这时战争爆发了。嗯，关于战争，我已经给您讲过了，”费奥多罗夫唉声叹气地结束说，“后来的事我也讲了……”

他又默不作声了。

谢尔盖也默默不语，他想集中思想，想努力去理解，去搞清楚这整个不如意的、悲惨的生活，但却力不从心。他明白，费奥多罗夫期待的不是要从他这里得到原谅，不是某些安慰的话语，而是解脱，不惜任何代价的解脱，因为他内心里再也承受不起这个可怕的压抑，他的力量已经到了极限。于是谢尔盖突然想起费奥多罗夫说玛丽娜的话。她来了，于是他惊惶失措，跑到这里来找谢尔盖。可是为什么呢？她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她是什么人？

费奥多罗夫似乎猜到了这些问题，挺直腰板，冷峻地看了看谢尔盖的眼睛，好像已经做出了不可改变的决定，毅然决然地说：

“我们没有孩子，我不敢要孩子，既然过着欺骗的日子。可是在我的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个姑娘出现了。她是孤儿，看来也受了不少苦。于是我和妻子决定把她收养下来。可是这件事不能有任何欺瞒。所以我就这样决定了。不能让她跟别人的姓，而要跟我自己的姓。”

“她已经是成年人了，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她应该保留自己的姓。”

“这没有意义，”费奥多罗夫斩钉截铁地反驳道，“既然她将来要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而且一般地说……所以我来找您。也许我那痛苦的三十年……”费奥多罗夫的声音发颤了，于是他又咽了一口梗在喉咙里的东西……

“也许我们的政府会把那三十年抵销了。”他小声地、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补充说：“我的本姓是叶戈罗夫……”

“我认为政府会把它撤销的，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谢尔盖点了点头，“我认为法庭将会重新审理您的案子。”接着，他坚决地补充说：“我将亲自去见共和国的检察长，我向您保证。不过得把这一切写下来才行。”

费奥多罗夫不知所措地把两手一摊。

“我该把这写在哪儿呢？……”

“我们一块儿来写。马上就好，”谢尔盖立刻行动起来，觉得他所有的案子和急于要办的事情在这个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面前都变成次要的了，不知退居到什么地方去了。假如他不出面过问，不给予帮助，那么他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这一点，会永远失去对自己的尊重。不知为什么，他脑海里掠过一个个关于维季卡、关于父亲、关于母亲、关于战争和前线思想，还有其它一些不知什么狂热、激动的思想，他没有把这些思想抓住，它们犹如一股热浪向他袭来，旋即消失了。谢尔盖弄不明白，他在给共和国的检察长写声明时，他的手为什么像发寒颤似地颤抖，为什么他一直觉得口干舌燥。

当声明快写完时，谢尔盖说：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为了更好地说明情况，关于您收养玛丽娜为义女的愿望，也应该写上。”

“那当然。一定要写上。就说是我愿意收养玛丽娜·弗拉基米罗夫娜·伊万诺娃为义女……”

“什么？”谢尔盖由于出乎意料而紧张起来，倏地抬起头，惊诧地看了费奥多罗夫一眼，“她叫什么名字？……”

“我是说，她叫玛丽娜·弗拉基米罗夫娜·伊万诺娃。”

“我们正在寻找她！”

谢尔盖由于意想不到的发现而仍然无法恢复平静。

费奥多罗夫不安地蹙起眉头，问道：

“她干了什么事吗？”

“她什么事都没有干！她失踪了。她离开了自己的伏尔加格勒，就这些。而那里却在寻找她。”

“她可是个孤儿！”

“单位里都着急了。她工作了。”

“哎，这是另一回事。请您写信告诉他们，就说找到她了。”

“这是肯定的。不过我需要和她谈谈，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

“敬请光临。”费奥多罗夫持重地回答说。

“什么？”谢尔盖振奋起来，“这主意不错。”

他们把声明写好了，并约定谢尔盖晚上到费奥多罗夫家去。

“您先别告诉玛丽娜，”谢尔盖请求道，“其实这是小事，但她会激动不安的。最好是我亲自向她把这一切解释清楚。好吗？”

“就照您说的办吧。”

“至于这件事，”谢尔盖把手按在声明上，“我会全力去办的，请放心吧。只是随后您得到莫斯科去一趟。”

“天哪，您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费奥多罗夫苦笑了一下，“只要这一切有个判决，我就算解脱了。您请放心好啦。”

他们就此分手了。

谢尔盖打电话给罗巴诺夫，但是他不在办公室。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可是罗巴诺夫不跟谢尔盖碰头是不会离开的。“他到底在哪儿？”谢尔盖急切地想道。他急欲想把自己的意外发现告诉朋友。玛丽娜·伊万诺娃找到了，真难以设想！现在终于将要顺利地查清在旅馆里被杀害的那个女人是谁了。要知道，她给玛丽娜拍了电报，打算到她那里去的。她们大概是好朋友吧。而且说不定玛丽娜甚至会邀请那个男人。必须把谢苗诺夫介绍给她认识一下。

这时谢尔盖想起来，他没有向费奥多罗夫打听一下，玛丽娜是怎样到他家里来的。也许他们从前就认识？要么他认识她的父母？要么他们有共同的朋友？这一切当然必须搞清楚。可是谢尔盖深为这个人的命运所震惊，以致无法集中思想，无法关注任何其它事情。这倒没什么。反正这一切他今天晚上都会知道的。

谢尔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了一会儿步，心不在焉地从窗户里望了望白雪覆盖的空荡荡的院子，然后来到走廊上，徐步朝二楼刑侦处走去。

下楼梯时，他正好看见扎特金。扎特金急如星火地上楼，跟他碰了个正着。他穿着大衣，没有系扣子，帽子推到后脑勺，满脸通红，兴高采烈，看来，他是刚刚从什么地方回来。扎特金看见谢尔盖，高兴地笑起来，像小孩似地做了一个大跨度的、麻利的跳跃动作，跟他并排走在了一起。这时，谢尔盖刹那间觉得这很像他本人，只是年轻了十岁，那时他刚开始在刑侦处工作。想当年，他也是这样矫捷、热情和愉快，也是这样炫示自己的青春和活力。

“您好，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我正好来找您，”扎特金生气勃勃地说，“我们刚刚回来。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他回头看了看，“随后就到。”

谢尔盖微微一笑。

“不一定吧，他还没有到。”

“那我跑去看看……瞧，他来了！”

果然，罗巴诺夫在楼下出现了，穿着大衣，戴着帽子。

“怎么样，有消息吗？”谢尔盖问。

“当然有！到我们这里来吧。”

他们等到了罗巴诺夫，三个人一起朝他的办公室走去。半道上，谢尔盖开玩笑地说：

“你们可别太自高自大了。反正我的消息更重要。而且我根本没有时间：我今天被邀请去做客。”

“是吗？”罗巴诺夫饶有兴趣地看了他一眼，“如果不是秘密的话，请问，到谁那里去做客？”

“去玛丽娜·弗拉基米罗夫娜·伊万诺娃那里。”

“什么？！莫非这真的是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人吗？”

谢尔盖神气地点点头：

“正是她。”

他们走进办公室以后，罗巴诺夫坚决地提出：

“见鬼。你先说说吧。”

“好的。”

于是谢尔盖不厌其详地讲述了一遍自己同费奥多罗夫的谈话，不知不觉地讲得十分起劲。他讲完以后，办公室里一时沉默下来。罗巴诺夫终于开口

说：

“是啊……这事非同寻常……平白无故是想不出来的。但不管你怎样认为，要是我……”他摇了摇头，“我要先审查一下这个费奥多罗夫。”

“那好啊。可是我今天要去他家里做客。”

“当然啦！”

后来。罗巴诺夫通报了自己的消息。伊万·奥西波维奇·杜布科——同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一块来的那个胖子，清清楚楚地记住了他来到博尔斯科头一夜碰上的那个人。可是在市场上把谢苗诺夫指给他看时，他却并没有认出谢苗诺夫是那个人。

“情况就是这样，”罗巴诺夫把两手一摊，“可见，口供不尽一致。”

“科洛斯科夫也不是那么肯定地把他认出来的，”谢尔盖指出，“真奇怪。还有什么情况吗？”

“另一个消息好一些。杜布科认出了阿列克，十分肯定。尽管阿列克在车站上穿着大衣，戴着帽子。”

“就是跟穿灰鼠皮大衣的姑娘在一起的那个小伙子吗？”

“对，对。”

“听我说，”谢尔盖摇了摇头，“那个姑娘越来越使我感兴趣。她认识阿列克和谢苗诺夫。所以，谢苗诺夫应该认识阿列克？况且阿列克认识他。”

“那还用说。应该找到这个姑娘。”

罗巴诺夫看了看扎特金。

“她后来再也没有找过谢苗诺夫，”扎特金愧疚地叹了口气，“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市场上。后来简直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她。而且，关于她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甚至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听我说，那个玛丽娜穿什么样的皮大衣？”罗巴诺夫出其不意地问。

谢尔盖把手一挥。

“黑色皮大衣。而且这根本不是她。我见过那个姑娘。”

最后决定“停止讨论”，这是罗巴诺夫的说法。于是谢尔盖急忙准备去做客。

一小时以后，谢尔盖已经走在了长长的、灯火通明的大街上，大街两旁新楼林立，灯火辉煌。宽阔的人行道上熙来攘往，谁也不急不忙，人们或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或全家在一起漫步，彼此高声而愉快地交谈着，向熟人打着招呼。可以看出，这条新建的轩敞的大街业已成为居民们散步和晚间休息纳闲的好去处。灯火明亮的电影院门口聚集着一群人。

谢尔盖把地址记得很清楚，现在他从容不迫地走在这条他觉得十分诱人的街上，不时看看楼号。但他走得离他所要去的楼房越近，他就越加激动。

“我好像去赴约会似的。”他暗自冷笑了一下。

终于找到了所要我的那栋楼。谢尔盖拐进昏暗的院子里，信心十足地走进了一进大门的第一个单元。费奥多罗夫的住房在一层。谢尔盖登上梯阶，按了门铃。门上包着棕色人造皮革。

给他开门的是主人本人。他穿一件宽大的、有点皱巴的西服上衣，打着领带。这一次，他那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费奥多罗夫一见谢尔盖，急忙把挺粗的食指按在嘴唇上，暗示两个女人什么都不知道和没有必要知道。谢尔盖点头作答，好使费奥多罗夫放心。他明白他的意思，并大声说道：

“晚上好，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他称呼着费奥多罗夫的名字，

这是费奥多罗夫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给自己想出来的名字。

这时，一个女人从房间里走出来，只见她体态端庄，脸色红润，年纪要摸四十五岁，浓密的黑发盘成一个挺大的发髻，浓浓的眉毛乌黑亮泽，一对大眼睛也是黑亮亮的，带着毫不掩饰的惶恐不安的神色感兴趣地望着客人。看来，费奥多罗夫告诉了妻子，说他们的请求将会得到这个人的支持，说他将会帮助他们，所以她试图猜出，是不是丈夫把自己的希望搞错了。

“请进来吧，欢迎光临，”她一边微微地鞠着躬，用唱歌似的声音说道，一边用手指着房间的门，“玛丽诺奇卡马上就来。”

“这是我的内人加利娜·扎哈罗夫娜。”费奥多罗夫有点不好意思地介绍着自己的妻子。

“曾经是个大美人。”谢尔盖情不自禁地暗自想道。

这所狭小的住宅里暖和而舒适。房间非常清洁，简直像消过毒一样，这使谢尔盖大感惊讶。摆放整齐的家具似乎没有人用过，浆过的雪白的桌布上和长条台布上没有摆放任何东西，抛光的椅子、桌子和餐具柜上好像从来没有落上过灰尘。一只大托盘里摆着花盆，由此可见，他们侍弄花卉热心而精细。

一开始谈的都是家长里短：谈这个城市，谢尔盖以前没有来过，谈非同寻常的、持久的严寒，谈莫斯科，两位主人一次也没有去过那里。

加利娜·扎哈罗夫娜摆桌子准备开饭。她端着餐具从窗前走过时，微微一笑，说道：

“您看，玛丽诺奇卡在那儿。她正在跟女友告别呢。”

谢尔盖走到窗户跟前。玛丽娜站在大门旁边，穿着黑色皮大衣，戴一顶挺大的皮帽子，而跟她站在一起的是……谢尔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跟玛丽娜站在一起的是那个穿着浅色灰鼠皮大衣的姑娘，正在慷慨激昂地对她说些什么。就是那个姑娘……谢尔盖不得不极力克制住自己，以免就这样只穿着西服上衣飞快地跑出去。只有这个念头才把他阻止住了：既然这个姑娘是玛丽娜的熟人，那么她现在肯定是瞒不过他的。可是活见鬼，她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他终于十分勉强地迫使自己离开窗户，带着他难得的笑容说道：

“噢，我和玛丽娜是老熟人，可以说，我们在莫斯科就认识了。”

“是啊，是啊，她说过，”女主人一边兴奋地答话说，一边在桌子上摆餐具，“而且戈沙也一个劲儿赞扬您呢……”

她指的是乌尔曼斯基，谢尔盖没有马上弄明白。

不一会儿，玛丽娜来了。她看见谢尔盖，好像顿时有点惊慌地瑟缩起来，胆怯地向他伸出冷冰冰的、微微发抖的手。谢尔盖对她的惊慌并不感到诧异。现在很容易把这个惊慌解释清楚，就像玛丽娜当时在飞机上的举动一样。搞不清楚的只是她从伏尔加格勒出走的原因。但目前主要的是，首先必须查明玛丽娜对在旅馆里被杀害的那个女人所知道的情况，当然还要查明她的这位新朋友是谁。

喝茶的时候谈话进行得不顺利。费奥多罗夫回避问题，故意不作答。玛丽娜仍然惶惶不安，只有谢尔盖和女主人试图缓解这难堪的局面。

后来，费奥多罗夫和妻子借口到厨房去了，于是谢尔盖对玛丽娜说：

“让我们来谈谈吧。”

“好的……”

“您不必怕我，玛丽娜。我是打算帮助您的，”谢尔盖真心诚意地保证说，“您想在这个家里留下来，是吗？”

“是的……”

“那好极了。他们好像真正喜欢上您了，而且他们都是好人。”

“非常好！”

“所以我才要帮您留在他们家里。”

“真的吗？……”玛丽娜畏怯地问，抬起灰色的大眼睛，望着谢尔盖。

“当然是真的。但是您也要给我帮个忙。您认识这个女人吗？”他从钱夹子里取出一张照片，隔着桌子递给那姑娘。

玛丽娜吃惊地看了看照片，但却立刻怀着莫名其妙的轻松感摇了摇头。

“不。我不认识她，根本不认识。”

万分惊讶的谢尔盖勉强克制住满腔的懊丧，尽可能婉转地反驳说：

“不，玛丽娜。她给您往伏尔加格勒发过一封电报，打算到您那里去。您仔细看看。也许是照片拍得不大清楚吧？”

“不，不。我向您发誓……我根本不认识她。根本不认识。而且……而且我没有收到过任何电报。”

姑娘说得很真诚。怀疑她的话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谢尔盖感觉到一种恐惧在支配着她，一种莫名其妙的、这一次任什么都无法解释清楚的恐惧。而主要的是，谢尔盖所掌握的那些事实不足以核查玛丽娜说的是不是真话。这一切出人意料而又奇怪地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谢尔盖干脆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坚持原来的计划吗？但这决不会有任何收获。揭穿玛丽娜的谎言，最后把写着她的地址和姓名的电报拿给她看吗？但最奇怪的是，谢尔盖情愿发誓，姑娘说的是真话。不，不，现在最好不要再触及这个问题。应该静静地想一想，跟同志们商量商量，把这一切再检查一遍。归根结底，玛丽娜哪里也跑不掉。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尽力使她平静下来，她吓得浑身发抖。于是谢尔盖一摆手，说道：

“那好。您不知道就不知道吧。总之，这是小事。”他由于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而浑身一颤。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后来谢尔盖重新问道：“您为什么那样突然地离开了伏尔加格勒呢？”

“我再也无法单独一个人生活了，我不能，”玛丽娜急忙回答说，怀着某种新的恐惧望了谢尔盖一眼，“我太苦闷了。我没有想到……我要留在这里。现在我要给单位写信，提出辞职。”

“您也没有想到这里会有那么多朋友吧？”谢尔盖愉快地加了一句，“有格奥尔基，还有后来那个姑娘。我从窗户里看见你们了。”

“啊，您是说塔玛拉奇卡？”玛丽娜淡淡一笑。

“大概是格奥尔基介绍你们认识的吧？”

“不，我们……我们是在电影院偶然认识的。因为……”她的声音发颤了，眼睛里噙着泪水，她突然绝望地大声喊道：“您不相信我！……我的话您一句都不信！……”玛丽娜把头伏在桌子上，号啕大哭起来。

谢尔盖不知所措地说：

“玛丽娜……您有什么根据这么说？我是相信您的……”

可是姑娘泣不成声，绝望地一个劲儿摇起头来。

惊慌不安的加利娜·扎哈罗夫娜往门里望了一眼。于是谢尔盖歉疚地说：

“哎，您瞧，她哭了。我可没有欺负她。”他自己也心绪不佳，转身对

姑娘说：“玛丽娜，难道是我欺负您了吗？”

姑娘又摇了摇头，出人意料地腾地一下站起来，急忙向隔壁房间跑去。加利娜·扎哈罗夫娜自己也差点哭起来，赶紧跟着她跑了过去。

谢尔盖也站起身来。显然，今天已经跟姑娘谈不成了，并且跟两位主人也谈不成了。今天晚上算是弄糟了。

闷闷不乐的费奥多罗夫送谢尔盖到了门口。

“说实在话，我真不知道她为什么那样号啕大哭。”谢尔盖尴尬地说。

费奥多罗夫喟然长叹一声，说：

“看来，这个小鸟的生活也并不顺心如意。”

他们约定明天见面。

谢尔盖慢腾腾地走在大街上，心情不悦，看见谁都有气，首先是恼怒自己。他慢慢地走着，毫不理会直吹到脸上的凛冽的寒风，毫不理会周围人来人往，他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逐一思索着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

总之，他从玛丽娜那里一无所获。无论是她如何来到费奥多罗夫家，还是给她发电报的那个女人是何许人，抑或她在影院认识的那个塔玛拉是谁，他都不得而知。况且，她们是不是在影院认识的呢？他刚一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一连串其它问题便立刻接踵而至。这个姑娘的一切举止言谈都很奇怪而令人费解。

谢尔盖觉得乱透了。疲顿的大脑已经无力对这一天之内涌来的大量事实做出评定和加以对比。今天从惊人地发现受害者不是尼娜·戈尔利娜起，一天都令人担心，紧张。后来是对阿列克和谢苗诺夫的审讯，他们两人的对质，最后，费奥多罗夫来了，讲了他那可怕的经历。现在是这个毫无收获的晚上。

谢尔盖最后决定，到明天早晨之前，他将不再考虑玛丽娜，否则会发疯的。

他很晚才吃力地回到旅馆。显然，在这个几乎是陌生的城市里的大街上，他走的不是近路，他更多的是凭自己的直觉往前走，而不是靠稀少的行人指路，虽然他有时也向行人问路。

他刚一挺直身体躺进冷冰冰的被窝里，用被子蒙住头，就立刻睡着了。风在房间里游荡着。

第二天早晨，萨沙·罗巴诺夫一见到朋友谢尔盖，就急不可耐地问：

“哎，你昨天做客怎么样？”

“不怎么样。”

这时，同事们都来到了办公室，个个都想了解情况，个个都渴望听到什么新消息。

谢尔盖开始讲起来。但是随着他的讲述，听者的脸变得越来越忧虑不安。

快讲完时，谢尔盖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他脑子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个问题，连他本人也大感惊讶：

“顺便说一句，在玛丽娜·伊万诺娃的侦查材料上应该附上她的照片。照片在哪儿？”

这个问题是在他重新讲述前一天晚上在费奥多罗夫家所发生的情况时才刚刚出现的。

原来，照片是晚些时候才弄到的。

当谢尔盖拿到照片时，他大概第一次这样细心地，甚至挑剔地看着，他觉得，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

从照片上望着他的完全是一副陌生的面孔。

毋庸置疑：到费奥多罗夫家来的那个姑娘不是玛丽娜·伊万诺娃。

当谢尔盖说出自己的发现时，大家都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那么，您要知道……”罗巴诺夫不知是惊慌还是气愤地终于开口说道，“搞的什么鬼名堂？加利娜原来不是加利娜，伊万诺娃原来不是伊万诺娃，顺便说一句，”他瞟了谢尔盖一眼，“你的费奥多罗夫原来也不是费奥多罗夫。这实在太过分了……”

过了片刻，两名侦查员迅速下楼，向停在大门口等着他们的汽车奔去。

又过了大约十五分钟，罗巴诺夫的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刚才离去的两个侦查员中的一个报告说，费奥多罗夫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留下来看守。只要那个冒充的玛丽娜·伊万诺娃一露面，就立刻将她带回局里来。

这天早上，谢尔盖什么事都没有干成。需要重新审讯阿列克，处理谢苗诺夫，而主要的是——寻找，寻找新的途径、新的事实和它们之间新的联系，最后是应该重新跟阿列克谈一次，目的是迫使这个执拗的小伙子坦白交代，让他懂得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敌人。

但是谢尔盖无法集中思想考虑任何事情。罗巴诺夫也是这样，出现了某种神经上的松弛。就像不知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的蓄电池，用完了或者发条松了一样。

两人坐在罗巴诺夫的办公室里，怒火填膺，气愤不已，心力交瘁，无所适从。

“要是能发明一种自控机器就好了，”罗巴诺夫沮丧地说，“把所有这些鬼花招，把我们所有的材料往里头一放——你瞧，答案有了：谁是谁一目了然，像查阅指南手册一样简便。”

“你想要的可真多。”

“人人都想得到许多。归根结底，我们也有精密科学，犯罪侦查学。比方说，这可不是你的文学——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在疲顿和恼怒的时候，谢尔盖往往沉默寡言，善于自持。在这种情形下，罗巴诺夫却更加健谈。

“……那里只有兴趣和感觉，”他气乎乎地说，“而我们有确凿的事实。我曾看过一篇文章，说机器既能搞翻译，把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也能判读潦草的字迹，还能下象棋，甚至可以给病人做诊断。不久将要开始教孩子们来学习，根据每一个孩子的天分因人施教……”

“算了，别瞎扯了。”

“我这可不是瞎扯。怎么，你以为控制论在我们这里不适用吗？”

“人们正在试图应用控制论。现在只为问询提供服务。”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法规、法律、命令、法令多得不得了。”

“噢，这当然是需要的。这个我没有可争论的。”

“谢谢。”

“但是在同犯罪行为的斗争中，机器终归还是需要的。”

“目前人们用它来搞司法统计。”

“我们的侦查统计也需要。其目的是迅速查清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以何种手段，搞了何种犯罪活动。这可是大事。但主要的还是它得有助于揭露犯罪行为。你看，我们现在手中掌握了多少事实啊。只是应当把

这些事实分门别类地、合乎逻辑地编成程序。必须合乎逻辑！怎么，这事机器做不到吗？”

“做不到。”

“做得到！”

“喏，那就是它不愿意做。”

他们彼此看了一眼，突然笑了起来。

“我们说定了。”谢尔盖说着，又愁眉苦脸起来，补充道：“我现在需要的不是机器，而是这个姑娘。她将会比任何一台机器告诉我的都要多。”

派出去的侦查员大约两小时以后才回来，带来的是……费奥多罗夫。

费奥多罗夫非常惊恐，垂头丧气，以致他进来时没有立刻看见谢尔盖，而当他看见时，似乎却没有立刻认出他来。费奥多罗夫走到桌子跟前，把一张一路上紧攥在大手中揉皱的纸默默地放到了桌子上。

谢尔盖拿起那张纸，怀着某种新的不愉快即将落在自己头上的感觉读起来：“亲爱的加利娜·扎哈罗夫娜和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请原谅我吧，如果你们能够办到的话。我完全陷入了窘境。我死掉都比写信把这告诉你们好。可是我怕死，也怕活，而且还怕见人，连你们也怕见到。但是我仍然爱你们。所以我才写这张便条。我走了，永远走了。甚至……”便条到这里中断了。

谢尔盖咬了一下嘴唇，默默地把便条给了罗巴诺夫。

那么，假冒的玛丽娜·伊万诺娃走了，去向不明，她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承认。

然而，这时支配谢尔盖的主要感觉是怜悯，对这个奇怪的、惊惶失措的姑娘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怜悯。他仿佛觉得，一股狂风把不知被谁的手拔掉的一棵小草吹赶到无人知晓的远方了。

过了一会儿，谢尔盖才想到，姑娘的突然失踪绝非偶然。第六章 一个姓普罗霍罗夫的人

一时的不知所措过去以后，谢尔盖对费奥多罗夫说：

“那好，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让我们谈谈吧。也许您能帮助我们做点什么。应该寻找您的玛丽娜。”他故意叫姑娘的名字，为的是不再使老人焦急不安。

所有在座的人都明白了这个意思。他们还明白了一点，即现在应该使他们俩人单独留下来，因为费奥多罗夫只有对谢尔盖才肯开诚布公，而对其他任何人都不会的。

罗巴诺夫最后一个走出办公室时，怀着希望与惶恐望了谢尔盖一眼，仿佛对他说：“哎，老兄，加把劲，干出点样儿来，出了什么事，你可是亲眼看见了。”而且谢尔盖在朋友的目光中看出有警告的意味：“我们现在还没有审查你的费奥多罗夫，你可不要跟他过于坦言。他本人有许多问题都尚未搞清楚。”于是谢尔盖心领神会地朝他点头告别。

费奥多罗夫坐在桌旁，懦弱地把手放在膝头，愁眉苦脸地望着地板。

罗巴诺夫走出去关上门以后，谢尔盖从容不迫地点上烟吸了一口，说道：

“您先谈一谈，玛丽娜是怎样到您家来的？要详细地讲。你们早就认识吗？”

费奥多罗夫摇了摇头。

“我们根本不认识。”

“那她怎么会来找您呢？”

“事情是这样的。说来话长……”

费奥多罗夫唉声叹气地从稍稍撕开一点口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然后嚓的一下用力划着火柴，贪婪地深深吸了一口烟。

“是这么回事。战争结束以后，我偶然碰上一个人。我们曾在一起服过刑。他因为什么事坐过牢，我现在记不得了。就这样，十年后，我们相遇了。他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同时还提到我当年越狱逃跑的事。我害怕极了，心想，完了，这一下我算彻底毁了，得把坐牢的时间补上了。可是他却如此这般地对我说：‘我不打算出卖你，我自己也吃尽了苦头，我知道自由的价值。总而言之，你该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只是你也得给我帮个忙。就是说，你陷入了困境，我也遇到了麻烦。我不知道谁的境况更糟糕。’于是他告诉我说，他结过婚，妻子是母老虎，他离开了她。她和女儿留在了伏尔加格勒，而他去了莫斯科……”

一提到伏尔加格勒，谢尔盖不禁警惕起来。又是这个城市！这多半是偶然的巧合。可是在谢尔盖办理的这个案子中，一切都那样错综复杂，已经出现了那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以致谢尔盖每一秒钟都在等待着新的情况出现。

“……就这样。”费奥多罗夫不紧不慢地继续说。看来，他从自己从容不迫的叙述中渐渐平静下来：“就是说，他在莫斯科安顿下来，经常给女儿寄钱。但有一件事他害怕得要命：千万不能让妻子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说：‘就让她以为我住在这里，住在博尔斯克好了。我今后把写给她的信寄给你，你再把这信转寄给她，这样一来，信封上的邮戳就不会是莫斯科的了。我将把你的地址给她，你把她的信给我寄到莫斯科，注明“存局待取”。这事给你添麻烦了吧？’我当然满口应承下来。要知道，我原本不答应那件事，可是我怕他，怕极了。虽然他人不坏，这些年来一次也没有提过我的情况。而且我们根本没有再见过面。我只是把他们的信从一个信封里倒腾到另一个信封里。但他们彼此写些什么，我当然不得而知。”

“您按什么地址把他的信转寄给她呢？”谢尔盖问道，对他的叙述越来越感兴趣。

“我直接寄给她的姑妈弗拉索娃·阿格里皮娜·伊万诺夫娜。信封上附一笔‘转玛丽娜收’。就是说，她也叫玛丽娜。”

“她难道看不出来字体不一样吗？”谢尔盖又问道。“就是信上的字体和信封上的字体。”

“字体是一样的，”费奥多罗夫摇摇头，“他把写好地址的空信封也寄给我了。”

“这是秘密活动。”谢尔盖心想，忍不住又问：

“那么，她的姓氏以及地址，您都不知道喽？他的地址您也不知道吗？”

“看来是这样。当然，全都乱七八糟。可是这能怪我吗？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谢尔盖一时间对他的真诚突然产生了怀疑。费奥多罗夫果真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吗？这可是太蹊跷了。

“……那么后来，他们的女儿死了，”这时费奥多罗夫继续说，“通信越来越少了。我曾以为，他将会完全中断给她写信。可是他没有。他仍然给

她写信。不久以前，我收到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请求我收养一个女孩儿，说她遭到了极大的不幸，她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他说，让她在我家里住一个时期，而在他那里太招眼。他写信说，那姑娘人品好，又文静又端庄，他非常同情她。可见，他也是个古道热肠的人。所以，玛丽诺奇卡就来了……”

费奥多罗夫沉痛地叹了口气，低下头，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

“可是现在出了这种事。我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对我的加利娜·扎哈罗夫娜交代。这个女孩是那样招她疼爱……”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谢苗·特洛菲莫维奇，姓普罗霍罗夫。”

“那么，他的地址您知道吗？”为了以防万一，谢尔盖又问了一遍，“他在哪里工作？”

“我一无所知。去他的吧，”费奥多罗夫把手一挥，“只要把玛丽诺奇卡找到就行。”

“不，完全不是‘去他的吧’，”谢尔盖暗自思忖道，“必须紧急查明这个普罗霍罗夫。到那时我们大概才会去寻找玛丽娜。就是说，现在已经顾不上玛丽娜了，而鬼知道她是谁。”

谢尔盖总算使费奥多罗夫安静下来，答应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查询失踪的姑娘的下落，这才终于跟老头儿告了别。

这时有一个念头萦绕在他心头。这个念头是费奥多罗夫说出普罗霍罗夫的妻子的名字时产生的。真见鬼，昨天他怎么还没有产生这个念头呢？不过，情况发展得如此迅猛和出其不意，这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直到今天早晨以前，谢尔盖还坚信，玛丽娜·伊万诺娃住在费奥多罗夫家里。就是她！而这件事，他是昨天刚刚知道的。当时就产生了那个念头。可是现在，谢尔盖对自己的推测几乎深信不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情况就会发生新的、更加危险的转变。

因此，费奥多罗夫走出去以后，门还没有来得及关上，谢尔盖就给值班员拨了电话，请他通过专线紧急预定莫斯科的电话，然后给罗巴诺夫打了电话。

罗巴诺夫走进办公室时，发现谢尔盖正在聚精会神地仔细看摊在桌子上的不知什么照片。罗巴诺夫已经打老远看出了这些照片，不知为什么自己也激动起来。

“哎，有什么新情况吗？”他走到桌子跟前，急不可耐地问。

“你自己看吧。”谢尔盖低声回答说，眼睛始终看着那些照片。

是啊，毋庸置疑。谢尔盖的推测得到了印证。正在被寻找的伏尔加格勒的玛丽娜·伊万诺娃的照片与在旅馆里被杀害的那个女人的照片完全吻合。两张照片上的人正是同一副面孔。在这一张照片上——脸孔生气勃勃，娇好开朗，有点羞羞答答，神色若有所思，欲笑还藏。另一张照片上——脸孔模糊不清，向后仰着，因疼痛而变得难看了。

这个女人的证件……在那个女孩手里，即目前还不知道的普罗霍罗夫打发来找费奥多罗夫的那个女孩。

谢尔盖急切地把费奥多罗夫所谈的情况转告了罗巴诺夫。

“可是伊万诺娃的身份证是怎么落到这个姑娘手中的呢？”罗巴诺夫问，“是通过普罗霍罗夫吗？那么他又是怎样搞到这些身份证的呢？”

“她是他的妻子，就这么回事，”谢尔盖确信不疑地说，“他把妻子杀害了。是前妻。”

“可能是这样。”罗巴诺夫表示赞同。

“于是他把别人的身份证偷偷地给她放下了，这个卑鄙的家伙。”

“我有个主意！”罗巴诺夫突然喊道，“一个好主意！”

“说说看，说说看……”

“你给我什么？发荣誉证书吗？”

“去你的吧！我将发给你特定的退休金。你快说呀。”

“哎呀，这么心急呀？你知道你将要失去的是什么人吗？”罗巴诺夫已经换了另一种语调，扬扬得意地说，“你听我说，趁我现在还在这里。那个姑娘的身份证是伊万诺娃的，而伊万诺娃的身份证是尼娜·戈尔利娜的。明白吗？”

谢尔盖惊诧地看了朋友一眼：

“好像是……”

“就是！”

“这需要进行查验。戈尔利娜的调查材料在哪儿？那里应该有她的照片。”

“我马上请人送来，”罗巴诺夫一边说，一边拿起电话，“不过这张照片我有点记不清了。”

他向扎特金做了简短指示，刚一挂上话筒，电话就又响了起来。值班员向谢尔盖报告说：

“中校同志，请接莫斯科专线电话。”

“我就来。”

谢尔盖从桌子后边站了起来。

“你要莫斯科专线干什么？”罗巴诺夫问。

“让他们紧急查清普罗霍罗夫。”

“而且要把他拘捕起来。”

“这就请他们酌情处理了。也许一开始要把他监视起来。”

“可千万别把他放跑了。看来他很狡猾。”

“难道他们是小孩子吗？查办这件事的可是莫斯科刑事侦查局。”

于是两个人想到他们的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可能会把什么人放过，便不由得笑了笑。

谢尔盖没有很快回来。这时，扎特金正巧来到罗巴诺夫的办公室。他们两人弯着身子，正伏在桌上细看照片。罗巴诺夫看见谢尔盖走进来，问道：

“你怎么待了这么长时间？”

“我顺便给伏尔加格勒打了个电话，让他们紧急把有关伊万诺娃、她的前夫及她的姑妈的情况搜集起来。第一批材料我们晚上才能收到。莫斯科那边的情况也是晚上报过来。格朗宁问你好，还有伏尔加格勒的普罗霍罗夫也向你问好。”

“好啊。机器运转起来了。”罗巴诺夫满意地搓了搓手。

“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一下您的一个熟人。”扎特金笑起来。

“对，是一个，”罗巴诺夫强调地加以证实，“你也可以欣赏欣赏。”说完，他把摊在桌子上的照片推到谢尔盖面前。“调查材料上没有附照片。照片是第二天弄来的。不过，我的天才的发现，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得到了

证实。”

谢尔盖看了看那些照片。

“看来……”

“看来，”罗巴诺夫打断了他的话，“在费奥多罗夫家住过的那个姑娘和从莫斯科溜掉的那个出纳员是同一个人。而且她的身份证和伊万诺娃的身份证被调换了。”

谢尔盖点点头，沉思地补充说：

“而且这一切都是普罗霍罗夫所为……”

“你这样肯定吗？”罗巴诺夫突然怪腔怪调地问。“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件轰动一时的案子。杀人凶手受到了审判。可是在法庭上，他试图逃避罪责，并且使用了这种方法。他声称，凶手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于是他臆造出一个瓦季克，他好像是偶然和瓦季克认识的。法庭上问他：‘被害者的物品是怎么到了您手里的？’他回答说：‘瓦季克给我的。’‘那么凶器呢？’‘也是瓦季克给我的。’‘为什么在受害者房子里发现的是您，而不是瓦季克呢？’‘他派我先去侦察一下情况。’‘为什么在凶杀现场留下的只有您一个人的脚印？’‘瓦季克让我跟他把鞋换了。’他回答说。”

“真幼稚。”谢尔盖冷淡地笑了笑。

“当然，”罗巴诺夫把手一摆，“可是我为什么想起了这件事呢？那个身份不明的普罗霍罗夫……是不是瓦季克呢？”

“什么意思？……啊，你是这样以为……”

谢尔盖用凝注的目光看了朋友一眼。

“是的，我这样以为，”罗巴诺夫点了点头，“你刚才说这很‘幼稚’。那么费奥多罗夫告诉你的那些话就不幼稚吗？”

“或者说非常狡猾。”

沃洛佳·扎特金用惊惶不安的目光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瞧瞧那个，不敢贸然加入谈话。看得出来，他有许多问题，难以

自制。案子骤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和错综复杂了。

“说得对，‘或者是非常狡猾’，”罗巴诺夫同意道，“普罗霍罗夫可能会这样耍滑头，假如他存在的话。不过他也可能会……你要注意。让我们暂且把普罗霍罗夫排除掉，换上费奥多罗夫。戈尔利娜盗窃了一笔巨款，来到费奥多罗夫这里。后者亲自把他完全可能认识的伊万诺娃的身份证提供给她。归根结底，她可能还是他的前妻。我们对他尚且一无所知。而整个示意图变得简单得多了，简而言之，是变得可靠得多了。”

“你的类推法有一个缺陷，”谢尔盖想了想，提出异议，“一方面是虚构的瓦季克，另一方面是普罗霍罗夫。他坐过牢。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档案馆里得到他的卷宗。轻而易举地就能了解到他是不是伊万诺娃的丈夫。总而言之，可以了解到她的丈夫是谁。只要向伏尔加格勒查问一下就行。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我已经做了。不，普罗霍罗夫确有其人。”

“那么他与这个案子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看看再说，有一点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必须找到普罗霍罗夫。”

“但也不能把费奥多罗夫从眼皮子底下放跑。”

于是，这个案子里又出现了一个人——普罗霍罗夫。一个个零散的扣环开始连结在一起了。但是有两条主要的线索仍然没有交叉起来。这两条线索假设可以这样标出来：“普罗霍罗夫—费奥

多罗夫是一条线索——伊万诺娃的被害和戈尔利娜的盗窃；谢苗诺夫—阿列克是一条线索——在列车上借助于安眠药进行诈骗和抢劫以及来自中亚的那只神秘的手提箱。”这两条线索目前不是被这些人联系在了一起，而仅仅是由于一个情形联系在了一起：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采用的都是同一种手段——投放安眠药。

根据第一条“线索”，当前需要请莫斯科参加办理这件案子，因为普罗霍罗夫完全有可能在那里。来自伏尔加格勒的有关伊万诺娃及其前夫的情况对莫斯科刑侦局也将会有帮助。

“那么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谢尔盖下结论说，“一条线索从这里伸向普罗霍罗夫。费奥多罗夫……”

“说得对！”扎特金霎时间附和道，“您怎么认为呢，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

不错，一条线索从费奥多罗夫伸向那个身份不明的普罗霍罗夫。

“当然，这是个好主意，”罗巴诺夫回答说，“要是费奥多罗夫能同意就好了……只是我有点怀疑。我认为，他不会同意。他会找出理由的。”

“那就更应该试试了！”扎特金激动地大声喊道。

“不过这事只有你才能向他提出来，”罗巴诺夫转向谢尔盖说，“你们建立起了这样的信任关系。”

“是啊，应当试试，”谢尔盖同意道，“只是不能再把他强拉到我们这里来了。我到他那里去一趟吧，”他看了看表，“时间够了。午饭后该提审阿列克了。我现在到费奥多罗夫那里去，你跟莫斯科联系一下，把有关普罗霍罗夫的情况转告他们。”

他们就此说定了。

谢尔盖甚至对出乎意料的外出感到高兴。从早晨起，有过多少发现和激动啊，找到了多少新的事实和名字啊，应该独自把这一切再平静地缜密思考一遍，在另外一种环境中思考，而不是在这样忙乱无序、令人精神紧张的环境中。他就要从容不迫地走在大街上了……谢尔盖下意识地朝窗外看了看。

白茫茫的鹅毛大雪飘飘洒洒，漫天飞舞，以致连院子里的建筑物、车库里的汽车和人都看不清楚。从那里传来的只是被烧热的发动机的沉闷的轰隆声和不知谁的叫喊声。在这无尽无休的落雪中，好像有一种镇静剂，好像下面那股移动的雪流使他摆脱了周围的忙乱和急欲要办的各种事务，把它们推到远处什么地方，推到白雪覆盖的另一面。

当谢尔盖来到街上时，这种摆脱一切的感觉更加强烈地住了他。在这个雪的王国内仿佛只有他一个人。甚至在什么地方缓慢而盲目地行驶的汽车喇叭声在他听来都是沉闷的，仿佛是透过墙壁传过来的。为了不撞在迎面走来的行人身上，不撞在房子或者树上，他真想向前伸出手来走路。“见鬼，”谢尔盖心想，“千万可别走迷了路。”

不过当谢尔盖的眼睛慢慢习惯了以后，他开始渐渐分辨出汽车模糊不清的轮廓，分辨出周围的人们和他路过的一幢幢房屋。

雪仍然不停地下着，从容不迫，漠不关心，甚至把人的思想也弄得这样悠然散淡。很想考虑一下遥远、平静的什么事。于是，仿佛已经退到什么地方的今天的一切突然变得那样遥远和平静，变得比一个小时之前更加简单明了。

那么，令人不解的是，实际上发现了什么呢？这个普罗霍罗夫——正是

普罗霍罗夫，而根本不是费奥多罗夫——把两个女人的身份证弄到了手，并且掉了包，以便把踪迹搞乱的人。戈尔利娜本应躲藏起来，为此需要他人的身份证。于是普罗霍罗夫便把自己前妻的身份证偷去了，并决定将她杀害。为了什么？他不再给她寄钱了，女儿死了。联系原本可以就此中断，但却没有中断。仍然有书信往来。费奥多罗夫对此也感到奇怪。为什么普罗霍罗夫突然要甩掉这个女人呢？也许她有什么事讹诈了他或者可能要讹诈他？谢尔盖想起了照片上那双忧郁的、几乎惊讶的眼睛，嘴角上暗含的微笑……要么她知道他的什么事，可能会报告？所以他把她叫来，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打住！要知道，信上、电报上和旅馆住宿登记卡上的笔迹均系同一个人所为。可见……可见，他先给她发了一封电报，通知说他要到她那里。后来他改变了主意，给她写了一封信，叫她来这里，他去车站接了她，把她带到旅馆里……把她带到旅馆里来的是他，普罗霍罗夫，而不是谢苗诺夫。看来，后者与旅馆里的谋杀没有关系，尽管值班经理认出了他。这有什么，他们可能经常在一起搞些勾当。干这种事谢苗诺夫是有能耐的。可是杀人……不，杀害伊万诺娃的是普罗霍罗夫。而且他把戈尔利娜的身份证悄悄塞给了已被杀害的她，决意要彻底摆脱掉这最后一个女人，好使自己不被揭露出来。真是狡猾多端，没说的。他甚至耍滑头，把费奥多罗夫也欺骗了。看来，这个普罗霍罗夫是个有经验的、狡诈的犯罪分子。假如他在战前就曾因什么事服过刑的话，这一点就清楚了。对，这件事当然应该向莫斯科查询一下。到时候肯定会有关于他的新事实，珍贵的事实。那么战后，普罗霍罗夫可能犯有新的罪行。并且他的妻子可能知道某些罪行。这一切或多或少都是明确的。那么，这里与谢苗诺夫，与阿列克又有什么联系呢？有没有联系呢？……

谢尔盖在街上边走边思索，竟然没有发觉这时雪渐渐地小了，没有发觉起风了，周围的行人和汽车已经多起来。汽车煞有介事地嗡嗡地响着，从他身边疾驶而过，仿佛要弥补失去的时间。谢尔盖机械地在十字路口停下来，然后继续向前走去。

他走的这条路离市场不远，于是他极力克制住自己不朝那边张望，不看谢苗诺夫：他正在自己的货亭里卖货。但时间不多了，所以谢尔盖迈步继续走去。

一个瘦高挑儿的小家伙陡然出现在他面前，细细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打卷的灰围巾，来回地晃动着。谢尔盖看见一张苍白的孩子似的脸孔，裂着口子的肿胀的嘴唇，惊惶不安的、非常熟悉的黑眼睛。

“太棒了！……”小家伙呼哧带喘地说，“我正要跑去找您呢……那个坏蛋就在这儿，在市场上，马上就要……”

谢尔盖已经认出了他，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于是他立刻回到了充满急于要办的和令人担忧的事的业已习惯的世界里。已经展开的事件的迅猛发展重又支配了他。谢尔盖这时才发现雪停了，只有零零星星的雪片像一只只白色的苍蝇被风刮得在空中乱舞。

“你是说先卡吗？”谢尔盖很快地问。

“嗯。他在那里，”小家伙朝市场那边一挥手，“在卖东西……”

“我们走。”

他们疾步转过拐角，来到大街的另一侧，然后再一个转弯，重又看见一群人围在大门口，门口上方悬挂着一个长长的招牌：集体农庄市场。

谢尔盖打量着四周，希望看见随便哪个在市场上值勤的警察，即使是岗

警也好。他根据经验知道，只身一人在市场上逮捕犯罪分子是危险的，是非常困难的。后者往往在市场上有铁哥儿们和酒肉朋友……

这时他们已经从市场入口处的人群旁边走过去，穿行在长长的一排排围着顾客的货摊之间。四周人声喧嚷不息，纷乱嘈杂。有个女人吵起架来，不知是谁在气愤地讨价还价，售货员大声地叫卖着什么。人们在一排排货摊之间狭窄的通道上拥来挤去。脚底下肮脏潮湿的雪吧唧吧唧地作响。

谢尔盖知道，市场上应该有民警室，一定得找到它。但这时瓦利卡——谢尔盖终于想起了他的名字——急匆匆地小声说：

“他马上就要离开了，已经准备好了。”并迟疑不决地加了一句：“您一个人对付不了他。”

“我们看看再说……”谢尔盖不置可否地回答道。

寻找民警室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

货摊都收摊了。一个不大的场子开始营业了，四周是一个紧挨一个的货亭。人们挤得满满登登，喧闹嘈杂的人声在人群上空飘荡。

旁边有一家挂着招牌的茶庄，门口站着一群青年人。瓦利卡用眼睛指了指茶庄，小声说：

“瞧，他在那儿……身体多结实，脸红扑扑的。穿着棉袄……”

在那群青年人当中，果然有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小伙子，生有粉刺的脸红扑扑的，微微凸鼓的眼睛放肆无礼。他穿着破旧的棉袄，戴着帽舌极短的便帽，流里流气地把便帽从汗淋淋的前额推到后脑勺。小伙子不时地发出清朗的笑声，眼睛闪闪放光，兴致勃勃地对铁哥儿们讲着什么，显然在卖弄自己。那些人听得津津有味，满怀敬意，有的甚至谄媚奉迎。

谢尔盖没有转头地悄声对瓦利卡说：

“你走开，别让他们看见我们在一起。我们现在想想办法。”

他站了一分钟，苦苦思索着，然后毅然决然地从人群中挤过去，朝茶庄走去。

谢尔盖毫不客气地推开那些年轻人，径直地走到先卡跟前。后者打住话头，警觉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听着，”谢尔盖正言厉色地对他说，“你昨天把国际旅行社的车弄到哪儿去了？快说。”

“什么？”先卡惊愕地盯着他。

“我问你，你把汽车藏到哪里去了？”谢尔盖更加严厉地重复了一遍，“快说。”

“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先卡仍然惊诧得无法恢复平静。

周围的人七嘴八舌、冷嘲热讽地嚷嚷起来：

“他连方向盘和簧片都分不清……”

“他有生以来从没开过汽车……”

“你在这儿吹毛求疵找什么碴儿？汽车是我偷走的……”

谢尔盖不耐烦地把手一挥，说：

“别忙，小伙子们。别忙。应该把事情搞清楚。这件事弄得全市沸沸扬扬，弟兄们，总之，这是国际性丑闻。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位百万富翁携夫人路过我们市，下榻在旅馆里。早晨出来一看——黑色福特牌轿车不见了。他嘴里叼着雪茄，一急之下，雪茄竟从嘴里掉出来了。他的夫人——

嗨，像个大妈，”他大大地把两手一摊，“扑通一声！夫人晕过去了。而他自己……”

小伙子们挤作一堆团团围住谢尔盖，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先卡比谁都开心，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己是这件趣事中的风云人物，同时他明白，这与他显然毫无关系，他没有任何危险。

这时，谢尔盖围绕着子虚乌有的百万富翁引起的慌乱，竭力渲染，大做文章。最后，他对先卡说：

“……为了你好，我们到警察局走一趟，你哪怕证实一下汽车不是你偷走的也好。我是新来的人，他们把特征告诉了我，所以我就出来寻找。你同时要当心那条鲨鱼。可以说，要当心那个真正的资本家。”

先卡激动异常，两眼放光。他同意地回答说：

“这有什么，去就去。在这件事上，我像玻璃一样清清白白。”并心怀叵测地向他那帮铁哥们儿丢了个眼色：“我们倒要看看那个百万富翁是个什么玩意儿，他身上有什么东西。”

小伙子们又快活地噉噉喳喳说起来。

他们一伙人朝市场出口走去。

瓦利卡藏在人群当中，跟在他们后面走着，一心想要知道先卡是怎样被说服去警察局的。在街上，他还是落在后面了，害怕被先卡看见。

谢尔盖和先卡走在前头，热烈地讨论着凭空杜撰的事。先卡对细节很感兴趣，于是谢尔盖绘声绘色地大加描述。杜撰对于他来说是得心应手的事，他对此怀有浓厚的兴致，他从自己丰富的实践中汲取材料，非常兴奋地回忆起他所读过的有关百万富翁的一切日常生活方面的情况，并添加上恐怕任何一个百万富翁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某些细节，但这却引起了听者的强烈反响。

重要的是，不能使先卡失去兴趣，不能使他如此轻浮地晕头晕脑和对意外情形的感觉消失，要使他无暇考虑自己造访的警察局的其它方面，对于他来说，像警察局这样的机构是极其危险和可憎的。先卡的这帮狐朋狗友对这件意外事所表现出来的激动和兴趣并不比他逊色。他们紧随其后，这对先卡保持晕头晕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他们来到局门口时，谢尔盖正讲到最精彩处：栩栩如生地描述一对百万富翁夫妇在出国途中的日常生活。他把这一切讲得如此惟妙惟肖，不厌其详，以致他那些没有经验的听众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他整个这段时间都和这些“资本主义的大鲨鱼”生活在一起。

在局门口值勤的年轻岗警惊诧不已地、几乎张惶失措地望着走到跟前的一伙人。小伙子们聚成一堆，站在谢尔盖身边，放肆地大声狂笑。谢尔盖怎么都没办法对不认识他的岗警打手势，说明这一切本来是打算好的，他现在必须迅速地把先卡带到办公楼里去，不要把时间耽搁在开出入证的通常手续上面。

这时，谢尔盖觉得，站在像警察局这样的机构的门口产生的恐慌感开始困扰他的听众，先卡随时可能醒悟过来和进行反抗。

假如不是扎特金突然从楼里跑出来，真不知道这一切会怎么收场。扎特金一副高兴的样子，甚至彬彬有礼，看上去决不是危险人物。他好像不知不觉地插在谢尔盖所站的那伙人正中间，大概感觉到了周围的人的情绪，于是

若无其事地大声喊道：

“你们来了？总算来了。”

谢尔盖警告地看了看他的眼睛，说道：

“你看，沃洛佳，应该把误会弄清楚。那辆汽车不是他偷的。”

“我们马上会查清的，”扎特金把手一挥，没有流露出丝毫惊讶的神色，“走吧。”

先卡傲慢地冷冷一笑，向他的铁哥儿们使了个眼色，有点大摇大摆，不急不忙地跟在扎特金后面向办公楼走去。那伙散去的年轻人用胆大无忌的高声喊叫同扎特金告别。谢尔盖对留下来的人说了一句：“你们，小伙子们，都走吧。以后先卡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们的。”说罢，他跟在先卡后面走了。

当刑侦局的大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上时，他才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

来到办公室，谢尔盖让先卡在桌子跟前坐下，他自己坐到对面，点上烟吸了一口，说：

“好了。现在可以谈谈了。你的确与偷汽车的事无关，不过既然我们碰在了一起，有件事我倒想向你打听一下。”

先卡戒备地严肃起来，紧皱眉头，阴郁地看了谢尔盖一眼。

“什么事？你想把什么事硬往我头上扣？”

“你的事本来就扣在了你头上，别人的事情已经没有地方可扣了，谢尼亚。”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先卡粗鲁地问。他的眼睛凶狠地眯起来。

谢尔盖似乎没有察觉到他身上发生的变化，依然用温和的语调说：

“你要正确理解我的话才行，谢尼亚。我们现在并不打算把你抓起来。你不是被捕者，不是小偷。对吗？”

“那是，那是。所以……”

“所以请你接着往下听。你是扒手，人赃俱在，可以把你当场抓获。如果我提醒你注意你不久以前的偷窃，那么这对于你有意义吗？”

“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提醒的。我知道的不比你少，”先卡怀有敌意地回答说，“为什么硬把我拉到这里来？”

“就为这个。假设你在扒窃。比如，或者另外一个人在扒窃。你需要什么？你需要钱，需要贵重物品，是这样吗？”

“哎，要是打比方，那就算是这样吧。”

先卡显然对话题的转变发生了兴趣。

“比如说，你需要身份证？”

“我自己的身份证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呢。”先卡冷笑了一下。

“自己的——假定是这样，那么别人的呢？比如，最近几次，你只偷身份证，这是为什么？你把它们交给了谁，谢尼亚，啊？”

“我谁也没给。”

“算了，别说假话。你给了。也许你告诉了谁？也许你会把他在市场上的售货亭指出来？”

先卡的眼睛里闪过惊恐的神色。

“我什么都不知道。”他顽固地答道。

“你知道。就是说，你害怕了，对吗？那个人当然说话尖刻。”

先卡鄙视地冷笑了一下，但没有作声。

“他并不是害怕谢苗诺夫，”谢尔盖心想，“还有一个证明可以说明那个人不会去杀人。干这种事需要性格刚强。而且先卡感觉到了这一点。”

这时，先卡心里思索着什么，眼神发生了变化。他那生有粉刺的圆脸上起初流露出疑惑，继而是忧虑，最后是恐惧。眼睛游移不定地滴溜溜乱转，而先卡本人却在椅子上不安地乱动起来。

谢尔盖立刻察觉到这一变化，但要把这一变化解释清楚，他暂时还无能为力。只好等待。而且也没有必要打搅先卡的烦躁不安。

为了填补这段停顿，谢尔盖不急不忙地点上烟吸起来。

看来，先卡终于做出了什么决定。这一点根据他的眼睛不再乱转便可看得出来。他的一只手不知为什么下意识地插进了口袋里。

里。

“我就碰上过一回，”先卡含糊不清地嘟哝说，“那有什么？”

“可不止一回。”

“我算算有多少？”

“算倒不必算，你记得。你偷身份证得了多少钱？”

“五十卢布，就这么多。”

“啊哈！真大方。为什么要这样，谢尼亚，你考虑过吗？”

“我有什么可考虑的？让拖拉机去考虑吧，它是铁做的。有人给我，我就拿着呗。”

“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工作，对于拖拉机来讲都一样，而人待在家里似乎更舒服些。应该为此动脑筋想一想，以免犯错误。”

“拖拉机只吃汽油就够了，而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

先卡好像很喜欢做文字游戏。

“不错，”谢尔盖带着冷笑说道，“你似乎开始把拖拉机和人区别开了。我们现在说了几句玩笑话，将来还会说的。你，谢尼亚，想住在这座城市里吗？”

“我母亲住在这里……”

“还是的。所以必须把别人的口袋忘掉。要不然，我们早晚会把你抓起来的。你要尽快地、趁早洗手别干了，因为你已经被我们盯上了。”

“我已经不瞄人家的口袋了，去它们的吧。”

“你干别的了吧？”

先卡皱着眉头迅速瞥了一眼，流露出警觉的目光，含糊地冷笑了一下，说：

“一只熊冬天闲待着没事干，它就嘲自己的爪子。”

“你干什么了？”

“不得不干的事呗。需要生活。”

“怎样生活，人各有不同。有些人遵纪守法，问心无愧。有些人则相反——提心吊胆，但是到时候却有利可图。”

“这是什么意思，能举个例子吗？”

“譬如，从傻瓜的腰包里把钱弄到手。你自己大概不吸，很爱惜自己的身体。”

先卡又皱了皱眉头，瞥了谢尔盖一眼，眼睛里闪现出恐惧的神色。

“我……我吸……你看……”他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揉碎的烟卷。

谢尔盖微微一笑说：

“算了，谢尼亚，别装蒜了。你大概还能从另一只口袋里拿出东西来吧？拿出来吧，别不好意思。这里都是自己人，大家都明白。”

“你硬把我拉到这里来干什么，首长？”先卡恶狠狠地压低声音说，“你为什么在路上愚弄我？”

谢尔盖冷淡而严厉地回答说：

“我拉你来，是为了你好。要不然你会乖乖地听我的吗？”他出其不意地用手掌啪地拍了一下桌子，“统统都摆出来吧！嗯？所有的大麻膏。我们现在要做记录。算你自愿交出来的。”

先卡茫然失措地看了谢尔盖一眼，惊讶得甚至嘴巴都微微张开了。

“什么……？”

“我说，摆到桌子上！”谢尔盖威严地又说了一遍，“赶快，赶快。那只口袋。”

先卡难看地冷笑了一下，把空口袋翻了过来。

“看吧，首长。找你要的东西吧。”

“是这样。可见你全都卖掉了，对吧？”谢尔盖对口袋里没有大麻膏丝毫不感到惊讶。

“我什么都不知道。”先卡嘲弄地耸了耸宽阔的肩膀。

“你还是没有理解我的话，谢尼亚，”谢尔盖责备地摇摇头，“我们马上对你的口袋进行检查，我们会找到大麻膏的痕迹，一定会找到的……”

“好像真了不起似的，找到痕迹……”

“对，对。而且我们要考虑大麻膏的来源。大麻膏——这种事情是严重的，危险的。我们决不会把你放走，直到我们查清你是从哪里搞到的大麻膏。而且我要坦率地告诉你：你不该跟他在一起鬼混。跟他搅在一起不会有好处。我郑重向你提议：把东西全部交出来，现在还来得及。你要自觉自愿地交出来。你打算为了谁去肝脑涂地呢？为了谁而拿自己的自由作代价呢？”

先卡紧皱眉头，沉默不语，但他那长满粉刺的四方大脸上流露出正在自我斗争的痛苦表情。过了一会儿，他疑心重重地问：

“你说，你能放我？说得好听，首长。我知道你们的圈套。”

谢尔盖耸耸肩膀说：

“既然知道，那你就好好想想吧。你要自愿地把大麻膏交出来。这个我们会做记录的。既然你主动交出来了，怎么会逮捕你呢？”

“那么身份证呢？”

“这个不做记录。扒窃一般不做登记，这你自己知道。”

“这倒是真的……”

先卡在椅子上不安地乱动起来，又蹙起眉头审视地看了看谢尔盖。他最后唉声叹气地说：

“唉，这样的首长不是经常能碰到的。应当好好配合才是。”

“你愿意给予帮助，是吗？”谢尔盖领会地淡淡一笑，“那好，劳驾你了。大麻膏在哪儿？”

“在一个地方。”

“你现在和我们的人一起去一趟，自觉自愿地把它交出来。是这样吗？”

“是的。有什么办法呢？”先卡叹了口气。

“那么你先说一说，是谁向你提供大麻膏拿去卖的？”

“达尼雷奇提供给我的……”

“所以你就把身份证卖给了他？”

“还能是谁呢？我是卖给他了。”

“现在这样吧，谢尼亚。我把你放了，这是我们说定的。但有一个条件：三天之内你不许出门。今天是星期六吧？那么下星期二之前你不许走出家门。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只好如此，”先卡沮丧地答道，“待在母亲家里比待在你们这里好。”

“我也是这么认为。为了不使你违约，不让你事先为达尼雷奇通风报信，我们要看看再说。”

“我需要他……”

谢尔盖笑了笑说：

“哎呀，谢尼亚，你还会成为有用的人的，好好努力才行。”

“我试过了，”先卡抱着突然出现的幻想说道，叹了口气，“没用。诈骗、偷盗，时而酗酒，时而扒窃。我简直累得要命。”

“我能理解，”谢尔盖同意道，“据说，教育小孩很难。而对成年人进行再教育更难。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做这件事。你能想象吗？这当然也是公益事业。”

“啊，公益事业。”先卡嘲讽地把手一摆。

“你别说。如果碰上正直的人们，会见成效的。”谢尔盖换了另一种口吻下结论说：“好了，不谈哲学了，我们言归正传。首先我们要把你的口供记录下来。证人的，”他着重强调了最后一个词，“关于达尼雷奇的口供。”

先卡和侦查员们一起离开了，这时谢尔盖看了看表。哎呀！半天过去了。但是还得同费奥多罗夫见面。然后再找阿列克谈。谢尔盖想亲自审问这个小伙子，一定要亲自审问。有关谢苗诺夫的新材料在这里会顶上大用的。

他给罗巴诺夫打了电话，简明扼要地通报了跟先卡的谈话内容。

“可见你已经追查出来了，”萨沙满意地肯定道，“你真行，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我马上给你派车。”

谢尔盖这次没有反对派车。必须抓紧赶到费奥多罗夫那里。

他一路上思索着将要对费奥多罗夫说些什么。应该让他像平时那样给普罗霍罗夫写一封信，留局待取。而在莫斯科，对这封信要严加监视，普罗霍罗夫一露面……难道费奥多罗夫会拒绝写这封信吗？萨沙坚信，他会拒绝的。他说，费奥多罗夫会找出借口的。到那时就……不，不可能。普罗霍罗夫是存在的。现在主要的人物就是普罗霍罗夫。旅馆里的谋杀，戈尔利娜的失踪——这一切统统都与他有关。而谢苗诺夫和阿列克干的是偷身份证、在列车上进行诈骗、抢劫、倒卖大麻膏。他们和普罗霍罗夫有什么联系呢？目前只知道使用安眠药。尽管……别忙，别忙！……还有穿灰鼠皮大衣的那个姑娘！她认识谢苗诺夫，认识阿列克，并且还认识……戈尔利娜！唉，要是能找到她，找到这个塔玛拉就好了。可是通过谁去找她呢？戈尔利娜失踪了，找谢苗诺夫谈话是以后的事，目前就只有阿列克了……

这时，汽车愉快地轰鸣着，开到了阳光普照的、由于雪而闪闪发光的大街上，仿佛为和人们在一起，为灿烂的阳光，为万里无云的蓝天，为在街上吹拂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春风而兴高采烈。

周围人们的心情完全是另一样。这一点从他们矫健有力的步态上，从笑容上，从坐在身边的司机吹起了不知什么快活的曲调上，便可看得出来。于是谢尔盖不知为什么突然想道：“那有什么？一切正常。一个星期过去了，

距离目标已经过了一半路程。是啊，看来毕竟过了一半路程。”于是他不禁由于自己振奋人心的想法而笑了起来。

费奥多罗夫正巧在家。当谢尔盖向他说明来意，请他给普罗霍罗夫写信时，老头儿拖延了一阵，说道：

“写信干什么？谢苗·特洛菲莫维奇本人已经来了。我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了，他答应要到你们那里去的。他十分为玛丽娜感到不安。他说，闹误会了。我把您的电话也留给他了。”

谢尔盖又惊诧又焦急，看了费奥多罗夫一眼。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转变。

费奥多罗夫注意到他的眼神，淡淡一笑，说：

“您不必惊慌，他人不坏。他会来的。”

“他还到您这里来吗？”谢尔盖问道。

“谁知道他呢。他答应要来的。”

“他住在哪儿？”

“说实在的，我没有问。”费奥多罗夫回答说。

情况复杂化了。普罗霍罗夫什么都知道了。这样他还会来找谢尔盖，真是异想天开！当然也不会到费奥多罗夫这里来了。这是明摆着的。主要的是……到底有没有普罗霍罗夫这个人呢？

“玛丽娜的女友没有来过吗？”谢尔盖以防万一地问。

“您是问塔玛拉吗？没有，她没来过。就是那位记者，他也不打电话了。”费奥多罗夫凄楚地笑了一下，“小伙子看上去不错，他对我们可爱的玛丽娜喜欢得不得了。”

谢尔盖听到“可爱的”这个如此温情的字眼，骤然觉得这个称呼对于失踪的尼娜·戈尔利娜最确切不过。亲爱的……他想起昨天晚上跟她的谈话，她的惊惶不安，无依无靠，饱含隐藏着的苦衷的目光，她的眼泪。于是他突然坚定不移地想道：“偷窃她是不会干的，不会干的。这里好像有点不大对头……”

谢尔盖仓促地同费奥多罗夫道了别，并向他保证，玛丽娜一定能找到，关于他的事，他牢记在心上，一定像所承诺的那样，一办到底。他请求向加利娜·扎哈罗夫娜转致问候。

一个新的想法在他脑海里萦绕，使他不得安宁：“她不可能干这种事，不可能……”

回到局里以后，谢尔盖立刻到值班员那里挂了莫斯科的专线电话，直接与莫斯科刑侦局副局长格朗宁中校通话。

罗巴诺夫也来了。

这一次，电话几乎一瞬间就接通了。

“科斯加！”谢尔盖对着话筒喊道，“再次向你问好。”

“你好，你好，”格朗宁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你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早晨大家都在纷纷议论。”

“我给你打电话还是为戈尔利娜的事。你知道吗，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说，盗窃巨款她是不可能干的。”

“是啊，是啊。大家一致说，她是个好姑娘。我们对她所有的关系都进行了审查，还不错！她的女朋友一个比一个好。”

“请你们寻找普罗霍罗夫。他今天在我们这里露面了，可是……”

谢尔盖察觉到罗巴诺夫惊诧的眼神。气喘吁吁的扎特金突然闯进电话室，用呼哧带喘的低声通知谢尔盖说：

“请您接电话，在办公室。”

谢尔盖用手掌轻轻捂住话筒，生气地回答说：

“我在跟莫斯科通话。让电话过一会儿打来。”

“是一个姑娘，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扎特金提出异议，“我担心她万一不再打来。”

“姑娘？……”谢尔盖警觉起来，“好样儿的。我马上去……”于是他对着话筒喊道：“科斯加！现在萨沙跟你说话……”

他把话筒交给了罗巴诺夫。

“真的是玛丽娜吗？……也就是尼娜？不会再是别的什么人了。”谢尔盖一边想，一边跟着扎特金在走廊上疾步走去。他勉强克制住自己不致跑起来，即使这样，迎面碰见的同事也已经开始用疑惑的目光不时望望他走去的背影了。

谢尔盖终于来到办公室，连忙跑到桌子跟前，一把抓起放在电话机旁边的话筒，心里直扑腾，最怕听见的是终话后短促的嘟嘟声。话筒里没有声音。

“喂！我是科尔舒诺夫！”谢尔盖喊道。

“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吗？……”话筒里响起一个姑娘优柔寡断的声音。

“对，对。是玛丽娜吗？”

“我不是玛丽娜，您不认识我，我叫塔玛拉，我是玛丽娜的朋友。”

谢尔盖的心突然地跳起来，他费了好大劲才使自己平静下来。

“您请讲。”

“我……我想告诉您……”姑娘似乎很艰难地说，“关于一个人……”

“那好，您现在就来吧。”

“不，不。现在我正在上班。我晚上可以去。”

“您在哪里工作？我可以亲自去找您。”谢尔盖没有沉住气，提议道，然后用手掌捂住话筒，小声对扎特金说：“赶快，了解一下她是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扎特金二话没说，拔腿从房间里飞跑出去。

“瞧您说的！到班上来决不行，”她惊慌地反对说，“我不是告诉您了吗，晚上可以谈。”

“随您的便，那就晚上谈。您几点钟来？”

“我不敢到您那里去。让我们找个地方碰面吧。”

“那么，您有什么可害怕的呢？”谢尔盖笑了笑，在竭力拖延谈话。

“我就是害怕，就这些。这样吧，您九点钟到‘胜利’影院来。您知道这个影院吗？您只能一个人来，要不然我就不去了。”

“可是您认不出来是我。”

“认得出来。您也戴一顶鹿羔皮帽子。好了，就这些。我得赶紧上班去了。您一定要来，只能一个人。您要注意，我会先看一看的。”

话筒里响起终话后短促的嘟嘟声。

谢尔盖不由得看了看表。时间还早，来得及把各方面情况做一番周密思考。于是，会面就这样给他确定了。谢尔盖微微笑了笑。扎特金回来了。走进办公室的还有罗巴诺夫。

“哎，沃洛佳，了解得怎么样？”谢尔盖问道。“塔玛拉来电话了，”他对罗巴诺夫解释说，“就是那个穿灰鼠皮大衣的姑娘。她约我晚上见面。”

“哎呀！”罗巴诺夫发生了兴趣，“她怎么知道您的电话呢？”

“对她有许多问题要问。”谢尔盖沉入幻想地说。

“她打的是公用自动电话，从新大街打来的，”扎特金报告说，“我想……”

“您想什么？”谢尔盖注意地看了他一眼。

“她就在附近什么地方工作。”

“对，我也这样认为。”

“应该在周围找一找。”罗巴诺夫提议道，“那里没有大型企业，都是一些食堂、咖啡馆、修配厂、服务部……她的特征我们有。沃洛佳，你去把这件事办一下。”

就这样决定了。扎特金飞快地从办公室跑了出去，他做一切事情都雷厉风行。他充满了蓬勃的精力和行动的愿望。

谢尔盖和罗巴诺夫含着微笑，目送他而去。

“那么，现在干什么？”罗巴诺夫问。

“现在提审阿列克。”谢尔盖回答说。

“你要考虑到，”罗巴诺夫提出警告，“我不会让你单独一个人去赴约的。”

“真新鲜！她恰恰专门预先通知了……”

“正是这样，我才不让你一个人去。”

“不行。我已经习惯单独一个人去赴约了。”

……阿列克依然穿着那件带拉链的氨纶夹克衫。夹克衫下边露出了灰色的毛料衬衣，领口上的珠母扣子闪变出贝壳灰岩的光辉，把谢尔盖的目光吸引到他那黝黑的细脖子上。不知为什么，他那像孩子似的脖子使谢尔盖想起了瓦利卡。他想，应当把这个小家伙找来，向他表示感谢。

当阿列克笨拙地反背着两手，从门口走到桌子跟前时，谢尔盖一直注意地望着他。他的头发已经用推子剃光了，因此乍一看，他变得认不出来了。但仍然像昨天一样，他那两道又浓又黑的眉毛紧锁着，留着口髭的瘦削而漂亮的脸孔消瘦了，嘴紧闭着。

“你为什么要去犯罪呢，”谢尔盖顿时怒从心中起，想道，“谈谈恋爱、唱唱歌、听听课多好。”

阿列克默默地坐下来，有所期待地抬起富有表情的大眼睛，望着谢尔盖。他的目光里有一种东西使谢尔盖大吃一惊。这目光里没有敌视，没有嘲笑或者固执，没有痛苦或者茫然失措——一切都像从前一样，一切都是谢尔盖此时此刻期望看到的。只是后来他才明白他吃惊的是什么：他那疲惫的眼神。

“那么，阿列克，”谢尔盖说道，“让我们接着昨天的谈吧。”

阿列克无精打采地耸了耸肩膀。

“好吧。”

他好像一切都无所谓。

“你昨天答应谈谈你自己的情况。而且你还加了一句，”谢尔盖微微一笑，“说你只告诉我一个人。现在就我们俩。你讲一讲吧……”

“他怎么了？”谢尔盖忐忑不安地想，“高兴劲儿哪儿去了，愤恨情绪到底哪儿去了？”

“假如你想听的话，我可以讲，”阿列克漠然答道，目光盯着空间什么地方，“只是这有什么意义呢？”

“有意义，你会看到的。”谢尔盖强调说。

阿列克依然像霜打的一样冷笑了一下。

“好吧，您就提问吧。要知道，我不是善于讲故事的人。”

“那好。你昨天说的自己的姓氏和地址都对吗？”

“是的。”

“你什么时候到这个城市来的？”

“一年半之前。打算在这里考大学。要知道，我听说这里竞争不激烈……可是，”阿列克苦笑了一下，“对于我来说，竞争太激烈了。”

“你落榜了？”

“是的。”

“为什么不回家？”

“自尊心。左邻右舍会怎么说呢？而且我的双亲……他们曾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总之，我写信说，我考上了夜大，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么你自己呢？”

“明白吗，我决定闯闯世界。”

“怎么闯呢？”

“起初我在这里的铁路上当装卸工。后来在卡马河上运木筏，往阿斯特拉罕分送报纸，在塔林当建筑工盖房子。我经常给父母寄包裹——礼品、鱼子酱。我写信净写高兴的事。而自己……忍饥挨饿，您要知道。”

“总之，愚蠢的自尊心在作祟，你是这样说的吗？”

“当然，愚蠢的自尊心。”

“那么后来呢？”

“今年夏天回到了这里，决定再试一次考大学。我一边学习，一边又当上了装卸工。”

“你是怎么和那个人认识的？”

“一个机会，”阿列克耸了耸肩，“要知道，是一个离奇的机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天，在车站的小卖部里，他看到了我饥饿的眼睛，便请我吃饭。当时我连拒绝的力气也没有。于是，‘伏特加’灌进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您要知道……”

“他答应给你家里寄好多东西？”

“当然。”

“危险人物……”

阿列克耸耸肩，但没有作声。

“你对我闭口不谈他的情况，是吗？”谢尔盖忍不住问道。

“我已经说过了，”阿列克皱了皱眉头，“自己欠的账自己付。”

“可是他把你的账也付了。”

“那是他的事……”

“算了。这样，这一切都是愚蠢的自尊心。那么，那个漂亮的女人呢？是他介绍你们认识的吗？”

“这没有意义。总之，我请求……不要提这事，我求求您了。”阿列克棕色的大眼睛里闪过那样痛苦的光芒，以致谢尔盖一时觉得不安起来。

“无疑是谢苗诺夫介绍他们认识的，”他心里思忖道，“这像他干的事。他介绍他跟谁认识呢？”这时谢尔盖仿佛猛然想出了主意。他用无动于衷的语气说道：

“顺便说一下，我今天晚上要去见塔玛拉。”

阿列克向谢尔盖投去惊惶的一瞥，但他马上醒悟过来，低下头去。在他那被剃光的一侧太阳穴上，一根青筋突突地跳动起来。

谢尔盖默不作声。

“别打扰她，”阿列克终于小声地、吃力地说，“她什么都不知道。我发誓，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跟你一起去过车站，”谢尔盖提醒道，“她去接带来手提箱的人。”

阿列克猛地抬起头来，怒不可遏地看了谢尔盖一眼，嘴角不时抽动着。

“我告诉您的话还少吗？是吗？还少吗？……”

“你并不全都了解，”谢尔盖反驳道，“很遗憾，我也不全都了解。”

“她是被派去接站的，明白吗？她一无所知。”阿列克固执地重复说。

“谢苗诺夫派他们去接拿手提箱的人，”谢尔盖心想，“后来阿列克为了这只手提箱三更半夜来到谢苗诺夫家。可是那封信……谢苗诺夫吓坏了，跑到这里来了。”

“谁威胁说要杀死谢苗诺夫呢？”

“不知道。”阿列克硬撅撅地说。

当然，这完全是可能的。

但是，谢尔盖马上感觉到关于谢苗诺夫的看似合乎逻辑的说法中有一个几乎显而易见的破绽。信上写的是恐吓的话，于是阿列克来取手提箱。阿列克大概跟谢苗诺夫吵翻了，比方说，因为塔玛拉，所以要求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如此说来，信是他写的。不过，这很容易查清，只要对照一下笔迹就可以了。那么，缩小的破绽很快就会消失。

“这个给你，”谢尔盖说着，把一张纸和自己的钢笔递给阿列克，“请把你给我讲的这些写下来。”

阿列克耸了耸肩膀。

“干什么，亲爱的？”

“需要。”

“好吧，如果需要……就是说，把我今年在什么地方工作写下来，我这样理解对吗？”

“对，对。”

阿列克急忙写起来，然后把纸交给谢尔盖。

“请检查吧。直到最后一个工作地点都写上了，”他冷笑了一下，“不论在什么地方，我干活都是诚实的。”

“你不想再告诉我什么了吗？”谢尔盖问。

阿列克摇了摇被剃光的头，然后小声说：

“千万别打扰她。”

“唉，”谢尔盖忧郁地摇了摇头，“你真糊涂啊？！”

阿列克被带走了。

过了一会儿，罗巴诺夫走进办公室，惊讶地看了看谢尔盖。后者靠在沙发椅背上，呆呆地望着空间什么地方，若有所思地吸着烟，甚至开门时发出了响声，他都没有转过头来。

“在作预先想象吧？”罗巴诺夫讥讽地探问道，“等待会面？”

谢尔盖没有吱声，张开双臂，伸直桌下边的两腿，使劲伸了个懒腰。

“哎，阿列克怎么样？”罗巴诺夫问。

“啊！”谢尔盖懊恼地把手一挥，“果然不错，愚蠢的自尊心和漂亮的女人。顺便说一下，是上次提到的那个塔玛拉。我真没法告诉你那小伙子有多么可怜。”他简短地说了一下和阿列克的谈话情况，最后说道：“要把他的笔迹，”他指了指面前的纸，“和写给谢苗诺夫的信中的笔迹做个比较。”

“现在只能到星期一看结果了，”罗巴诺夫答道，“七点多了，人都走了。”

“是啊，当然……”

“我刚才跟莫斯科和伏尔加格勒通了电话。”萨沙神秘地说。

“是吗？……”

“莫斯科刑侦局找到普罗霍罗夫了。”

“不可能！”

“千真万确。谢苗·特洛菲莫维奇·普罗霍罗夫……经济学博士，高级研究员……”

“呸！”

“别急嘛。还有一个普罗霍罗夫，名字也叫谢苗·特洛菲莫维奇。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一年因杀人罪而服刑。今天档案馆把他的卷宗给我们寄来了。里边有照片、指纹图和过去的一些关系。总之，什么都有。他没有正式住在莫斯科。但是……”罗巴诺夫狡黠地冷笑了一下，“他在伏尔加格勒被发现了。”

“是这样。”谢尔盖兴奋起来。

“一九五九年，他在那里和女公民伊万诺娃登记结婚了，两年以后解除婚约。离婚是伊万诺娃本人提出来的，因为跟他在一起是活受罪，她受不了。如果他们在那个年代离婚，你能想象吗？”

“我能想象。他在那里的什么地方工作？”

“在果品蔬菜基地，当会计。”

“当会计？有意思……”

“是啊，是啊。所以我重又打电话给莫斯科，告诉科斯加同样这句话：‘有意思。’我指的是戈尔利娜。她是出纳，而他是会计，你明白吗，所以普罗霍罗夫才不在那个机关里工作了。”

“这没有意义。”

“说的就是嘛……”

朋友二人心领神会地彼此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起来，笑得那么开心，仿佛好久都没有笑了。

“可见，普罗霍罗夫真有其人，”谢尔盖说，“他的确服过刑。而且跟伊万诺娃结婚的就是他。这已经说明了某些问题。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也是这样认为。这的确说明了某些问题。”

“等着瞧吧，还会有别的事。”

“顺便说一下，我让莫斯科把费奥多罗夫的卷宗也找出来。”罗巴诺夫假装无所谓地通知说。

“也好，会有用的。”谢尔盖用同样的口吻回答说，“我得为他忙活了。”

“主要的是，但愿他别再给你添任何其它麻烦。”

“你别破坏我的情绪，”谢尔盖严厉地说，“我无论如何得赶快去赴约了。”

晚上九点整，谢尔盖准时来到灯火辉煌的胜利影院的大楼跟前。影院坐落在白雪覆盖的市公园深处。

谢尔盖走在中心的林荫道上，一条条小路从这里向一旁延伸开去，消失在黑暗中。在一个个雪堆之间，周围显现出黑乎乎的长凳子。风孤独地在光秃秃的盘亘的树枝间呼啸。

影院附近聚集了一群人。电影马上就要开演了。

谢尔盖走到一边，在一条没人坐的长凳跟前来回踱步。他的头顶上方，弧形的细柱子上，电灯高悬，明亮地照耀着，脚下边新鲜的、尚未碰过的雪在闪闪发光：人们很少从这里走，还没有来得及把雪踩脏。

谢尔盖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机警地注视着影院入口处大声喧哗、热烈交谈的一群人。他发现中间什么地方突然闪过一个穿浅色皮大衣的人，旋即消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又闪了一下，已经在另一个地方了。那姑娘仿佛在躲着他。谢尔盖冷笑了一下，开始监视她。

不知是谁冷不丁地动了一下他的袖子。谢尔盖转过身来，一个身材不高的姑娘站在他面前，身穿黑色大衣，毛茸茸的深棕色领子几乎把她的一半脸都遮住了。一双调皮的黑眼睛从乌黑的长睫毛下边望着谢尔盖。

“您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吗？”姑娘问。

“对。您是塔玛拉？”

“她怎么把我给骗了。”谢尔盖心想。

“我是塔玛拉。走吧，不能站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看得见。”

她果断地挽住他的胳膊，带他向前走去。

“我们去哪儿？”当他们从人群跟前走过去时，谢尔盖问道。

“到远一点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就到那边。”

他们从林荫道上拐到旁边一条小路上。谢尔盖不自觉地回头望了望，试图记住转弯处。

姑娘笑了起来：

“您好像很胆小。”

“不算太胆小……”

“您害怕我随便把您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吧？”

“那么您害怕谁呢？”

谢尔盖决定用她那种开玩笑的口吻。

“哎呀，瞧您说的，我谁都不怕。”塔玛拉挑衅地回答说，并加了一句：“现在到这边来。”

他们又拐到一条阒寂无人、黑咕隆咚的小路上。风呼啸着吹打在他们脸上。

“您对年轻人也这样发号施令吗？”谢尔盖问。

“我对所有的人都这样，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塔玛拉机敏地回答说。

“这么说，不管对彼得·达尼雷奇还是对阿列克都这样随意支使吗？”姑娘迅速地抬起头，仿佛凝视着他的脸，停了一会儿。然后她急忙说道：

“是的，对他们也这样。”

她提心吊胆地回头张望了一下，压低嗓音问：

“没有人跟着我们吧，您看呢？”

“我看没有。”

他们又拐到一条小路上，风立刻没有了。在前边，在黑魆魆的树干中间，谢尔盖看出了一道高高的围墙模糊不清的轮廓。“大概到了公园尽头。”他心想。

“到了。现在您听我说，”塔玛拉停住脚步，小声说，“您认为，我为什么把您带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呢？我的一举一动他都在监视。”

“谁？”

“彼佳……彼得·达尼雷奇。简直是个可怕的醋坛子。又加上我遇到了阿列克。他蒙骗了他，阿列克。给了他钱，也给了我钱。可是——爱情……”她叹了口气，“心是强迫不得的。”

“您爱阿列克吗？”

“嗯。他是个热情的小伙子。不是吗？而且还是个又快乐又有文化的人。我喜欢这样的人。可是彼得……他一天到晚光知道喝酒。说实话，他还老放录音带。阴险狠毒的家伙。”她突然说了这么一句，结束了自己的话。

谢尔盖决定把话题转到正事上。

“您在车站上接的是什么人？”他问。

“阿列克告诉您了？不知是什么买卖人。彼佳……彼得·达尼雷奇让我们去接站的。他们给他捎来一只手提箱。我可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他难道会告诉我吗？后来他决意甩掉阿列克，开始吃我的醋。他自己给自己写了封信，说有人要杀害他。并且他让阿列克夜里到他家里去。而他本人却跑到你们那里，多么阴险狠毒。”

“可是他说，他不认识阿列克。”

“他撒谎，”塔玛拉咬牙切齿地小声说，“他说的全是假话。你们到他家里搜查一下。您知道会找到什么吗？”

“我们会找到什么呢？”

“你们会找到左轮手枪。我亲眼看见的。他把手枪藏在窗台下边一个隐秘的地方。简直太可怕了，他扬言要开枪把我打死。此外，他还有毒品。我忘了这毒品叫什么了……”

“是大麻膏吗？”

“对，对。他通过先卡，倒卖大麻膏。我们这里有那种小偷……”

姑娘说得又快声音又低，谢尔盖全神贯注地听着，生怕把什么听漏了。他把最主要的东西暗自重复了一遍：“自己给自己写信……手枪藏在窗台下边……认识阿列克……大麻膏……”

“他还从他妹妹的药店里搞到了不知什么毒品。我亲耳听见的。我现在在他家里连口水都不敢喝。您瞧，多么阴险狠毒！……哎哟，好冷啊！……”她冷得缩了缩肩膀，用花手套搓了搓脸颊，“您不冷吗？”

“不冷。我想再向您提两个问题，塔玛拉。”

“请您快点，要不然我的脚可冻得受不了了。”

她开始在原地轻轻地跺脚。

“玛丽娜在哪儿？”

“我不知道。她在莫斯科不知出了什么事。您找她干什么？您把彼得·达尼雷奇抓起来就行了。他……他说可能会把玛丽娜的情况也告诉您。”

“玛丽娜的情况？……”谢尔盖由于出乎意料，甚至有点慌张起来，“算

了。现在，如果需要找您的话，我在哪里能找到您呢？”

“找我？”她戒备起来，“我不会把我的地址留下的。您又要开始纠缠了……”

“可是，塔玛拉……”

“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为什么给您打电话？我非常可怜阿列克。这都是彼佳把他害得误入了歧途。是彼佳！而且他把我也引入了歧途。一切都是因为他，阴险狠毒的家伙。您把他抓起来吧！”

“首先要把情况搞清楚。”谢尔盖说着，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您从哪里打听到我的电话的？”

“从哪里？……这对您反正不都一样吗？”

“塔玛拉，我们不是在开诚布公地进行谈话吗？如果我提出问题，那就是说需要这样。您想让我相信您，可您自己……”

“开诚布公？那么您告诉我，您能把阿列克放出来吗？”

“我不知道。应该把情况弄清楚。假如他没有罪，那么，我们当然会把他放出来。请您现在回答我的问题。”

“从哪里知道您的电话？彼佳告诉我的。”

“假话，”谢尔盖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我的电话。他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喏，那么……是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给我的。我今天到他那里去过。跟您在一起我简直都糊涂了。”

“我看得出来。大概还有什么事使您害怕了吧？”谢尔盖温和地微微一笑，“要是这样，就马上告诉我。”

“您以为是关于彼佳？那您就检查好了。”

“我们会试试看的。”

他们几乎友好地分手了。

谢尔盖落在后面，在空无人迹的小路上跟着姑娘向前走去。四周静悄悄的。脚下的雪咯吱作响。在一个高高的雪堆后面，一眼望去，到处林立着黑乎乎的树干，默默无声，凝然不动，仿佛保护着周围的宁静，只是在高处的树枝上，寒风强盗般地发出呼啸声，呜呜地飘荡着。

姑娘黑魆魆的身影在转弯处不见了。谢尔盖加快脚步，努力盯住她，以免她从视野中消失。

前面灯光闪烁。风刮来了不知什么人的说笑声。谢尔盖尾随着塔玛拉，终于来到了中心林荫道上。他那训练有素的眼睛立刻发现有一个人跟上了那姑娘。“啊哈，我们将来一定要搞到你的地址，以防万一。”谢尔盖心想。但这时，一个新的念头突然使他感到不安：“万一这是谢苗诺夫呢？”于是，谢尔盖小心谨慎地朝渐渐离去的姑娘的方向走去。

他看见塔玛拉跟灯走齐了，看了看表，加快了步伐。过了一分钟，她和影院入口处的人群混杂在一起，消失不见了。“难道她真的打算看电影吗？单独一个人？”谢尔盖不满地想道。但无论他怎样寻找，都没能找到那姑娘。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了。

谢尔盖看了看表。哎呀！已经快十一点了。得赶紧回去：罗巴诺夫还在局里等着呢。

他转身朝公园出口处走去。焦急不安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于是谢尔盖企图好好考虑一下在这次非同寻常的会面中所了解到的情况。

首先，塔玛拉为什么要见他呢？这一点好像很清楚。她害怕并憎恨谢苗诺夫，想帮助阿列克。是这样。现在说一说谢苗诺夫。如果他确实藏有手枪，那么他就是个危险人物。这与谢尔盖对谢苗诺夫已经形成的印象，说真的，没有关系。那么应当做修正，非常重要的修正。手枪、大麻膏、安眠药……算了。接下来是最重要的。莫非谢苗诺夫知道玛丽娜在什么地方吗？……也就是尼娜……到那时，看来……不，他不可能知道。

已经快走到局门口时，谢尔盖才感觉到冻坏了。当他向岗哨出示证件时，冻僵的手指却不大听使唤。

“罗巴诺夫还没有走吧？”他问。

“还没有。有一个同志在他那儿，报社来的。”

“啊——啊……”

为了暖和暖和身子，谢尔盖跑着上了楼。楼梯上空空荡荡的，光线暗淡。到了走廊上，他双脚感到强烈的阵阵刺痛，犹如针扎似的，走路很疼。“应该向萨沙要双毛袜子，”谢尔盖决定道，“这样一下子就把脚冻坏了。”

谢尔盖在罗巴诺夫的办公室里看见了乌尔曼斯基。俩人正坐在写字台后边，安然而舒适地喝着像炮弹似的长形花暖瓶里的茶。碟子里摆着饼干。

“啊——啊，你们又吃又喝，真清闲。”谢尔盖眼馋地搓了搓手。

“有人忙着约会，有人像老年人那样悠然地长时间饮茶。”罗巴诺夫淡淡一笑，可是他那圆嘟嘟的脸立刻变得一本正经起来，“格奥尔基在讲有意思的事。”说完，他转向乌尔曼斯基，加了一句：“你再给他讲一遍。再讲一遍吧。”

“先给我喝杯茶，”谢尔盖一边说，一边把椅子挪到桌子跟前，“可把我冻坏了，简直像个小狗崽。”

这时他才发现，乌尔曼斯基非常焦急不安，根本不说玩笑话，一个劲儿吸烟，甚至连一口茶也没有喝。

“我在谈玛丽娜，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乌尔曼斯基冲动地说，“她是个非常好的姑娘。谢天谢地，我看人是很准的。”

“是吗？”罗巴诺夫忍不住问。

“是的，她是个好姑娘！”乌尔曼斯基寻衅地又说了一遍，“只不过她有什么不幸的事。我感觉是这样。而且我还……”

“你的心境我们了解，”罗巴诺夫又打断了他，“你得把事实摆出来。”

“对，对。把事实摆出来。是这么回事，我今天到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家里去了。您刚好从他那里离开，”他看了谢尔盖一眼，“我决心问问他，也许会有玛丽娜的消息。这时她的女友塔玛拉来了……”

“看来，她没有撒谎。”谢尔盖心想，并问道：

“她没有向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打听有关我的情况吗？”

乌尔曼斯基沉思起来：

“没有。我觉得她什么也没有打听，尽管她的举动有点奇怪。这个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们是一块儿离开的吗？”

“是的。可是在大街上，她冷不丁地问我：‘您和玛丽娜在谈恋爱，是吗？’我就贸然说了一句：‘我们是在谈恋爱。还会是什么呢。’她叹了口气，突然说：‘我可以向她传递便条，您愿意吗？’我简直发慌了，但我说：‘当然！我当然愿意。她在哪儿？’‘这个我不能告诉您。玛丽娜请求不要

告诉任何人。’哎，我想，算了……”

这时，桌子上的电话响了。罗巴诺夫急不可待地一把摘下话筒。他注意听了一分钟，然后含混不清地嘟哝了一句“好吧”，便把电话挂了。他匆匆瞥了谢尔盖一眼，说：

“他们把你的女朋友放走了，让她见鬼去吧。”说完，他转向乌尔曼斯基，补充说：“喏，谈谈便条的事吧……”

乌尔曼斯基稍稍停了一下，收了收思想，接着说：

“所以我当场，就在大街上，给玛丽娜写了一张便条。我们继续往前走。快到市场时，她说：‘您不用再送我了。’‘那么回信怎么办呢？’她说：‘如果有回信，我就给您打电话。您留个电话吧。’我把我的电话写下来给了她，她就走了。而我，知道吗，悄悄跟在她后边。”

“你成密探了，知道吗。”罗巴诺夫笑了笑。

谢尔盖默默地听着，两手捧着热杯子，不停地喝茶。

“要是真正的密探无所作为，那我就去当。”乌尔曼斯基愠怒地说，“就这样。她到市场去了，而且走到一个小百货商亭跟前。”

“找谢苗诺夫去了。”罗巴诺夫耐人寻味地说。

“可见，她把这张便条也交给他了，”乌尔曼斯基最后说道，“我请求狠狠收拾收拾这个家伙。他知道玛丽娜在哪儿。”

“对，是得着手收拾谢苗诺夫了，”谢尔盖强调说，“但要到明天再说。”……但是第二天发生的事把他的计划全部打乱了。

一大早，局值班员便往旅馆给谢尔盖打电话，报告说：

“中校同志，谢苗诺夫的住宅被抢了，他本人健康状况很糟，住进了医院。”

“他出什么事了？”

“医院通知说，是安眠药中毒。”

第七章 又是两天，最后两天

前一天，沃洛佳·扎特金在新大街转了好长时间。在这条大街的中部，一家面包店旁边拐角的地方，有一个惹祸的自动电话亭。面包店里根本没有叫塔玛拉的人。那里不管是当售货员的，还是当会计的，都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姑娘。于是沃洛佳继续往前走。

像箭一样笔直的大街两旁耸立着浅色的新楼房，有七层的、九层的，甚至十一层的。楼房犹如一条黑色的宽带子把大街和树木以及灌木丛隔开来。现在树木和灌木丛仍被雪覆盖着，以致灌木丛只剩下黑乎乎的，又短又硬的、鬃毛似的顶梢，茂密盘错的树枝好像是直接从高高的雪堆里长出来的。这道黑白相间的围墙在有人行道的地方变成了狭窄的路堑，通过路堑看得见大街上往来行驶的蓝色无轨电车、红色公共汽车和各种颜色的小汽车。

沃洛佳一开始便往前走了两三个街区。在这一地段，他碰见了食品店、冰箱修理部和照相馆。那里也根本没有塔玛拉。于是沃洛佳朝自动电话亭对过去。那里有电视维修部，有立刻引起他极大兴趣的缝纫车间，有理发馆。继缝纫车间之后，这家理发馆重又激发起他那已经被扑灭的希望。可是，唉，这里也根本没有塔玛拉。确切点说，他在理发馆找到一个塔玛拉，长得非常好看，人又机灵活泼。沃洛佳来了情绪，兴致勃勃地谈起来，以致使姑娘羞红了脸。可是过了几分钟，他的兴致便已荡然无存了。很显然，这完全不是他要寻找的那个塔玛拉。

沃洛佳在大街上和与此毗邻的街道上转悠了大约三个小时。他可真是冻坏了，怀着满腹懊丧，坐上无轨电车，回局里去汇报自己的出师不利了。

……沃洛佳做刑事侦查工作已经两年了。他出色地通过了关于现场勘查的毕业论文答辩，法律系一毕业就来到了这里。沃洛佳对朋友们提出的困惑和怀疑的问题总是笑着回答：“毫无办法，性情相投嘛。”并且有一次出人意料地加了一句：“要知道，我是个极富怜悯心的人。”在警察局一个部门实习的三个月使他内心充满了那样的痛苦和无法平息的愤怒，以致那些日子里母亲都认不出自己的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沃洛佳了。“我不能见她流眼泪，”每到晚上他都说，“儿子因耍流氓被关起来了，关得对，他是个败类，是个畜生。可是你要是见过那个女人就好了！三天功夫，她就变成了一个老太婆！……”另外一次吃晚饭时，他说：“……一天晚上在公园里，你明白吗？他们坐在长凳上，搂在一起，憧憬着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又是几个带着刀子的流氓来了。他们像狼一样猛扑过去。这个姑娘就被……她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但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我们要把全城翻个遍，一定要找到他们。这种事决不饶恕……”

早就是他们娘儿俩在一起生活。沃洛佳五岁那年父亲就牺牲了。父亲曾是极地勘察飞行员。母亲教沃洛佳学习音乐：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她期望他成为一名音乐家，并且一定是小提琴家。小提琴经常引得她落泪。她幻想自己将坐在安静的有魔力的音乐厅里听他的音乐会……后来，沃洛佳渐渐长大了，她想，他会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对飞机突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像父亲一样如痴如迷。后来……凡是能想到的她都想到了，但是她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她的沃洛佳将来要做刑事侦查工作。但她理解了他，敏锐的正义感使他决定从事这项工作。

……当无轨电车经过市场时，沃洛佳猛然想起了先卡，立刻向车门口挤

去。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促使他在这里下车似的。

人行道上，凛冽的寒风又吹打在人们脸上，把脸冻得发疼。沃洛佳心想：“啊，说实在的，我有必要去那里，去市场吗？”他也许要去欣赏欣赏谢苗诺夫吧？抑或在啤酒馆门口，在先卡的朋友们中间，彼此拥来挤去？沃洛佳耸耸肩膀，微微一笑……

市场上的人已寥寥无几了。在一排排长长的空空荡荡的货摊后边，有的地方还在卖土豆，看得见一堆堆金黄色的葱头和鲜红色的散装红莓苔子。被踩过的脏污的雪在脚下沙沙作响。

沃洛佳已经从放下遮阳伞的看不到头的灰色货摊旁边走过去了，这时他蓦然发现前边有一个穿浅色灰鼠皮大衣的姑娘，便不由自主地盯上了她。他已经不可能放过任何一个穿灰鼠皮大衣的姑娘了。后来他看见了那个记者，乌尔曼斯基。这个身材颇长的小伙子无疑在跟踪那个姑娘，并且干得很不高明，以致沃洛佳都发笑了，这一情形使他产生了兴趣。

当那姑娘坚决地穿过货摊后边的一个不大的广场，朝谢苗诺夫做生意的货亭走去时，沃洛佳彻底警惕起来。那姑娘没有到围着一群女顾客的柜台跟前，而是绕过货亭，在货亭后面消失不见了。莫非这就是那个姑娘吗？

他发现乌尔曼斯基在远处来回转了一会儿，陡然急转身，向市场出口疾步走去，差点儿跑起来。他那副样子又焦急又惊惶。

沃洛佳打定主意要等一会儿。这时，他不是站在原地不动，而是从一个货亭走到另一个货亭，仔细察看那里摆出来的商品，甚至还问问某些商品的价格。但他的思想却在紧张地活动着，他在利用他已掌握的细节和事实作为考虑的出发点。

是的，这多半就是谢尔盖提到的那个姑娘。要知道，他们已经在这里，在谢苗诺夫的货亭跟前看见过她一次了。也就是当时谢尔盖一个人看见过她，可是后来她突然不见了。对她好一阵寻找。说不定那一次她也是到货亭里去了。但后来她又到哪里去了呢？

为防万一，沃洛佳朝离谢苗诺夫的货亭不远处的一个货亭后边看了看。他看见在一排货亭和把市场与大街隔开的破旧的板墙之间有一条又长又窄的通道，板墙上有一个几乎不易察觉的小便门。

沃洛佳环顾了一下四周。从他站的那个地方，无论是从谢苗诺夫的货亭到这个小便门的整个通道，还是货亭前面的广场，都看得一清二楚，而货亭后面，在一直延伸到市场出口处的货摊之间是一条又宽又直的通道。总而言之，不可能选择到用作监视的更方便的地方了。但是站在这里不引起怀疑是难以想象的。

正在这时，不知是谁推了他肩膀一下。沃洛佳转过身来，一个瘦削的，胡子拉碴的人站在他面前，身子有点儿晃晃悠悠。他脸上暗红色的颧骨之间的鼻子又长又白，仿佛冻伤了似的，微微发肿的眼睛泪水汪汪。破旧大衣上边的扣子被揪了下来，露出一条退去原来颜色的脏兮兮的围巾。那人泪眼模糊地看了看沃洛佳，费劲地说：

“能想到吗？你的一个半卢布……我的一件容器……科利亚还要出一个卢布……啊？哦……哦……哟……”他屈起中间三个手指，用大拇指和小拇指颤颤悠悠地当空测量出三个不同的距离，每一段距离必须与每一个入股人所投的股份相符合。

这时，他提到的科利亚来了，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这人个子矮小，

留着口髭，歪戴着“莫斯科女人牌”的棕色羊剪绒帽子，患有眼疾的眼睛凸鼓着，脸虚胖浮肿。

“瞧，遇到了这种事。”沃洛佳心想，并匆忙说道：

“我们都凑了钱，哥儿们。你出一份吧，我和科利亚等你一会儿。”

于是他把手伸到口袋里去掏钱。胖子脏兮兮的手里已经攥着一个卢布。高个子拿起钱，转眼消失不见了，而胖子叹了口气，含糊不清地解释说：

“要不是这个虱子，我就……跟他对着干了——哎呀！……”

这时，沃洛佳看见那个穿浅色灰鼠皮大衣的姑娘从谢苗诺夫的货亭里悄悄溜出来，钻进靠板墙的狭窄的过道里。他赶紧搂住胖子的肩膀，稍稍弯下身子，同样也前言不搭后语地对着他耳朵说：

“他们这号人统统都是……你自己恐怕知道……哎呀！……”

这时，那姑娘顺着板墙朝小便门跑去，匆匆瞥了一眼不远处这两个摇摇晃晃的人影，溜到大街上去了。

就在这同一时刻，沃洛佳直起身来，急急忙忙地对不知所措的胖子说：

“哎，祝你健康，科利亚。向你夫人问好……”

说罢，他紧跟着那姑娘朝小便门飞也似地跑去。“她叫塔玛拉，”他思忖道，“而且她是那个失踪的戈尔利娜的朋友。真是走运……”

跟踪那姑娘不用费很大劲。她走路不回头看，显然在为为什么事而惴惴不安，后来她急急忙忙上了一辆无轨电车。沃洛佳紧随其后上了车。

他们坐车行驶了很长时间，然后又徒步走在郊区寂静的白雪覆盖的大街上。大街两旁是用低矮的栅栏围起来的一排排平房。姑娘拐了个弯，朝一座这样的房子走去，登上紧靠玻璃凉台的台阶。

沃洛佳没等她走进屋子，便神色忧虑地从被凉台突出部挡住的板墙跟前走过去，拐进一条窄胡同里。房子原来在拐角上。

沃洛佳没有等多久。他很快听见门砰啪响了一声，高跟皮靴踏在台阶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穿着熟悉的皮大衣的姑娘穿过院子急忙朝小门走去。天渐渐黑了，沃洛佳看不清楚她的脸。

后来他们又乘车穿过全城，然而这一次，姑娘把沃洛佳带到一个熟悉的地址，草甸大街，谢苗诺夫的住所，并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门。她这时大概非常着急，没有一下子把钥匙插进锁眼里。

在谢苗诺夫的空住宅里——沃洛佳知道，住宅肯定是空的，塔玛拉没有久待。后来她坐上公共汽车又到市中心去了。“她还要跑很久吗？”沃洛佳精疲力竭地想道。

那姑娘总算离开繁华热闹的大街，拐进一条胡同里，走过两三座楼房，进了一座黑漆漆的大院子里。沃洛佳跟在她后边。根据姑娘坚定的脚步，根据她边走边开始解皮大衣和后来在门洞里习惯地抖掉身上的落雪的样子，沃洛佳明白了，她终于回到了家。过了一秒钟，他听见高跟皮靴细碎的噔噔噔的上楼声在二层静下来，然后是迅速的开门和关门声。

沃洛佳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在黢黑的门洞里又站了一小会儿，之后举步来到院子里。他现在好像也可以回家去了。沃洛佳此时此刻才感觉到，在这无限漫长而极度紧张的一天当中，他简直累坏了，冻僵了，饿极了。哦，要是他现在回家去，肯定会连午饭加晚饭一口气吃个光，再喝五杯，不少于五杯，热腾腾的浓茶，然后躺在长沙发上看书。已经攒了多少书啊……但这时，一个新念头使他激动不安：“假如这里不是她的家怎么办？假如她马上

又要离开怎么办？”不，走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他们急切地需要这个姑娘，关于这一点，科尔舒诺夫已经说过多少遍了！

来到院子里，沃洛佳四面张望了一下。在浓重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只有楼门口孤零零的电灯发出暗淡的光。在其中一个楼门口黄色的光线中，沃洛佳看出有一条长凳，长凳上坐着一个拱肩驼背的人。那人正在吸烟。当他深深吸一口烟时，烟卷的火光便时而闪烁一下，当他弓身弯腰时，火光便在他那看不见的、垂下的手中暗淡下去。

沃洛佳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朝那边走去，边走边用不能弯曲的、冻僵的手指掏烟卷。

“可以对个火吗？”

这时他才看清坐在长凳上的是一位已过中年的留着胡子的扫院人。他扎着围裙，外边套着短皮袄，脚上穿一双已经穿歪的绗底的毡靴，靴筒七扭八歪地卷到膝头。一把长柄宽头铁锹靠在旁边的墙上。

“可以，亲爱的，”老头儿把烟卷递给他，“你在这里等什么呢？”

沃洛佳对着了火，在旁边坐下来，不好意思地说：

“有一个姑娘住在你们这里……”

“是塔玛拉吗？”扫院人不假思索地、带着暗含的讥笑问道。“哎呀，亲爱的……我看你是个不能自立的人，你听我说……”

过了一会儿，沃洛佳已经了解到七号住户的全部情况。同时他没有引起扫院子老头儿的任何怀疑，因为他远不是对塔玛拉感兴趣的第一个人。

抽完一支烟，沃洛佳仍然那样不好意思地告辞了。

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沃洛佳累得都感觉不到双腿的存在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朝无轨电车站走去。

总之，他发现了两个新地址。这两个地址无疑是有用的，不可能没有用，既然沃洛佳为此花费了那么多精力。

当谢尔盖迅速穿好衣服，从旅馆里跑出来时，天还没有亮。值班员焦急不安的声音在他耳畔回响：“中毒。安眠药。”见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像往常一样，街上静悄悄的，阒寂无人。白雪皑皑的宽阔的大街笼罩在黎明前清如水晶般的朦胧之中。周围家家户户仍在睡梦之中。

熟悉的绿色伏尔加停在旅馆的楼门口，不时发出轻轻的噗噗声，两只黄色的车前小灯仿佛眯缝着眼睛，神秘地闪烁发光。

谢尔盖坐在司机旁边，用睡醒后仍然嘶哑的嗓音说：

“马上去草甸大街……”说罢，懊恼地点上烟吸起来。

他不喜欢空腹吸烟。

汽车在没有行人的，因此而显得更加宽阔的大街上疾驰，超过了稀稀拉拉的、过夜后刚刚开出来的、清洗干净的无轨电车。

一辆方形的绿色小型客货两用汽车已经停在草甸大街那所小房子附近，汽车上带有警察局标志的红杠和长长的天线。罗巴诺夫的灰色“伏尔加”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向后倒着车，朝那辆车靠近。“他刚来。”谢尔盖心想。

房子的窗户里灯火通明，好像那里正在拍摄电影似的。

谢尔盖跑上台阶，猛地把没有上锁的门拉开。罗巴诺夫正在前厅里脱大衣。

“你来了，”他看见谢尔盖走进来，非常满意地确定道，“你看见出什

么事了吗，啊？”

“我们会马上看到的……你至少得吃点儿东西吧？”

罗巴诺夫只摆了摆手。一个侦查员从房间里走出来，简短地报告说：

“我们二十分钟之前赶来的。环境没有被破坏。向导带着狗正在房子周围忙活。鉴定人和摄像师都在这里。”

“今天是哪位鉴定人值班？”罗巴诺夫一边问，一边用手掌把浅色头发捋平。

“索科洛夫。”

“啊——啊……好的。检察院的侦查员在这里吗？”

“他马上就到。”

“没什么。我们走吧。”

宽敞的、摆设豪华的房间里亮堂堂、热烘烘的，简直令人受不了。台座可以拉开的大功率手提灯明晃晃地照着。年纪很轻的摄像师在拍照。他时而蹲下，时而把报纸铺在椅子上站上去。

一个已过中年的身宽体胖的鉴定专家俯身检查通往下一个房间的门的金属拉手，他那光秃的头顶和脖子上的皱纹由于用力而涨得通红。

还有一个侦查员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圆桌跟前，很不舒服地在桌子紧边上做着记录，尽量不碰上摆在旁边的玻璃杯、盘子和酒杯。

“维肯季·伊万诺维奇。”罗巴诺夫叫住鉴定专家。

鉴定专家吃力地直起身来，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扶了扶滑落到鼻子上的深度近视眼镜。

“查清了什么？”罗巴诺夫问他。

“暂时查清的不多。要知道，门锁完好无损。喏，有的地方有指印……”

“谢苗诺夫公民的日子过得可不穷，”谢尔盖环视着房间，讥讽地说，“一点儿也不穷。”说罢，他转向罗巴诺夫提议说：“我们从手枪开始搜查怎么样？”

所有在房间里的人听到这句话都惊诧地警觉起来。

“可以。”罗巴诺夫同意道，并问摄像师：“您拍完了吗？”

“剩最后一张了，”摄像师急忙一边回答，一边把一条腿跪下去，“然后我到卧室去。”

“您首先要把那两个窗台拍下来，”谢尔盖插话说，“单独拍，拍大一些。”

“稍等一下……”

“见证人在哪儿？”罗巴诺夫转过身问一个侦查员。

“我们的人已经去请他们了。”

“那我们等一等吧。要把侦查员也请来。”

谢尔盖走到桌子跟前，挑剔地把桌子仔细打量了一番。

“吃东西喝酒的就一个人。显而易见，此人就是谢苗诺夫。”

“所有物品上的指纹都是一个人的，”鉴定专家补充说，近视地眯缝着眼睛，用手帕擦拭摘下来的眼镜，“那边那个长颈玻璃瓶除外。我觉得这只瓶子上还有不知是什么痕迹。我们不妨把这些痕迹证为同一个人所为。”

“这一点非常重要，”谢尔盖若有所思地说，“安眠药很可能暗中撒到那里面了。这当然不是谢苗诺夫干的。”

检察院的侦查员很快就来了，见证人——隔壁房子里的一男一女，他们

正在睡觉，这时也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来了。

“天哪，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那女人一边惊惶地说，一边四面张望。那男子的眼睛里流露出好奇的神情。

搜查开始了。

谢尔盖走到其中一个窗台跟前。他早已发现那个窗台明显地被移动过了，窗台下面的地板上看得出来有抖落掉的灰泥的痕迹。

“不知谢苗诺夫公民为什么对自己的秘密藏所如此马虎大意。”谢尔盖冷笑了一下。

“嗯……是啊……”罗巴诺夫摇了摇头，“真奇怪……”

谢尔盖用手抓住窗台边缘，使劲往自己怀里猛地一拉。厚厚的木板发出咔嚓咔嚓的碎裂声，从墙壁侧面的榫槽里露出来。木板下边的砖砌体里原来是一个相当大的凹凸不平的洞。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洞底上有一支手枪。

老鉴定员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手指把枪拿起来，另一只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黑色细柄的高倍数放大镜。他走到离角落里亮着手提灯更近一些的地方，开始全神贯注地检查这支手枪。

对住宅的搜查这时仍在继续进行。

在卧室里，在没有收拾的床铺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只装着安眠药粉的盒子，安眠药粉只剩下半盒了。

而在一个被挪到墙跟前，没有摆平的宽大的抛光衣柜后面，是被撕碎的糊墙纸，糊墙纸后面显出一个很大的空地方。

“非常……奇怪……”老鉴定员一边气喘吁吁地说，一边仔细观察地板跟前的糊墙纸的边，“糊墙纸是轻轻地、小心地……掀起来的……为什么要把它们撕下来呢？……”

“可见爬到那里的不是主人，”谢尔盖一边说，一边蹲下去，“你们瞧，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撒落在那里……”

鉴定专家手里拿着放大镜，呼哧带喘地探身到耷拉下来的糊墙纸边的后面。他脖子上的皱纹和光秃的头顶这时又涨得通红了。他从饭厅里拿来一盏拖着长电线的明亮的灯。过了一分钟，鉴定专家大声喘着气站起身来，把膝盖拍拍干净。

“是大麻膏……”他喘不过气来地通知说。

接下来对厨房、走廊、浴室、所有的门窗、地板的每一块木板、每一厘米墙壁都进行了同样一丝不苟、有条不紊的检查。

任何一件物品，甚至任何一粒尘屑，一小块斑污、一个碎纸片——一切都可能留下这天夜里发生的事的痕迹，一切都可能成为解开所发生的事的谜底的唯一线索。

进行这样的检查需要时间和力气，但主要的是，需要坚强的神经，持续不断的高度的注意力集中。不能对任何东西有所疏漏，哪怕是最小的、乍一看不值得注意的转瞬即逝的东西。

谢尔盖甚至好像已经习惯了做这样的检查！但他发现自己有时不由得想把什么东西，完全微不足道的东西放过去。

喏，不知一张什么照片最后被新贴上一圈边，好像真了不起似的。揭下来！什么都没有？那么现在往下进行。书架？把书检查一下。不，要一本本地单独检查。要一页一页地翻：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万一书页之间……什么都没有？现在继续往下进行。严格按照表针进行。墙跟前笤帚后边是什

么？一堆垃圾？腐烂了，腐烂了……

谢尔盖就这样每一秒钟都在给自己发号施令，同时机警地注视着其他人。

最后，事故的总体情况明朗了，渐渐地露出端倪，犹如把一幅画描下来以后，用蘸湿的手指在上面小心翼翼地摩擦一阵。

总之，谢苗诺夫晚上回家了。他单独一个人回来的。他肚子饿了，在厨房里做好了饭，端到房间的桌子上，坐下来。他饿得受不住，先吃了一点猪油土豆，然后从长颈瓶里倒了一杯有人放了毒的“伏特加”，一饮而尽，此外，直接就着罐头瓶吃了一条油浸熏泰鲱鱼。但他没有来得及再吃别的东西……稍晚一些时候，又来过一个。他用钥匙打开外面的门：完好无损的锁上没有发现万能钥匙的任何蛛丝马迹。无论是一个还是几个来人都非常匆忙，而且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没有寻找任何东西，没有拉开餐具柜或者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床连碰也没有碰一下，没有打开衣柜，他们立刻把衣柜推开，连忙从墙壁上的秘密藏室里把一件很沉的东西拖了出来。秘密藏室里有大麻膏，多半是装着大麻膏的手提箱。但是最有意思的资料是检查手枪所得到的。手枪上发现有指纹，看来是形形色色的人所留下的指纹。形形色色的人！这一点至关重要。

行动小组在谢苗诺夫家里工作了几个小时……

那个星期天早上，格奥尔基·乌尔曼斯基放任自己睡个痛快。他闭目而卧，浑身懒洋洋的，昏昏欲睡。他时而醒来，时而又怡然自得地睡去。一些不知什么样的思想不慌不忙地、混乱不清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又猝然中断，另一些思想又涌上来……

当他睁开眼睛时，看见的是挨着他睡觉的长沙发的一张低矮的小桌子，小桌上的台灯宛若一朵带茎的弧形花朵，还有一只方方正正的闹钟，旁边是烟灰缸和一包烟。

当他又一次睁开眼睛时，看见旁边的一张小桌子上摆放着封面花花绿绿的各种杂志：《接班人》《科学与生活》《青春》《银幕》……他订的杂志真可谓应有尽有！……而地毯上，桌子下边，一对黑色的哑铃从椅子腿后边露出来……没有看见写字台，这是一张豪华的、浅色的芬兰式写字台，带有漂亮别致、深浅不一的抽屉，有放打字机的可移动式搁板。这张写字台是他去年从莫斯科托运回来的。坐在这样的桌子后边工作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格奥尔基美美地伸了个懒腰，又微微闭上眼睛……不，睡意突然消失了。一种模糊不清、忐忑不安的感觉使他彻底醒了。他看了看表。哎呀！十点多了！

格奥尔基果决地撩开被子，登上拖鞋，只穿着裤衩背心便向前厅里的信箱跑去。他拿着一沓报纸回来了，慢条斯理地打开最上边的一张，贪婪地浏览着文章和电报的标题。他看得入了迷，索兴站在房间中央，直到把全部报纸浏览一遍。然后他俯身拿起哑铃，开始练起来，时而下蹲、屈体，时而把手臂举高，时而向两侧扩展，直到额头上冒出汗珠，气喘吁吁。

父亲往房间里望了一眼。

“报纸，不用说，你已经拿出来了吧？”他问道。

格奥尔基朝旁边点了点头，同时用力推举哑铃。父亲也是大高个子，穿着条纹睡衣，不慌不忙地把报纸拿走了。

母亲、父亲和格奥尔基在厨房里用早餐，他们像过星期日那样从容地吃着早点，彼此交流着各种新闻。

后来，格奥尔基点上烟吸了一口，回到自己房间。他打算给当地一位作者书写一篇评论，登在自己的报纸上，今天应该把它写出来。

格奥尔基不急不忙地把纸摊在桌子上，把夹着许多书签的要加以评论的书挪到自己跟前。这时，他突然觉得迫使他醒来的那种惊惧不安、忧心忡忡的感觉仍在心头涌动。这种感觉甚至变得更加明朗、更加强烈了。格奥尔基蹙了蹙眉头，强使自己不去考虑这个，把昨天开始动笔写的评论粗略地看了一遍。然后他很快地、感人地（他这样觉得）写完了一段：“……但是这些掩盖不了这部中篇小说的主要优点——它的严肃性、真诚和激情。”下边好像应该紧扣这些优点来写。就是说，写“严肃性”或者写“提出的问题”更好一些……

但这时他突然又想到了玛丽娜，她那一缕缕浅色的鬈发，那双如此深情纯真，不知为什么非常忧郁，甚至惊恐不安的眼睛，她那轻盈优雅的身姿，她穿着的带红色衣兜、翻口衣袖的朴素大方的灰色连衣裙，一一浮现在他的想象中。他的心加速地怦怦跳起来，于是他思忖道：“你到底藏到哪里去了？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格奥尔基顿时感觉到一种按捺不住的愿望，急欲要跑到什么地方，干点什么，马上把自己的焦虑不安跟谁谈一谈。

他冲动地把写了半页的纸推开，又点上烟吸起来，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沙发椅背上。

怎么办？也许应该去找那个谢苗诺夫，要求……或者给科尔舒诺夫打个电话？这样不妥。毕竟是星期日。人总得有时间休息休息才行。那么到底怎么办呢？这样无所事事也真受不了！……但实在无可奈何。眼下实在拿不出任何办法。

格奥尔基长出了一口气，又着手工作起来。他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儿摊在自己面前的那张纸，下意识地浏览着刚才写下的几行字，然后把某个字删掉，添上别的字，渐渐地开始写顺手了。

前厅里电话突然响了，格奥尔基倏地从桌子后边站起来，朝门口跑去。

“喂。”他急如星火地对着话筒说。

“是……格奥尔基吗？”传来一个怯生生的、使他浑身一颤的姑娘子的声音。

“对，对！是我！您是哪位？是玛丽娜吗？”

“是的……”

“玛丽诺奇卡！您在哪儿？”格奥尔基失声喊道。

“我……我收到您的便条了。所以我想……”

“请您先告诉我您在哪儿！您从什么地方打来电话？……”

“我不知道……”姑娘用刚刚能听见的声音说。

“您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在一座房子里……地址我不知道……我想告诉您……”

“别忙，别忙！您先快点回家吧！我们找您找得好苦！”

“不，不，我不能回去！”她害怕地大声喊道。

“那好吧。可以给您打电话吗？往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打电话？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姑娘带着一种绝望的语调回答说，并突然急忙加了

一句：“哎呀，有人来了！……我是想告诉您，您不要再找我了……”

“玛丽娜！”格奥尔基出人意料地喊道，“您看见窗户外面有什么？”他自己都搞不明白，他为什么提出这个荒唐的问题。

“我？……”姑娘的嗓音里流露出惊讶。“一座绿色的小平房……房子后面是教堂……”她小声说，显然是用手掌轻轻捂住了话筒，“再见，格奥尔基……不能再说了……”

只听见短促的嘟嘟嘟的终话声。

格奥尔基机械地挂上电话，擦了擦脑门，手直哆嗦。他用心不在焉的眼神扫视了一下前厅，努力集中思想，使自己从这次谈话中恢复平静。玛丽娜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在哪里？怎样才能把她找到？……不！见鬼去吧！星期日有什么了不起！……

他顿时怒从心中起，重又摘下话筒，连忙拨了电话号码。话筒里传来的是长音。格奥尔基一边急切地等着，一边用手咚咚地敲墙。“果不其然，他走了，”他愤然想道，“只顾自己休息，而这里……”他按了一下电话插簧，立刻又拨了另一个号码。但这一次干脆没人接。“他也不在班上。当然是休息了，”格奥尔基怀着幸灾乐祸的满足感断定说，“也许应该给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打个电话？”于是他开始第三次匆匆忙忙地转动拨号盘。

几乎一瞬间就有人接电话了。

“是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吗？”格奥尔基高兴地喊道。

“不是。您是哪一位？”

“我是乌尔曼斯基！”

“请您过一会儿再打电话，我们这里正在开会，对不起。”

“可是我……”

“对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坚决地又说了一遍。

谈话中断了。

哎，他们在开会！这里发生了这种事，而他们却在开会！那好！……

格奥尔基怒不可遏地扔下话筒，疾步回到房间。他的两手直到穿衣服时还在颤抖。在前厅里，他一边使劲地把大衣穿在身上，一边把父母房间的门稍微打开一个缝，看到了他们紧张不安的神色。

“我马上就回来！”他焦急地说，“就是说没准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说罢，他抓起帽子，砰地一声关上门，迅速跑下楼去。“一个叫乌尔曼斯基的人打来电话。”一个侦查员用手掌捂住话筒报告说。

罗巴诺夫摆了摆手：

“告诉他，正在开会。让他过一会儿打来。”沃洛佳·扎特金汇报了自己昨天的发现。

科尔舒诺夫讲了同塔玛拉的会面。

“我认为，安眠药……”罗巴诺夫说。

这时，乌尔曼斯基的电话打断了他的话。他不耐烦地回绝了这个电话，结束说：

“就是那个塔玛拉暗中投放的。”

“白天可能还有什么人来过。”赫拉莫夫像以往那样，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声色地说。

谢尔盖不禁暗自注意到，赫拉莫夫看来可能要跟领导争论起来。

“他不会把家门钥匙随便什么人都给的，”罗巴诺夫执拗地反驳道，“他对她信得过。”

“可是夜里有人来也带着钥匙。”赫拉莫夫毫不让步。

“既然她暗中投放了安眠药，她就已经把钥匙交出去了。”罗巴诺夫坚持己见。

但这时扎特金插话了：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他忍不住喊道，“允许吗，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

“说吧，说吧，什么细节？”

“你们听我说。枕头下边放了一盒安眠药。是这样吧？为什么放在枕头下边呢？怎么，他睡前要服安眠药吗？可是人们睡前服用的一般是戊巴比妥钠、苯巴比妥、巴尔巴米、麦地那，还有鲁米那。可是……”

大家的笑声打断了他的话。

“你这是给谁开药方呢？”罗巴诺夫惊诧地问，“你要把谁毒死呢？”

“我不久前去过医药管理局。我了解了一下，”扎特金不苟言笑地解释说，“既然我们碰到了这种事，与安眠药有关，那么我才这么说。”他重又起劲地接着讲道：“谢苗诺夫不可能服用这种安眠药。明白吗？就是说，那盒安眠药是偷偷给他放在那里的。我敢保证，肯定是偷偷放下的。而且干得很仓促，根本没有动脑子思考。他们还知道，谢苗诺夫不会躺下睡觉了。就是说，这盒安眠药不是暗中给他，而是给我们放下的。其目的是要把我们搞糊涂。”

“由此看来，那个塔玛拉把安眠药的事告诉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不是没有缘故的。”不知哪位侦查员插话说。

“就是嘛！”扎特金慷慨激昂地附和道，“总之……”他一时口讷起来，“我觉得这个会面十分可疑……”

笑声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

“不，其实，”扎特金一边尴尬地试图结束自己的话，一边不时望望面带笑容的谢尔盖，“因为……”

“说得对，说得对。这是令人怀疑的。”罗巴诺夫对他表示赞许，“总而言之，这个鬼丫头大有希望。比方说，关于谢苗诺夫自己给自己写的那封信。那么关于这一点，作出的鉴定明天将会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

“还有一个细节，”谢尔盖插进来说，“请大家注意。在谢苗诺夫家里没有发现乌尔曼斯基写给戈尔利娜的便条。看来，塔玛拉没有把便条交给他。”

“这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扎特金忍不住大声说，“我说的就是嘛！又是这个鬼丫头！顺便提一句，她可能把便条交到谢苗诺夫住宅前面的那所她经常出入的房子里了。”

“喏，这话怎么讲？”沉默寡言的赫拉莫夫说道。

“这么办吧，”谢尔盖果断地说，大家都不作声了，“您，沃洛佳，马上按照这个地址走一趟，查清什么人住在那里以及其它一切事宜。这是什么地方？”

“郊区的一条大街，”扎特金回答说，“奥尔洛夫大街，直通奥尔洛夫卡村。在市的另一端，正对着谢苗洛夫住的草甸大街。”

“原来这样。您去一趟吧。我好像得顺便去看看塔玛拉。应当把会面继

续下去，”他微微一笑，“我有好多问题要问她……”

电话铃声这一次把他的话打断了。罗巴诺夫拿起话筒。

“对！……啊—啊，是您呀？……什么？！……好，好，请等一下！让值班员听电话！……阿列克谢耶夫吗？立刻让那位同志进来见我。”

所有的人都静下来，困惑不解地倾听他的谈话。罗巴诺夫咔嚓一声挂上话筒，说道：

“是乌尔曼斯基。戈尔利娜刚刚给他打过电话。”

这一消息甚至震惊了赫拉莫夫，他用惊愕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眼。办公室里一时间鸦雀无声。

格奥尔基风风火火地闯进办公室，在门口停下来，对自己的冲动感到难为情。这里果真在开会。

“进来吧，进来吧。”罗巴诺夫迫不及待地对他说，“请您讲一讲，玛丽娜对您说了些什么？您请坐。”

格奥尔基轻轻把门关上，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那么，是这样，”他开口说，极力要平静下来，“这是一小时之前的事……”

他急急忙忙、语无伦次地说着，时不时地清清嗓子。后来，他仿佛忽然想了起来，贪婪地一边开始吸烟，一边继续说，所有在座的人都默默地听着。

“……她大喊了一声：‘哎呀，有人来了！’说完便把话筒撂下了。”格奥尔基一边激动地结束说，一边重新感受着这句短短的话。

“她究竟为什么给您打电话呢？”谢尔盖问。

“哎呀！”格奥尔基忽然想了起来，“她请求不要找她。可是这似乎有点儿难以理解。而且好像……”

“是啊，是啊，”罗巴诺夫若有所思地打断了他，“我认为，您今天应该好好待在家里。说不定她还会给您打电话。”

“应当去寻找她！”

“这事我们会办的，而您必须待在家里。”罗巴诺夫坚决地又说了一遍，好像下达命令似的。

谢尔盖赞许地点了点头。

“必须这样做，格奥尔基。说不定我们还会用得着您呢？”

“如果需要的话……我当然可以……”

当焦急不安的、异常突然地安静下来的乌尔曼斯基离开以后，谢尔盖说：

“请注意：她从窗户里看见一所小平房和一座教堂。”

罗巴诺夫懊恼地把手一摆。

“市里有不少于二十座教堂，教堂周围有数百座房子。可以从成千上百的窗户里看见它们。”

“况且她又是从五层或六层楼上看见的。”扎特金补充了一句。

“这么说对倒是，但毕竟挺有意思。”

会议结束了。扎特金外出执行任务去了，还有一个侦查员去叫塔玛拉——谢尔盖改变了主意，决定把她请到局里来。

罗巴诺夫说：

“是啊，我看这结子是越系越紧了。”

“我认为正好相反，”谢尔盖提出异议，“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即这结子眼看就要解开了。要知道，我们苦苦寻找的两条线索现在终于第一次切切

实实在在地交叉在一起了——我认为是谢苗诺夫和……普罗霍罗夫。”

“唉，现在要是能审讯谢苗诺夫就好了，”罗巴诺夫富于幻想地说，甚至搓了搓手，“我们来打个电话看看。”

然而，医院里通知说，谢苗诺夫仍然处于严重状态，尽管他的生命现已脱离了危险。

“这就很谢天谢地了，”罗巴诺夫放下电话说，“就是说，他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后来，朋友二人想起来他们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一口东西，甚至，说实在话，不是从早上，而是从昨天晚上。于是他们朝小卖部跑去，因为星期日食堂不营业。

当谢尔盖还在办公室里嚼着从小卖部带回来的夹肉面包时，一位侦查员朝门里望了一眼。

“班基娜来了，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谁？”谢尔盖乍一听没有弄明白。

“喏，就是塔玛拉。”侦查员淡淡一笑。

“让她进来吧。”谢尔盖一边说，一边把没有吃完的夹肉面包藏到抽屉里，急急忙忙地把桌子上的面包渣拂掉。

塔玛拉立刻走了进来，一副急躁愠怒的样子，身上穿着那件熟悉的皮大衣，没有系扣子，皮大衣下边现出带有艳丽的花朵图案的薄连衣裙。

“这是怎么回事，啊？”她立刻转入进攻，“怎么，您以为我有罪，对吗？您把形形色色的人统统派来好啦！……”

谢尔盖冷淡地、特别镇静地问道：

“您交代吗？”

“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昨天都告诉您了！我就知道，您现在要死死纠缠了！我知道！……只要和你们一沾上边就算完了！只要一挨上你们就算完了！……”

“就是说，您全都讲出来了，是吗？”谢尔盖依然镇定自若地反问道。

“那好。那我就请您回答几个问题。您坐下吧。”

塔玛拉在椅子上坐下来，两手紧按在胸前，哭哭啼啼地说：

“我对您干什么了？您干吗要折磨我？”

“您把写给玛丽娜的便条交给谁了？”

“您说什么呀？什么便条？”

她把两手举起轻轻一拍，显出一副非常惊诧的样子瞟了谢尔盖一眼，以致后者心想：“她可真会演戏。”

“就是格奥尔基交给您的那张。”

“天哪！我是为了安慰他，故意拿了那张便条。我谁都没有给！”

“便条在哪儿？”

“在哪儿？我扔了。”

“那好。这是第一个鬼话，”谢尔盖不动声色地确定道，“便条玛丽娜收到了，两个小时之前格奥尔基接到了电话。”

“是吗？……”

塔玛拉把眼睛睁得老大，吃惊地看了看谢尔盖。

“您要知道，她打过电话了。”谢尔盖重说了一遍。

“我什么都不明白。我亲手把它扔掉了。大概是谁把它捡走了吧？……”

“嗨，真有这种事？捡走了？那我倒要给您说说清楚了，”谢尔盖正严厉地说道，“您干扰了侦查工作。您提供的分明是伪证。您要注意，为此会受到惩罚的。”

“我怎么了，是小偷吗？是强盗吗？”塔玛拉刺耳地叫嚷道，“我没有偷东西！……没有抢劫！……我……我……”

她泪流满面，用哆哆嗦嗦的手打开坤包，取出手绢。

谢尔盖看了一眼她的手。她的手指修长而强健，指甲修饰过，十分亮泽。于是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

他站起来，朝办公室的一角走去，那边小柜上有一个装着水的长颈玻璃瓶，他倒了满满一杯水，走到姑娘跟前：

“喝口水吧，安静一下。”

她几乎是把杯子从他手里一把夺了过去，把水洒了出来，贪婪地咕嘟咕嘟喝了几口，然后把杯子放到自己身边的桌子上。

“您交代吗？”

“什么，您想要从我这里了解什么？”她一边用渐渐平静下来的口气问道，一边把手掌按在太阳穴上，“这简直是活受罪。我现在就觉得不舒服了……”

“您不想谈便条的事，那就说说您昨天到谢苗诺夫那里干什么去了？”

“我？……是他叫我去的！”

“去干什么？”

“取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谢尔盖自己都对自己的耐性感到吃惊。

“什么东西？……喏，那个……”她一时语塞，然后迅速地补充说：“针织服装，就是这东西。他给我买的，让我到他那里去拿。所以我就去了。您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拿给您看。”

“拿来给我看看。但要得到谢苗诺夫的证实才行。”

她的脸上好像第一次露出張皇失措的神色。于是她含糊不清地嘟囔说：

“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来证实呢……”

“会见分晓的，那么您给他带去的是什么呢？”

“我？……什——什么都没有带……”

“您好好想一想。”

“我说没有带就是没有带！……够了，不要对我没完没了地纠缠！我……我再也受不了了！……”

这场不连贯、混乱无序的谈话又持续了很长时间。塔玛拉一会儿满嘴粗话，一会儿歇斯底里地号陶大哭，一会儿抓住胸口，贪婪地喝水。她那红通通、汗涔涔的脸上流着虚伪的眼泪。她使自己紧张到如此程度，以致到末了，除了一些不连贯的叫喊，从她那里已经得不到任何东西了。

于是谢尔盖决定停止这场毫无益处的、使他所有的神经都感到疲惫不堪的谈话。他只觉得，他马上就要失去自制力了。

“算了，”他终于说道，塔玛拉立刻警觉起来，“您安静一下，回家去吧。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我们还要再见面的。您家里没有电话吗？要跑到拐角的自动电话亭去打电话？原来这样。今天您就不必跑出去打电话了。并且哪里都不要去。如果有人去找您……没什么，这不会是坏事……我希望，您

一切都清楚了吧？”

“再清楚不过了！……”

她从办公室里走出去，使劲把门弄得砰地响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谢尔盖叫来一名侦查员，给他指了一下塔玛拉刚才用过的杯子，抑郁不悦地说：

“把它送到科技处。它在两分钟之内告诉我们的将要比塔玛拉两个小时告诉我们的还要多。而主要的是，它将要告诉我们的都是真话。”

星期一早晨，太阳出来了，天气晴朗而寒冷。谢尔盖精神抖擞地徒步来到局里，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心里怀着急欲行动起来的强烈愿望。

他首先给科技处打了电话，了解到所有鉴定的结果将在中午之前做出。

随后，谢尔盖下楼来到二层刑侦处。他和罗巴诺夫一起听取了扎特金讲述他昨天的奥尔洛夫大街之行。

根据现已查明的地址，那里住着一个叫兹翁科夫·瓦西里·普罗科菲耶维奇的人，是航空站饭店的领班，他在休补假，已经两天没有在家里过夜了，不管怎样，左邻右舍这几天都没有看见他。因此，塔玛拉昨天来找谁，这尚不清楚。兹翁科夫是一个滑头滑脑、形迹可疑的人。沃洛佳不辞辛苦，到航空站跑了一趟，同饭店工作人员谈了一会儿兹翁科夫。同时，他当然还谈了许多其它情况，结果他的交谈者中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上来这个问题：警察局年轻而快乐的侦查员实际上需要从他们这里了解什么呢？沃洛佳从这些谈话中还得出一个结论：应当特别询问一下兹翁科夫过去的情况。至于奥尔洛夫大街上那所房子，沃洛佳慎重地围着它转了好几圈，不时地往窗户里探望和机警地倾听。他最后得出结论：房子是空的，里边没有人。

还在同扎特金谈话之前，罗巴诺夫就往医院里打了电话，询问谢苗诺夫的身体状况。他得到的答复仍然和昨天一样：危险脱离了，但病人极度虚弱。

同时得到报告说，先卡待在家里，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严格地执行着对他的指示。看来，科尔舒诺夫的谈话对他起了作用。

塔玛拉·班基娜的行为举止也无可指摘。只有一次，她泪痕满面，惊惶失措地跑到面包店里，并且那么老远地围着自动电话亭走了一圈，仿佛电话亭里已经布了雷，马上就要爆炸似的。顺便提一句，塔玛拉原来在兹翁科夫所在的那个饭店里当服务员。

后来，给罗巴诺夫送来一大包从莫斯科寄来的普罗霍罗夫的旧档案，于是他和谢尔盖把自己反锁在谢尔盖的办公室里，以便详细地、安静地熟悉一下这包材料。在罗巴诺夫的办公室里来做这件事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同事们一刻不停地朝里张望。

然而，朋友二人还没有来得及把这包材料的目录读完，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了。

“当然是找我，”罗巴诺夫发牢骚说，“难道能躲得过这帮机灵鬼吗？”

原来是局长打来的电话，找科尔舒诺夫。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政委声如洪钟，说话很有气派，“我这里有一位从莫斯科来的同志，是从戈尔利娜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单位来的。您是不是跟他谈一谈？”

“当然！”谢尔盖赶忙回应道，“他可以到我这里来吗？”

“好的，好的。我这就打发他去您那里。”

罗巴诺夫把摊在桌子上的材料收拾起来，一面走着，一面顺口说了一句：

“我暂时处理别的事情。事情积压得太多了！”就急忙离开了。

过了不一会儿，有人小心地、有礼貌地、平和地敲了敲门。

一个身材高大、渐近老境的人出现在门口，头戴灰色的卡拉库尔羊羔皮帽子，穿着灰色的、缝制的时髦冬大衣，配着也是浅色的卡拉库尔羊羔皮的窄领子。这人四方大脸，皮肤有点儿粗糙，两道浓眉长得很低，显得很严肃。

“是个严肃的同志。”谢尔盖心想。

那人不慌不忙地穿过办公室，跟谢尔盖握了握手，自我介绍说：

“我是索罗金。”

“非常高兴。请坐。”

索罗金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摘掉帽子，解开大衣，同时有所克制地微微一笑。

“你们这里有点热。”

“是啊，我们这里是热，”谢尔盖淡淡一笑，一边吸着烟，一边把一包烟隔着桌子递给索罗金，“请抽烟。”

于是他十分客气地咋哒一声打着了打火机。

索罗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拿了一支烟，对着了火，一股青烟从他鼻子里冒出来。

“关于戈尔利娜，您能告诉我们什么呢？”谢尔盖问。

“我首先要讲明的是，我为什么到这里来。”索罗金摇了摇头，小心地把烟灰弹掉，“我们那里对发生的这件事非常着急。我是顺路到这里来的，同志们让我来找您，讲一讲尼娜的情况，也就是戈尔利娜……”

“您为什么来找我们呢？”

“在莫斯科，警察局的同志来过我们那里了，说戈尔利娜在这里，在这个城市里被逮捕了。”

“假定她还没有被逮捕。”谢尔盖指出。

“那么，显而易见，她将会被逮捕的。”

“我们希望是这样。”

“您看，同志们对这件事都超前知道了。”

“好像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索罗金生硬地说，“那么您就应该知道您将要逮捕的
是什么人。”

“什么人？”

“诚实的人，绝对诚实的人。”

“可是她的钱不见了？并且她躲了起来？”

“正是这样——钱不见了。可是尼娜，她决不会拿别人一分钱。明白吗？一分钱都不会拿。她在我们单位工作了整整一年。我们大家都喜欢她，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

“可是钱毕竟不见了。应当把钱找回来。”

“说的就是嘛，应当把钱找回来。应该寻找窃贼，但不是尼娜。她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总会回来的。这事您就放心好了。比如说，她大概有什么私事。年轻人的事吗，您要知道。恋爱和别的什么事……总而言之，我们替尼娜担保。大家伙让我把这句话也转告您。”

“嗯，是啊，”谢尔盖沉思地说，“那么，假定是恋爱。您知道谁追求过尼娜吗？”

“我明白了，”索罗金冷笑了一下，“您又把这件事跟她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我再说一遍：您弄错了。就是情人，她也决不会把别人的钱送给他的。”

“请告诉我，尼娜好像没有父母，她是单独一个人过吗？”谢尔盖又问道。

“她是孤儿，”索罗金难过地叹了口气，“她学校一毕业就到我们这里工作了。她母亲是在同一年去世的。而父亲，她连记都记不得了。并且她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在不久以前，她好像有一个什么亲戚被找到了。”

“这亲戚是谁？在什么地方？”

“没人知道。在挺老远的什么地方，反正不在莫斯科。只是这一切，您要考虑到，极不可靠。”

“是啊，是啊，明白。”谢尔盖漫不经心地同意道。

索罗金详细地讲述了尼娜·戈尔利娜的女友和熟人的情况，以及她的善良和绝对的、有时甚至是天真的诚实。

谢尔盖聚精会神地在听他讲，连表都没有看一眼。末了，他问：

“万一有情况，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您呢，索罗金同志？”

“我住在熟人那里。我还要在那里待一天。请您把电话记下来好了。”索罗金欣然回答说，并忽然想了起来，说：“老天爷啊！我耽搁了您多少时间啊！而且我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办。”

谢尔盖把他送到门口，若有所思地回到桌子跟前。尼娜，尼娜……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小姑娘？要知道，我也认为这笔钱不是你偷的……可是谁把这笔钱偷走了呢？普罗霍罗夫？他怎么会遇见你呢？你为什么那样担惊受怕？为什么藏起来？是他把你吓坏了吗？可是你周围有的是好人啊。而且大家都喜欢你，我都看到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怎么会这样呢？你张皇失措了，不知你为什么事完全张皇失措了，不知你为什么事把自己吓唬住了。可是什么事，什么事呢？你现在在哪里？……

谢尔盖突然想到了乌尔曼斯基。不幸的小伙子。他昨天来讲自己同她的谈话时，是多么忧心如焚啊。他语无伦次，不停地咳嗽。谢尔盖还从未见过他这样失魂落魄的样子呢。是啊，他如此焦急，以致……

这时，电话响了。谢尔盖懊恼地蹙起眉头。不知一个什么念头在他脑海里萦回，一个有意思的念头……他几乎要抓住了什么……

局值班员打来的电话。

“中校同志，请接巴库专线电话。是伊布拉欣莫夫同志打来的。”

“我就去。”

谢尔盖急忙走出办公室，随手锁上了门。

看吧。他现在要听到的又是一个关于一个张皇失措的、脱离实际的人的故事。阿列克……还有尼娜。两个年轻人，十分年轻，他们被诱入歧途，吓唬他们，怂恿他们，把他们搞糊涂，这很容易……因为他们的性格中没有坚强的主心骨，没有牢固的道德基础，没有坚定的信念，所以也就没有对坏事的抵抗能力，没有与其进行斗争的准备。如果他们不遇到这种坏事或危险的事，那么他们会像从前一样是好人，而一旦遇到——却没力量，没有本事去战胜它，使自己坚持住。这是教育中的缺点，是现实生活悲剧的深刻原因。谢尔盖对这个问题做了多少思索啊……是啊，都是小青年，心里完全没有保护能力的小青年……

在值班室，谢尔盖急忙拿起电话。

“是谢廖沙吗？”他听见伊布拉欣莫夫愉快的、喉音很重的声音，“你好，亲爱的！有多少年我都没有拥抱你了，啊？这样的醇酒我要为我们的见面保存着！那么你现在叫我告诉你这个放荡的青年的情况。我的同事们已经对这件事做了一些工作……听我说，亲爱的。情况是这样的……”

“阿列克的家庭的确是一个优秀家庭。父亲是一位老石油钻探工，现已退休。哥哥也是一位石油工作者，工程师，他已成家，分开单过了。姐姐是医生，医学院刚毕业。阿列克是家里排行最小的。他到那里去参加高考，在那里留了下来，一面学习，一面打工。经常给家里写信。他在最近的一封信里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家里。”

“等一等，等一等，我记下来！”谢尔盖一边喊，一边打手势向值班员要纸，并突然惊讶地说：“啊—啊，这个我们知道……真有意思……”

伊布拉欣莫夫清清楚楚地报出奥尔洛夫大街的地址，让他记下来。

“你知道吗，亲爱的，我亲自看了这封信。一切准确无误。”伊布拉欣莫夫继续说，“他甚至把自己的房间也描述了一番，还有窗外的景致……”

“这封信还在你手里吗？”

“当然在！”

“请你把它给我念一遍，要是不麻烦的话。”

“好吧，亲爱的。我去拿来。”

不一会儿，伊布拉欣莫夫已经把阿列克的信念给他听了。应谢尔盖的请求，他把信中的一段话读了两遍……

“……写得很美，不是吗？”伊布拉欣莫夫结束时说，“现在是这样，我们把他在巴库的所有关系都查清了……”

没有，阿列克没有任何可疑的熟人。都是优秀的青年，个个都极其出色。而且他的表现也很好。那么当然，小伙子性子急躁，自尊心强……是啊，是啊，谢尔盖想象的也正是这样。周围都是好人的时候，他是好人，而一旦遇上坏人和……

“谢廖沙！”伊布拉欣莫夫热情地喊了一声，“喏，情况就这些。你什么时候休假？请到我家来做客，听见了吗？带夫人和儿子一起来！你们将是贵客！……”

于是谢尔盖笑着发誓说，他一定去。这个小伙子，伊布拉欣莫夫，多可爱啊，在那里，在巴库，他有多好的一帮同事啊。并且都精通业务。是的，他们对业务都很精通……

谢尔盖挂上电话，向值班员道了谢，朝自己办公室走去。

在伊布拉欣莫夫打来电话之前，他脑海里掠过的那个想法究竟是什么呢？一个有意思的想法……而且阿列克这封信……对，一定要……

但这时谢尔盖在走廊上看见扎特金急如星火地朝他迎面走来。他跑到谢尔盖跟前，激动地说：

“我正在找您呢。赶快到科技处去一趟。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吩咐要紧急找到您。”

“那里有什么事？”

“您马上就知道了，”沃洛佳调皮地笑了，“暂时不让说。”

“可是我从您的脸上已经知道了。”谢尔盖用与他相同的腔调回答说。

他们来到走廊的另一端，科技处就设在这里。沃洛佳推开了其中一个房间的门。

“请这边来。到维肯季·伊万诺维奇那里。”

这里是指纹鉴定化验室。三台显微镜固着在一个长方形的桌子上，玻璃下面的搁板上还有一些不知什么仪器，墙上挂着许多表格。

罗巴诺夫和维肯季·伊万诺维奇正在桌子旁边谈话。还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鉴定人员俯身在看显微镜。

罗巴诺夫看见了谢尔盖，振奋起来，招呼他到自己这边来。

谢尔盖这时才发现罗巴诺夫旁边桌子上摆着他已经熟悉的手枪、玻璃杯和留下不知什么人的清晰指纹的、发黄的、看来很陈旧的指纹图。

“哎，维肯季·伊万诺维奇，您再从头讲一遍吧，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来了。”萨沙请求道，并转向谢尔盖，补充说：“喏，有些发现我回头向你报告。”

手枪上原来有三个人的指纹，正如老鉴定专家推测的那样。其中一个人的指纹……是塔玛拉·班基娜的。

“……我们把您送来的那只玻璃杯上的指纹作了比较。”维肯季·伊万诺维奇解释说。

谢尔盖不由得微微一笑。

“另一个人的指纹正好与这些指纹相吻合。”维肯季·伊万诺维奇用谢尔盖的脑袋点了一下摆在显微镜旁边的陈旧的指纹图。

“普罗霍罗夫，”罗巴诺夫意味深长地插话说，“从他的案卷里取出来的。所以你的费奥多罗夫没有用了。”

“那么第三个人的……”鉴定专家继续说。

“是谢苗诺夫的。”谢尔盖很快替他把手说了出来。“错了！”

“不可能！”

“您看，完全可能。谢苗诺夫根本没有碰过手枪。”

这竟如此出乎意料，以致谢尔盖不自觉地看了罗巴诺夫一眼，仿佛在寻求他的支持。

“偷偷放下的。”罗巴诺夫认真地说。

“谁？”

“塔玛拉·班基娜，”罗巴诺夫说道，好像对什么事早已有了决断，“再没有人了。”

他有时对这一切做缜密思考。

“那么第三个人，第三个人是谁？”谢尔盖叹了口气，“既然是班基娜暗中放下的。而她……等一等，等一等……”他振奋起来，“班基娜当然没有把手枪保存在自己手中。并且她没有携带手枪上街。那天，她去过费奥多罗夫家里，后来又对市场去找谢苗诺夫，再后来又找过兹翁科夫，可她马上离开了他那里……”

“正是这样！”罗巴诺夫立刻猜出了他的思路，“她从兹翁科夫那里得到了它。而后者多半是从普罗霍罗夫那里搞来的。”

这样一来，手枪被暗中放在了谢苗诺夫家里。某人打定主意要跟谢苗诺夫算账，要把一切嫌疑、一切罪证转嫁到他头上。这个“某人”看来就是普罗霍罗夫。并且他手中的工具——仅仅是工具——就是塔玛拉·班基娜。“喏，等着瞧吧，”谢尔盖想道，“我现在要换一种方式跟你谈话。”

“谢谢，维肯季·伊万诺维奇。”罗巴诺夫说道，并转向谢尔盖，补充说：“应该到笔迹学专家们那里去一下。他们已经打电话来了。”

他们来到走廊上，但对面的门是关着的。

“唉，”罗巴诺夫叹了口气，“他们吃饭去了。我们也得去吃饭了。你顺便讲一讲伊布拉欣莫夫报告的情况。你有没有想到代我向他问个好吗？”

下楼时，谢尔盖又试图回忆起在伊布拉欣莫夫打来电话之前他脑子里闪过的念头。他当时在思考什么呢？好像是关于尼娜，关于她的命运，关于不知是谁把她欺骗了，把她吓唬住了……不是，不是。这个他已经想过了。对，他想的是尼娜。一个刚刚十九岁的姑娘。怎么能录用这样的出纳呢？不过诚实并不是年龄的概念。是啊，但她天真幼稚，容易轻信，缺乏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终究会过去的……哎，见鬼！他又想偏了……总之，他想的是尼娜……还有对她献殷勤的那些人……于是……当然！……他想过乌尔曼斯基！他在转述自己和尼娜的通话时是那么激动，而且一直咯咯地咳嗽清嗓子。是这样，是这样。还有阿列克的信。还有那个地址！对！应当跟格奥尔基再谈一次！……

他如释重负地喟然长出了一口气，以致走在旁边的罗巴诺夫不禁瞟了他一眼，问道：

“你怎么了？”

“是这样，”谢尔盖微微一笑说，“我想起点事。真费劲，左思右想，最后总算想起来了。你有乌尔曼斯基的电话吗？”

“有。”

可是午饭以后，他们和扎特金一起先到科技处去了。扎特金简直急得要死。

“我敢保证，谢苗诺夫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写信！”他激动地说着，身子老是往前冲，三个人一起走在走廊上，“我保证！她撒谎！……”

“那么就是说，写信的是阿列克了，”罗巴诺夫说着，不时笑笑，“依你看，还会是谁呢？”

“在这方面，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我有……”

这时他们来到化验室门口，沃洛佳猛一使劲把门打开了。

高级笔迹学鉴定专家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写着鉴定结论的纸，递给罗巴诺夫。

“请您过目。都写在上面了。”他持重地说。

这份鉴定证实，写给谢苗诺夫的那封信的笔迹同谢苗诺夫本人的笔迹，同阿列克·加米多夫写的声明的笔迹，根本对不上。

“这正是目前需要加以证实的。”罗巴诺夫看过结论以后说，并望了扎特金一眼。

“顺便说一下，”鉴定专家提出，“这个案子的另一份鉴定我们也做出来了，你们取走吧。”

“什么鉴定？”罗巴诺夫感到很惊讶。

“上星期交给我们的。对发往伏尔加格勒的电报、信件和旅馆住宿登记卡的笔迹进行了比较。记得吗？”

“啊—啊。记得，记得。那就交给我们吧。”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上边的笔迹是出自一人之手吧？”谢尔盖问道。

“对。看来是普罗霍罗夫的笔迹。”罗巴诺夫一边证实，一边把写着鉴定的纸放回文件夹里，第一份鉴定已经放进去了。

“慢，”谢尔盖拦住了他的手，“我想请您，”他转向鉴定专家说，“把

这个笔迹和写给谢苗诺夫的信做个比较。现在就做。这不难吧？”

“我试试看。”鉴定专家不置可否地回答说。

这的确不难。鉴定专家只看了一眼，便说：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需要把这个作为正式的鉴定给您写出来吗？”

“不，不，不必了。”谢尔盖摆了摆手，愉快地看了扎特金一眼，“明白了吗，沃洛佳？”

沃洛佳困惑不解地耸了耸肩膀。

“说真的，不太明白。”

“是这么回事：傍晚之前我需要拿到兹翁科夫的笔迹样本。现在清楚了吗？”

“您以为……”

“不是我以为，而是我推测。”说罢，他转向罗巴诺夫，急不可耐地说：“你把我们的朋友的电话给我。”

……谢尔盖拨了无数个编辑部的电话寻找乌尔曼斯基，后者刚一接到电话，立刻就飞奔前来。

他还没有跨进门，便迫不及待地问：

“找到了吗？……”

“会找到的。”谢尔盖回答说，自己都对自己声音里表现出来的果断感到吃惊。

乌尔曼斯基沉重地在椅子上坐下来，把帽子从头上拽下来，心不在焉地揩了揩汗津津的脑门，然后警觉地看了谢尔盖一眼：

“您叫我来干什么？”

“就干这个……需要把情况再回忆一下，”谢尔盖故作从容地说，“只是这一次要冷静地回忆，不要着急，不要老是咯咯地清嗓子。”他微微一笑说。

“好吧，”乌尔曼斯基叹了口气，“如果需要，那就开始吧。”

他是那样沮丧，甚至对谢尔盖这句玩笑话都没有反应。

“那么您抽支烟，把思想集中一下，把您和……玛丽娜的全部谈话，这次要一字不差地重新向我转述一遍。”

谢尔盖差点儿说出姑娘的本名，这个现在千万说不得，现在决不能以任何事情，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使乌尔曼斯基分心。倘若他知道了尼娜用的是别人的名字……

这时，格奥尔基把大衣解开，在沙发椅上坐得更舒适些，点上烟吸起来。他沉默了一阵，凝神观察着颤动的烟雾在空中渐渐消散。

“那么，是这样……”他终于开口说道，“我说：‘喂！’她问：‘是格奥尔基吗？’我喊道：‘对，对。是我！’您明白吗，我一下子就听出了她的声音。她的声音我还会……”

“我明白，说下去。”

“后来……我问她：‘您在哪儿？’她回答我说……不，她对我说：‘我收到您的便条了。’而我重又问她：‘您在哪儿？您从什么地方打来电话？’这时她回答我说：‘我不知道。’静得几乎能听见……”

乌尔曼斯基神经质地深深吸了一口烟，一时不说话了，用手指弹了弹桌沿。

谢尔盖等待着。

“那么，” 乌尔曼斯基又说起来，“于是我问：‘您怎么会不知道呢？’ 她的话简直使我慌了神。我……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想！” 他的声音突然变了调，于是他神经质地咳了几声清鼻涕，“我无法平静地回忆这个！我办不到！她肯定出什么事了！您明白吗？……”

谢尔盖懊恼地摇了摇头。

“要平静，格奥尔基，这样不行。您在阻碍我，而不是帮助我。当然啦，我试图把她说的每一个字和其它许多事实联系起来。可您在阻碍我。我现在不管您的心境和推测。您明白吗？我需要知道她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就这些。”

“是，是。对不起。” 乌尔曼斯基负疚地含糊不清地小声说。

“那您就接着讲吧。您刚才说：‘您怎么会不知道呢？’ 她怎么回答您？请您冷静地回忆一下她是怎么回答您的。”

“她回答说：‘我在一座房子里……地址我不知道。’ 这是她的原话。于是我说：‘您先快点回家吧！’ 您明白吗？我是想……”

“我明白。请说下去。”

“她……她说：‘我不能回去。’ 她害怕了，怕极了。她听见有人来了。她就是这么说的：‘有人来了！’ 说完就把电话撂下了……啊，不，她还说：‘您不要再找我了。’ 要知道，这仅仅……”

“她就这样把电话撂下了？甚至没有道别吗？”

“不，她说：‘再见，格奥尔基。不能再说了。’”

“这句话是紧接着‘您不要再找我了’之后说的吗？”

“是的……啊，不，” 乌尔曼斯基愧疚地笑了笑，“我还是太激动了。”

“是啊，是啊。我也很激动。” 谢尔盖点了点头，“您现在想起来什么了？”

“我向她提出了那个愚蠢的问题……”

“在说了什么话之后提出来的呢？”

“说了‘我想告诉您，您不要寻找我了’之后提出来的。”

“那么她是这么说的吗？”

“对，对。这是原话。”

“那好。您现在再说一下，您提出了什么问题？”

“我问她现在从窗户里看见什么了……”

谢尔盖饶有兴趣地看了乌尔曼斯基一眼。

“您为什么问这个？”

乌尔曼斯基困惑地耸了耸肩膀。

“我自己也不知道。”

“她怎么回答的？”

“她说她看见一座小平房……哎呀！一座绿色的小平房。平房后边是一座教堂……”

激动攫住了谢尔盖，使他愣了一下神儿，他勉强克制住自己，嗓音有点儿嘶哑地问：

“这个您……记确切了吗？”

“当然！”

“是这样。后来呢？”

“后来她说：‘再见。不能再说了。’ 就把电话撂下了。”

“假设她听见有人走进住宅，”谢尔盖心想，“才立刻把话筒撂下了。说：‘哎呀，有人来了！’然后立刻撂下了话筒。但这时……就是说，她没有听见……就是说，她看见了……从窗户里看见了……从窗户里……”

他突然拿起电话，急忙拨了号码。

“罗巴诺夫吗？……是我！赶快派车！我们即刻出发！你、我……扎特金在吗？……还有他！还有乌尔曼斯基。他现在在我这里。赶快！路上我再解释！”

……汽车刚一启动，谢尔盖便对司机说：

“鸣警笛。”

罗巴诺夫和扎特金彼此递了个眼色。

汽车在市内大街上风驰电掣般地疾驶，沙哑地在十字路口滴嘟滴嘟鸣响，迫使前面的汽车迅急闪开，刹车在急转弯处发出刺耳的尖声，使汽车拐到了旁边，于是他们四位乘客七倒八歪，相互挤压在一起，不满地小声骂人。他们对这样疯狂的速度早已习以为常，现在支配他们的惟有一个愿望：快点！再快点！

他们终于驶入奥尔洛夫大街，大街上阒无人迹，静悄悄的，堆着一个个大雪堆。这时，扎特金指着低矮的木板围墙后面的一所小房子，急匆匆地说：

“瞧，就是那个……”

汽车拼命地吼叫着，不停地陷进一个个很深的坑洼中，艰难地爬到房子跟前。

谢尔盖、罗巴诺夫、扎特金和乌尔曼斯基踏着几乎深及膝盖的积雪，吃力地来到围墙跟前的一条小路上。

扎特金赶在大家前头，推开了没有上锁的围墙门。于是他们四人迅速地朝坐落在庭院深处的小房子走去。

“沃洛佳，你走一圈看看，”谢尔盖吩咐说，“那里肯定还会有一个出口。”

扎特金一步一滑地往前跑去，消失在房子拐角处。其余的人登上了台阶。门上装着黑色胶木圆圈的门铃。谢尔盖按了一下白色按钮，然后带着一丝浅笑望了望乌尔曼斯基。后者心慌意乱地在小小的台阶上转来转去，不知把手放在哪里才好：一会儿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一会儿交叉起来背在背后。

房子里好像一切都死绝了。谢尔盖又按了一次门铃，随后使劲敲了敲门。门里边终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一个惊惶不安的女人的声音问道：

“谁呀？……”

“请开门，尼娜，”谢尔盖高声说，“是我们。”

“啊！……可是……可是我没有钥匙……”

乌尔曼斯基惊诧地小声说：

“哪个尼娜？”

“别说话。”站在他身后的罗巴诺夫打断了他。

“没有钥匙？”谢尔盖又问了一遍，“那么后门，厨房的钥匙有吗？”

“哎呀！……那里好像有……”

门里边响起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走，到那边门口去，”谢尔盖指挥道。“你，”他看了罗巴诺夫一眼，“你暂时留在这里。我马上派沃洛佳过来。”

罗巴诺夫默默地点头作答。

谢尔盖和乌尔曼斯基从台阶上跳下来，几乎跑步绕过房子。他们在那里看见了扎特金，后者把右手插进大衣口袋里，正在警惕地注意倾听什么。他看见了谢尔盖，含有警告意味地向他摆了摆手，往门上指了一下。这时，门缓缓地打开了一点，扎特金纵身闪到一旁，从口袋里拔出了手枪。

一个围着宽大的黑色披肩、身材瘦削的女子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乌尔曼斯基急切地向前冲去，但谢尔盖一把拽住他的袖子，阻止住他，用严厉的、不容反驳的语调说：

“您留在这里，我一个人进去。”

房间很大，空荡荡的，窗户上挂着窗帘，遮挡得严严实实的，天花板下边，长长的电线上吊着一盏带布面大灯罩的灯，光线十分黯淡。角落处更是一片昏暗。在没有铺桌布的空桌子上，在淡黄色的光圈里，放着一本打开的书。

尼娜一边怕冷地裹紧披肩，一边走到桌子跟前，害怕地看了谢尔盖一眼。谢尔盖特别表现出干练地说：

“坐吧，尼娜。有个事我得告诉您。”

她默默无言地在椅子边上坐下来。这时谢尔盖才发现她的脸消瘦了，眼眶发黑。

“是这样，”谢尔盖一边接着说，一边也靠近桌子坐下，机械地吸着烟，“您工作单位的现金柜里有一万一千二百卢布不见了……”

尼娜突然喊叫了一声，用手轻轻捂住了嘴。

“是啊，是啊，我知道，”谢尔盖点了点头，竭力说得镇静自若，“这笔钱您没有拿。可是您拿过多少？为了什么？”

姑娘没有回答。她愣了一会儿，恐惧地望着谢尔盖，把手捂在嘴上，仿佛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尽管她心里堵得出不来气。

“为了什么呢，尼娜？”谢尔盖又说了一遍，“您要钱干什么用？”

“一万一千……”姑娘终于喃喃地开口说，“就是说……可是我……我的钱……差了……”

“差多少？”谢尔盖快速地问。

“二百四十……我统统都对您说了吧……”她十分激动地说，“我要把一切都讲出来……他起先拿走一百……吩咐开一张借款单据……他答应两天以后还回来。他说他女儿生病了，需要给她寄钱……他还哭了……后来他又拿走一百……并且让我拿四十，给自己买一件大衣……因为天气非常冷了……他说：我将从工资里还……并且我也拿了……又开了一张借据，一百四十卢布的借据……后来……他说，明天要进行财务大检查……说他把钱还不回来……而我……我将会为此而坐牢……说我应当躲一躲……他会帮我的……并且给了我一张别人的身份证……”

“当您躲起来时，”谢尔盖总结说，“他把现金柜里所有的钱都偷走了。嫌疑自然落到了您头上。这正是他打的如意算盘。顺便说一句，根本没有进行财务检查。”

他内心充满了对干出这一切卑鄙勾当的那个人的刻骨而无奈的仇恨，说无奈，是因为要去保护这个姑娘，使她免遭那个人给她带来的这一切痛苦，免遭她从莫斯科逃跑以后在这些漫长而没有尽头的日日夜夜里所经受的那种恐惧和那些痛苦，而这些他已经办不到了。他胸中翻滚的这股仇恨影响了他的谈话、思考，影响了他的呼吸。他不记得，他曾几何时还有过类似这样的

感受。

“您怎么能相信他呢？……那里有多少人都喜欢您啊，尼娜。我知道……”他克制住了自己，换了坚决的、威胁的语调说：“他会为此受到惩罚的。他是谁？”

“他……他是我的上司。”

“我懂了。他叫什么名字？”谢尔盖匆匆打断了她的话。

“普罗霍罗夫，普罗霍罗夫……”他的太阳穴怦怦直跳。是的，尼娜现在应该说出这个姓氏了。普罗霍罗夫肯定是会计。奇怪的是，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同事们为什么没有发现他……

然而，尼娜说出的完全是另一个姓氏。

在最初一刻，谢尔盖惊诧得差点儿叫起来。他好不容易才按捺住自己。就在这同一时刻，他全明白了。他对这个人的阴险狡诈重又感到十分惊讶。但现在惊讶已经干扰不了他了。谢尔盖迅速而坚决地问：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他吩咐我在这里等他……他许诺要来接我的……”尼娜微微翕动着发干的嘴唇，低声说。

“那个兹翁科夫在哪里？”

“他在上班。”

“他不在那里……他们溜掉了。他们抛下您，溜掉了。看来，不知什么事把他们吓跑了……不过……不，那是另一回事……”

谢尔盖陷入了沉思，他用手摸了摸脑门，仿佛要把妨碍他的东西驱走，并终于说道：

“这样吧，您不必待在这里了。”他发现她眼睛里掠过一丝惊恐的神情，急忙补充说：“没有人打算拘捕您，把您关进监狱。没有一个人这样想。可是瞧您现在这样子，其实就是被关进了监狱！”他甚至强使自己微笑了一下，“假如您愿意的话，您就回费奥多罗夫那里去吧，您要是愿意，回莫斯科也成。”

“不！……”

“那好极了。您回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和加利娜·扎哈罗夫娜那里去吧。他们非常喜欢您。什么话都不必对他们讲。您本来想要离开，而现在改变主意了，就这些。而且他们什么都不会问您。我会这样向他们建议的。那么以后，等一切都了结了，您亲自告诉他们……”

他苦口婆心地说着，不单是用话语，而且用令人振作、充满信心的声调极力使尼娜安静下来，相信他。

不，现在不能对她进行审问，甚至她作为证人也不能对她审问，不能硬让她回忆发生在她身上的这件事的全部细节。她的神经现在承受不住这个。除此之外，一切最重要的东西谢尔盖已经掌握了。而主要的是——他，那个人。所以应当在这里，在这个城市里，把他抓起来。尼娜在这方面什么忙也帮不上。那么以后她会把一切都讲出来，协助把他揭发出来。但这是以后的事。而目前……

“那么，尼娜，您决定了吗？您暂时住在他们家里。还有……”谢尔盖微微一笑，“格奥尔基什么也不知道，眼下也不必知道。也许应该告诉他，您不是玛丽娜，而是尼娜。也许现在连这个也不需要告诉他？比如说，我说的这些都不对。”

他感到欣喜的是，他能够使她把注意力转移开，使她去考虑别的、次要的事。

“不，就让他叫我尼娜吧。”姑娘几乎恳求地说。

“好极了。那您要擦干眼泪，离开这里。知道吗？您要笑一笑，一切最可怕的都已经过去了。您相信我吗？”

这时尼娜点了点头，含着眼泪冲他笑了笑。

……兹翁科夫家里设下了埋伏。加强了对塔玛拉·班基娜的监视，费奥多罗夫得到了预先通知。以赫拉莫夫为首的行动小组赶赴航空站。

谢尔盖紧急打电话给莫斯科。格朗宁对他提出的问题着实吃惊不小。

“你怎么搞的？”他愤愤地回答说，“你还不了解咱们的小伙子们吗？当然，谁都不会把这个说出去。”

“我本来也这么认为，”谢尔盖回答说，“不过采取保险措施从来不会有碍。祝你健康。我就等着照片啦。”

接下来他打了一个市内电话。

“是的，”电话里回答他说，“东西在这里……好像是明天早晨……”

行动小组立刻又出发到另一个地方。

与此同时，谢尔盖正在和伏尔加格勒进行紧急通话。

普罗沃罗夫中校向他保证说：

“请放心吧。傍晚之前你肯定收到。总之，我很快会赶到莫斯科，我们会见面的。我非常想你，你这小子。”

又过了一个小时，莫斯科发来了所需要的传真照片。马上进行了复印。黄昏之前，市警察局数百名警察都收到了复印的照片。没有一个人离岗去休息。那还用说！市里隐藏着一个危险的犯罪分子！

地段民警纷纷前往各自的辖段。火车站、航空站、公共汽车站、饭店、咖啡馆、旅馆都被监视起来。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出租汽车的司机都看见了照片……

全城都警戒起来了。

这时，又收到伏尔加格勒传来的一张照片。

罗巴诺夫来到科技处，把三张照片摆在鉴定专家面前。

“您看，”他说，“这第一张照片是一九三九年在教养院拍的，第二张是一九五九年在伏尔加格勒拍的，第三张是一年前在莫斯科拍的。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三张照片拍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而这时，一个身量不高的人正坐在谢尔盖的办公室里，只见他穿着破旧的大衣，一脸疲惫，两手沾满了油污。

“……把我折腾得够呛，该死的，”他一边说道，一边难为情地斜眼看着自己的手，“真是没有一点情绪跑车。”

“没什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谢尔盖愉快地回答说，“我们将会替您讲情的。那么，您说您第一次把他拉到了机场，是吗？这是三个星期之前的事？”

“对……”

“您让他在什么地方上的车？”

“在奥尔洛夫大街。我记得，我还在那里，在自己的车里待了老半天，险些误了飞机。前不久他又坐了我的车，正好跟这个小伙子一起。”他点头指了指摆在他面前的阿列克的照片。

“这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就是上星期一。已经是傍晚了。我记得，我停在旅馆旁边。我看见他从旅馆里走出来。知道吗，他几乎是跑着出来的。我心想，他要叫车了。我正好打算拉最后一趟就收了。可并不是这样，他没有要车。他慌慌张张地徒步跑走了。那么我又待了一小会儿，径自开车走了。可是过了大约两个街区，他向我招手停车。就是说，他这时已经跟这个小伙子碰上头了……”

“上星期一，傍晚，”谢尔盖暗自留意道，“正是那天晚上在旅馆里……他将会矢口否认他那天晚上去过旅馆，肯定的。但现在——决办不到：有活生生的证人在这里……”

“……他那一次使我产生了怀疑。”司机最后说道。

“为什么？”

“我弄不清楚他是什么人。说是什么人又不像什么人，不伦不类的。而且好像有什么提心吊胆的事。他又是那么慌慌张张的。没有到达所要去的地址，他们就提前下车了，拐了个弯儿走了。那么我开车慢慢向前移动，看见他们进了一座院子。”

“这是在什么地方？”

司机十分有把握地说出了地址。

“他们是来找塔玛拉的。”谢尔盖心想。

后来，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科洛斯科夫出人意料地打来电话，不好意思地说：

“看在上帝面上，对不起……可是……您知道吗，我要走了。所以我想……可以说，告个别吧。而且十分感谢……您给我们安排了那么好的房间。”

“哪里话，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这是我们应该为你们……”

“不，不！……”科洛斯科夫立刻打断了他，“这怎么行呢！我和杜布科同志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可以说，尽自己所能吧……顺便提一句，他也要走了，也想以某种方式……表示一下感谢之情。对了，还有……也许您肯赏光记下我在莫斯科的电话？以备万一，您知道……”

晚上很晚的时候，通过鉴定得出结论：三张照片上所拍的均系同一个人——普罗霍罗夫。

“这正是需要加以证明的，”罗巴诺夫十分满意地确认道，“可见这件事我们做得很精确。”

午夜十二点多钟，接到报告说：兹翁科夫刚一回到家就被逮起来了，他没有抵抗。从他身上发现大剂量的安眠药。可以致死的剂量！在这段时间之前，扎特金已经搞到了他的笔迹样本，结果查明，给谢苗诺夫的信是兹翁科夫写的。

总之，事实在一个接一个地澄清了。在复杂的案件中，向来都是这样。开头，一切都不明确，到处抓瞎，要获得每一条线索都得付出极大的努力，尽管如此，它，这条线索，还时时中断或偏离方向。而人们遭受的痛苦就摆在面前，它要求做出惩治，催促将坏人绳之以法。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必须绷住神经，不能瞎忙，不能分散注意力，不能绝望，而要回过头来，重新寻找。这是最困难的。可是以后，会终于走上正确道路，事实仿佛亲自找上你的门来，乍一看好像觉得：当初寻找它们是值得的，这些事实原来竟这样明

摆在那里。未了，油然产生出一种欣喜的感觉，即欣喜所找到的道路是可靠的。这种感觉会犹如奖赏一样渐渐消失，代之以精疲力竭的、令人不安的寻找和伴有疏漏和错误的不间断的等待。

总之，午夜十二点多钟，兹翁科夫被抓起来了。

审讯兹翁科夫的是罗巴诺夫。

兹翁科夫穷凶极恶，异常激动，全然失去了自己平常昏昏欲睡的忧郁，他拒绝回答看来是最无恶意的问題。

“您的姓氏、名字、父称？您到底说还是不说？”罗巴诺夫不耐烦地问，被捕者愚蠢的顽固更加使他怒不可遏。

“不想说……”

“兹翁科夫是您的姓，您显然知道？”

“不想说……”兹翁科夫愁眉苦脸地继续重复说。

“那好。您可以不说您的姓名。顺便提一句，您的工作单位您也可以不说。所有这些都知道了。而且还有其它许多事情也可以不说。但是您的安眠药哪儿来的，谁给您的，这个必须交代。”

“我不想说……”

罗巴诺夫以审视的目光看了看他那阴沉的、没有刮过的脸孔。

“那好，”他慢条斯理地说，“那么我来告诉您。您害怕了。您害怕说出……普罗霍罗夫……是这样吗？”

兹翁科夫低下头，一言不发。

“而且您还害怕说出他为什么给您这安眠药，”罗巴诺夫越来越感到义愤填膺地接着说道，“这更糟糕，兹翁科夫，这对您来说更糟糕。”

“再糟糕不过了……”兹翁科夫含糊不清地小声嘟哝说，没有抬头。

“也好，我们先不谈这个。您说，普罗霍罗夫现在在什么地方？”

兹翁科夫默默地耸了耸肩膀。

“这个您也不想说，是吗？”

兹翁科夫突然抬起眼睛望着他。这是一双浅色的、忧郁的、疲惫不堪的、完全是老年人的眼睛。

“要是依着我……尊敬的……压根儿就没有他这个人才好呢，”他叹了口气，慢吞吞地说，“他强迫干那种伤天害理的勾当，真是伤天害理，我才不干呢。”他无精打采地把手一挥，“硬逼着年轻人去干，缩短年轻人的生命。”

“缩短？”罗巴诺夫威胁地重问道，“他大概想把谁彻底干掉吧？他这一次是假他人之手，啊，兹翁科夫？”

“这个他也干。”兹翁科夫不由得点了点头。

“那么他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兹翁科夫突然冲动地说，“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他决不会乖乖地向你们就范的。他决不会。要知道，他反正无所顾忌了。已经豁出去了……就是这么回事。还有……”他张望了一下，压低嗓音，几乎小声说道：“他有手枪。这手枪杀害了六条人命。明白吗？”

兹翁科夫被带走了。

罗巴诺夫上三楼来找科尔舒诺夫。他正在打电话，但是看见罗巴诺夫走进来，匆匆忙忙结束了通话，朝朋友转过身来，问道：

“情况怎么样，萨沙？”

罗巴诺夫疲倦地擦了擦脑门，把审讯兹翁科夫的情况讲述了一遍。

“是啊。手枪，可见……”谢尔盖沉思地说。

“其实，他好像并没有离开。”

谢尔盖焦急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并对坐在长沙发上的罗巴诺夫说：

“你要明白，他现在无处可跑了。他在这里的全部联系已经被切断，所有去处被关闭，一切出城口被封锁。他能往哪里跑呢？”

罗巴诺夫表示赞同地点了点头，长出了一口气，说道：

“情况当然是这样。只是这么等下去实在受不了。”

“那你就去睡觉吧。明天还是一天。”

“真有你的！你自己去睡吧。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睡得着。”

后来他们喝着暖瓶里的浓茶，重又不停地吸烟。

大约夜里三点钟，他们憋不住了，驱车赶往航空站。他们一边和沉默寡言、衣着整齐的赫拉莫夫一起围着候机大厅转了一圈，一边仔细审视打盹儿的、乘坐早上航班的乘客们的脸，来到飞机准备起飞的加油坪、调度室，仔细检查了空荡荡的饭店，甚至厨房和贮藏室。

“真奇怪，他没有来这里过夜，”罗巴诺夫说道，“莫非他感觉到什么了？”

“未必，”谢尔盖回答说，“他不一定知道。”

但是，焦急不安始终在困扰着他。

凌晨，他们回到了局里。值班员高兴地通知说：

“五一大街的行动小组发现了目标，中校同志。”

谢尔盖和罗巴诺夫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

“好。”谢尔盖果断地说，并转向值班员，补充道：“请通过无线电台转告：全体人员可以撤离了。五一大街的行动小组将按指示行动。”

谢尔盖离开值班室，来到昏暗的，仍然是夜色朦胧的走廊里说道：

“这样吧，萨沙。你现在听我说。我今天乘飞机回去。你们提出起诉，你们也要进行侦查。今天就可以逮捕塔玛拉。她的角色现在已经清楚了。兹翁科夫介绍她认识了普罗霍罗夫，而普罗霍罗夫又介绍她认识了阿列克。谢苗诺夫通过她把身份证送给那个普罗霍罗夫。谢苗诺夫本人不认识普罗霍罗夫。但他在这上面狠狠赚了一笔。就是她领着普罗霍罗夫的那伙人去接大麻膏的供应者的。但是大麻膏仍然在谢苗诺夫手里。他们对他下手了，没有办法，他跑来找我们了。就在这时，塔玛拉偷偷给他投放了安眠药。同时，普罗霍罗夫暗中派她来找我。其目的就是要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死人谢苗诺夫身上，正如他们打的如意算盘那样，并把一切都嫁祸于他。等这个坏蛋一出院，立刻对他进行逮捕。通过他应当找到大麻膏的出售者。这件事非常重要，并很危险。”

“而且也非常特殊。”

“说得对。也非常特殊。要对他进行单独审理。这件事多半不是你们来做。但是线索将从这里，从谢苗诺夫延伸开去。一条重要的线索。”

罗巴诺夫皱了皱鼻子，狡黠地看了谢尔盖一眼。

“顺便说一句，你要查办有意思的案子了吧，啊？”

“‘有意思的’，话不是这么说。”谢尔盖摇了摇头，蹙紧眉头补充道：“那么这个以后再谈。现在还有一件事。你要把戈尔利娜保护好。不要让她

受到陷害。她的罪是很轻的，可是现在将会有人陷害她。所有的人，不管是普罗霍罗夫，还是兹翁科夫，抑或塔玛拉。你会看到的。”

罗巴诺夫淡淡一笑。

“你这纯粹是在立遗嘱，分遗产。请放心吧，一切都会办得最好。真不愿意让你走。”

“是啊，抛下你，让你去冒危险，当然，不能给你丝毫帮助。”谢尔盖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

“算了，算了，算了！”罗巴诺夫气愤地说，“您不要太想入非非了，中校同志！没有您我也照样……”

谢尔盖笑了起来。

“感谢上帝！我就喜欢你这样！顺便提一句，遗产我也有一份。”他脸上现出阴郁的神情，“回到莫斯科以后，我得把费奥多罗夫的事情妥善解决一下，无论如何要解决好。你要知道，这件事让我寝食不安，真的。”

他们来到办公室，刚喝了一杯茶，便有人敲门了。

“进来！”谢尔盖喊了一声，骤然色变。

怒气冲冲的索罗金出现在门口，他戴着灰色卡拉库尔羊羔皮帽子，穿着灰色大衣。

“可以进来吗？”

“不但可以，甚至需要。”谢尔盖应了一声，从桌子后边走出来。

索罗金一边急忙走上前来，一边伸出手。

“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科尔舒诺夫同志！一定是搞误会了！突然想起把我……”

但是他的手悬在了空中。

谢尔盖用沉痛的眼神打量了一下来者，心中暗想，罗巴诺夫站在那里是对的，同时冷淡地问道：

“您认为怎么称呼您更好呢，索罗金还是普罗霍罗夫？”

由于意外，来人打了个哆嗦，企图后退，但他的背却撞在罗巴诺夫身上。又有两个侦查员走进办公室，其中一个手里拿着索罗金的皮包。

谢尔盖若无其事地接着说：

“看来，还是称您的老姓好一些。您不反对吧？至于您如何弄到写着索罗金名字的身份证和以此找到工作的，以后再解释。总的说来，您在搞身份证方面身手不凡，普罗霍罗夫。坐吧，谈话将是漫长的。”

普罗霍罗夫一动不动。他那四方大脸仿佛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只是浓眉下边的眼睛里含着仇恨地望着谢尔盖。

“这么说来，你们找到了那姑娘？……”

“找到了。幸好兹翁科夫什么都还没有来得及下手。是啊，普罗霍罗夫，您最怕的就是我们找到她。只有尼娜知道您的新姓。对于这里所有其余的人，您都是普罗霍罗夫。因此您暗中派塔玛拉·班基娜来与我会面。而当您感觉到您没有把我们搞糊涂时，您便亲自找上门来了。这是厚颜无耻，普罗霍罗夫。不错，您注意到我们还没有找到尼娜，我们还不知道索罗金是何许人……于是您讲了关于她的真正的实话。因此我们的审查就提供不出任何情况了。但是您有一个小小的失算。”

谢尔盖发现，普罗霍罗夫脸上的冷笑几乎使他那紧闭的嘴唇都撇歪了，但是他的眼睛仍然凶狠地、目不转睛地瞪着谢尔盖的脸。

“是的，一个失算，”谢尔盖确认道，“我有点儿怀疑，便核查了一下。在那里，莫斯科警察局的侦查员们调查了关于博尔斯克的事，好像戈尔利娜在这里被逮捕了。这些情况都没有对您的同事们说过。那么，以后要知道索罗金是何许人已经不费事了。就是没有戈尔利娜，我们也会轻而易举地了解到的。我们知道了，全都知道了，普罗霍罗夫。所以您坐吧，我可是预先警告您了，谈话将是漫长的。”

